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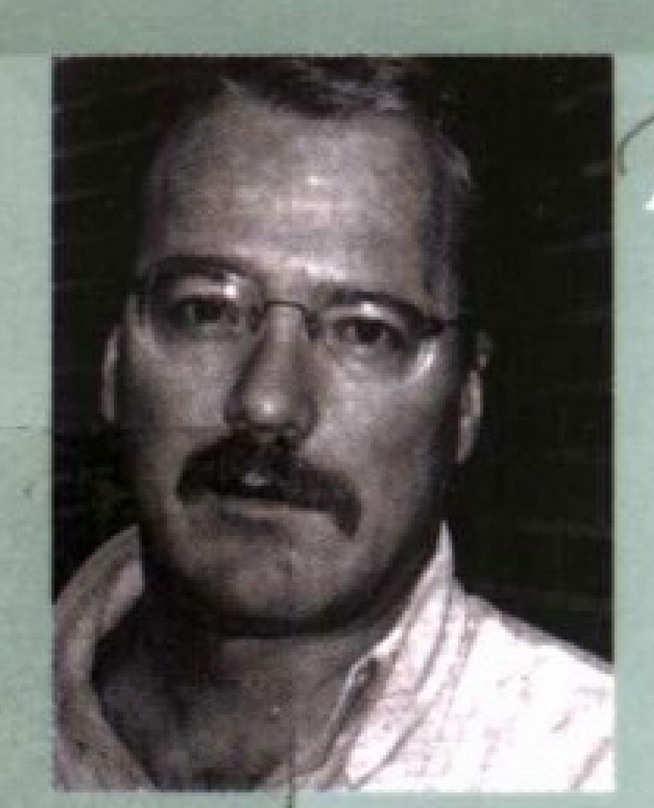
2006

病魔

[委内瑞拉] 巴雷拉／著

王军宁／译

La enfermedad



ALBERTO BARRERA TYSZKA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病魔》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2006年度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它是一部以如何对待健康与疾病这一问题为主题的小说。主张医患关系透明和对病人实话实说的米兰达大夫同时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本身没病的杜兰总怀疑自己得了绝症，迫不及待地要找他倾诉衷肠，他既无法说服他没病，又不能欺骗说他有病，只好避而不见；二是他父亲查出了癌症，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不允许他欺骗父亲，可深厚的父子情谊又让他不忍心说出真相。然而这位诚实的医生和孝顺的儿子深知"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的道理，懂得人在世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这一自然规律，他终于对父亲说了实话，同样明白于此的父亲坦然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而与此同时，杜兰也原谅了医生对他的冷漠。

La enfermedad

责任编辑：胡真才
设计：刘　静

ISBN 978-7-02-006524-0

9 787020 065240 >

ISBN 978-7-02-006524-0 定价：13.00元

病　魔

La enfermedad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7 - 4759

Alberto Barrera Tyszka

LA ENFERMEDA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魔/（委）巴雷拉 著；王军宁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6）
ISBN 978－7－02－006524－0

Ⅰ．病…　Ⅱ．①巴…②王…　Ⅲ．长篇小说－委内瑞拉－当代　Ⅳ．I7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0586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病　魔

Bing Mo

〔委内瑞拉〕巴雷拉　著

王军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 //www. rw－cn. 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5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3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6524－0

定价　13.00 元

出 版 说 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 2001 年度的评选揭晓，6 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

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6 年度的评选活动和 6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马爱农　欧阳韬

西葡拉美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赵德明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林　刘京胜　张广森　赵德明　盛　力

《病魔》是一部以如何对待健康与疾病这一问题为主题的小说。希望能在富有、成功的同时享受健康、永不生病是人之常情。然而，健康与疾病不仅是一个机体上的问题，而且还同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正是通过这部杰作告诫人们应该“在确知生活消磨生命的前提下学会以我们自己的脆弱之躯去面对生活”。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La Enfermedad es una novela que plantea como tesis el problema de cómo hay que reaccionar frente a la salud y la enfermedad. Sabiéndonos mortales, todo el mundo quiere, además de ser rico y tener éxito en la vida, disfrutar de buena salud y nunca caer enfermo. Sin embargo, la salud y la enfermedad son estados que no sólo debemos relacionar con nuestro cuerpo sino también con nuestro estado psíquico. En esta preciosa obra, el autor aconseja “aprender a vivir con nuestra propia fragilidad y con la certeza de saber que vivir mata”.

Jurado de la major novela extranjera del año siglo 21

致中国读者

我在写作《病魔》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过这本书会被译成中文并会拥有中国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褒奖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未期的荣誉，与此同时，又是一个激励。

小说《病魔》是对西方文化所确立的某些很可能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的信条与观念的回应。我认为，西方在回避疾病的同时杜撰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健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富有、成功、年轻、漂亮……不过，还应该强壮、健康，永不生病。西方用对疾病和衰老的新恐惧取代了原先对死亡的恐惧，将体弱与生病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加以妖魔化。本书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些议题展开的。我期待着书中的某些方面能够在中国找到知音。但愿。

这部小书的本意是对有关健康这个新的主导思潮的

回应,以期在确知生活消磨生命的前提下学会以我们自己的脆弱之躯去应对生活。

阿尔贝托·巴雷拉·蒂斯卡

译者前言

生老病死是一个生命必然经历的自然过程，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地位尊卑，你可能爱得死去活来或恨得七窍生烟，你也许富可敌国或是一贫如洗，但是，你所能选择的永远只是这个过程。生命过程一旦终结，有关你的一切则成为他人生命的轮回，人生的盛宴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如果说真有阴阳两界的话，我倒是觉得，升天的人得到的是永恒的安详，而地上的生灵们才真正令人唏嘘叹惋呢。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敬爱的老爸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据在场的二哥说，老爸在撒手人寰的刹那间，在彻底吐完经鼻管输给他的最后一点食物后，表情突然变得格外安详，多少天来一直挂在苍老面庞上的痛苦、恐惧、无奈和不甘心突然间消逝得无影无踪。老爸就这样走了，离开了以他为精神支柱又使他享尽天伦之乐的

大家庭，离开了干休所和他一样戎马一生、曾经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战友们，离开了使他的生命得以延伸的鱼竿、鱼塘、猫儿、狗儿和马儿们……我清楚地记得老爸问我："这么多人来看我，是不是我得了要命的病？这一次看来形势不妙！"我还记得他说："我要全力以赴，鱼他妈的还得钓！"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昏迷状态中听到儿子和孙子们喊他时，拼着老命睁大眼睛，用那早已黯然无神的目光扫视着四周，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传达他对亲人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抗争。他的五个儿子也曾颇费踌躇：是不是应该早点儿对他说实话，免得留下遗憾。但是，希望、幻想加无知同时支撑着我们的神经，我们甚至不如重病的老爸那样"算"出自己还有十天时间……

世间事无独有偶，老爸住院期间，正是我应该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付翻译书稿之时，巧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恰恰是《病魔》，更巧的是书上所写的也是一位父亲患了绝症之后和儿子及家人所发生的情感故事。书中涉及儿子和父亲间的心理活动、语言交流、患者的神态甚至身体某些器官的变化等，居然都和我所经见的惊人地相似，所有细节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再现和印证，真个令人瞠目结舌！

委内瑞拉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和我的经历本不相干，依作者的说法，它所反映的是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观念，同中国军人的后代对死亡的认知根本不搭界！然而他的作品却让我明白，人类对生命的渴望和珍视是

共同的，人类对疾病的抗争是一致的，为使生命过程的内容和形式更加美好，我们必须同病魔战斗！

本书作者阿尔贝托·巴雷拉·蒂斯卡于一九六〇年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毕业于委内瑞拉中心大学文学系，现在该校任教。从教的同时，他创作诗歌、小说和电视小说。早期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精装本》、诗集《窗户经纪人》等。二〇〇一年，在墨西哥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心不在焉》，二〇〇四年出版与人合著的查韦斯总统传记《不穿制服的乌戈·查韦斯：一段个人的历史》，该书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病魔》出版于二〇〇六年，同年十一月获阿纳格拉马出版社的第二十四届埃拉尔德小说奖。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米兰达大夫的父亲在体检中查出患了癌症。作为医生，米兰达一贯主张医患关系透明，不应该对病人有任何隐瞒，尤其对于父亲，应该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以便有所准备。可是，面对一手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父亲，他既不能向他隐瞒病情，又不忍心对他实话实说，这使他只能在科学、理智和亲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本身没病的杜兰却总怀疑自己得了绝症，迫不及待地要找他倾诉衷肠，他既无法说服他没病，又不能欺骗说他有病，只好避而不见。然而，这位忠实的医生和孝敬的儿子一向遵从人在世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这一信条，他最终对父亲讲出了实情。同样明白事理的父亲坦然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而无病

呻吟的杜兰也原谅了医生对他的冷漠。

本书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告诉世人：应当学会活着，应当珍惜生命，只有充满信心地为自己活着，并且帮助他人活着，你才会有战胜病魔的力量和勇气，你才会在有限的生命中尽享人类生活之乐趣。

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这对生死关系的表述是多么到位！可是人只有跨入老年的门槛之后，才会豁然醒悟，才会明白年轻时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到了这个年纪，你当年的万丈雄心就会慢慢消退，那种争强好胜的精神也会悄然泯灭，代之而来的将是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这个世界给了你生命，让你能够享受春天的花、秋天的果，早晨的每一次日出和黄昏的每一次日落，感谢生命让你经历了许多事情、遇到了许多好人；到了这个年纪，你才会以一个老年人的宽厚心态坦然面对世事之沧桑、人事之代谢。

我凑巧在与本书主人公基本相同的背景下译完此书，因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更有一番特殊的感受，我认为本书作者在这个谈生论死的沉重话题中至少给我们传递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二是不要惧怕死亡。

明白于此，人生将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译者谨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五日于北京花乡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六日，一个由萨尔瓦多·克洛斯、胡安·奎托、埃斯特尔·图斯凯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和出版家豪尔赫·埃拉尔德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一致决定将第二十四届埃拉尔德小说奖授予阿尔贝托·巴雷拉·蒂斯卡的《病魔》。

优胜奖授予特雷莎·多瓦尔帕赫的《一个穆尔西亚人在哈瓦那的死亡》。

目　　次

上部 …………………………………………………………… *1*

下部 …………………………………………………………… *89*

上 部

"结果出来了?"

话刚出口,安德烈斯·米兰达立刻后悔了,他恨不得凭空拦住话头,让它哪儿来回哪儿去,重新把它藏在平静无声之中。但是他做不到,已经为时过晚。此时此刻,他的眼前只有放射科主任的面孔:两片嘴唇在嘴中间系了个疙瘩,两只黑眼珠仿佛两块污渍,假装近乎地冲他嘿嘿一乐,随手递过来一个烟色的大信封。他一声未吭,但他的表情简直就是判决:多处创伤显示病灶转移。表情已然说明了一切。医生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也用不着。

"X 光片也在里边?"

放射科主任摆了摆头,目光转向楼道。

"说是直接交给你。"

安德烈斯感到浑身上下一阵奇怪的不自在,骨子里好像有两个人死较着劲儿,生怕一不留神破坏了眼前的

平衡。他道了声谢，转身向自己诊所走去。他们没谈病情，他也没看片子，不了解检验结果，但是，他已经知道：父亲患了癌症。

我们为什么如此难以接受生命就是一种偶然的道理？这个问题，米盖尔一遇到机会就要提起。手术室里人人身穿绿大褂、戴着手套和口罩，一片白光在空调冷冰冰的空气上飘荡。米盖尔举着手术刀，注视着安德烈斯问道："为什么接受生命是偶然对我们如此之难？"护士不喜欢他这种开场白。她们也许觉得这简直是在为手术不顺作铺垫，不是好兆头。安德烈斯明白并非如此，从他们一块儿上大学起，他就非常了解米盖尔。他明白他的问题毫无恶意，说白了，不过是他心地善良的一种流露，一句慈悲为怀的话语；一种承认医学面对大自然无尽能量时无能为力的方式，就像承认医学面对疾病的无尽能量时束手无策一样。

他回到诊所，一关上门便颤抖起来，他突然感到身体在以另一种方式喘息，声音、动作一反常态，仿佛有一个散了架的婴儿在身体里跌跌撞撞。他连忙走到写字台后的椅子上坐下，手里还拿着大信封。信封里大概有两张片子，硬硬的、裁剪整齐的蓝色 X 光片。父亲的身体变成了一幅模糊的画面，可是，画面上残忍而清晰地刻着"死亡"二字。安德烈斯害怕，虽然这种害怕早已不新鲜了：这在几年前就困扰着他。那是一种无法解释、司空见惯、自己影子突然吓了自己一跳的害怕。多少个夜晚，他

心中焦虑，无法入睡。也许，所有人生来都害怕，它既难以断定又毋庸置疑。它在我们中间游荡，不知去往何处，却又形影不离。它准备着，摩拳擦掌，等待着应当现身的准确时机。它如同一种预兆，一个尚不清楚该告诉我们什么的声音，然而，这个声音在说话。那是一种无法破译的、难以理解的声音，一种滴水不断的报警声。这种声音他听了很多年，他逃避过，试图驱赶它，但是从未成功。如今，他心中的焦虑不安终于有了第一种形式：放射科主任的面孔，那种落落寡欢的目光，那种委曲求全的神态，那神态，安德烈斯见得太多了。不止一次，他自己应当在这张面孔上找到这种表情。那是伴随绝症确诊的表情，那是第一份哀悼。你准备好了吗？他不知道。

电话铃声响了，是秘书卡丽娜。她告诉他父亲在线上，他又来电话了，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接听。

“我身体差得连你都不想和我说话了？”

父亲这样打的招呼，当然语调是调侃。安德烈斯也熟悉那种神经兮兮的方式。那是老生常谈。很多患者擅长这种战略，他们以弱者自居，凡事真真假假。真害怕时、分秒不落地惦记检查结果时，却故作镇静。他们被绝症吓得几个小时坐立不安，举手投足都是前所未有的疼痛。他们预感皮肤上将生出可疑的斑痕，然而他们却故作常态，凑到医生跟前：明明要哭出声来了，却强颜欢笑。像父亲刚才那样问东问西。

“他们刚拿来结果，所以刚才没打电话。”安德烈

斯说。

“嗯?”

“一切基本正常。”他说,手指敲了敲信封的封口。

“基本正常? 安德烈斯,到底他妈什么意思?”

“老爸,你别急,我在说你正常。”

“你在跟我说我基本正常? 这跟往常不一样。”

对这一套他了如指掌。通常,病人对每句话都字斟句酌,刨根问底寻找话的本意。所有疑点非要弄个明白不可,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病人永远怀疑别人没对他说实话,至少没有全说实话,总有什么在瞒着他。所以,他们无论到哪儿都强词夺理、惹是生非,甚至出言不逊。不过,说到父亲,他有他的道理。安德烈斯因为还未看片子才说“基本上……”——那你为什么现在不立刻拿出片子,为什么不打开信封看看片子? 结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放射科主任的面孔仿佛一个气球,悬在诊所空中。医院的楼道里常常挂满这种气球。薄薄的塑料气球在空中游来荡去,上面画满了倒八字眉、沉重的嘴、矜持的表情:地地道道的听天由命之态。那是一种仪式,一种临床礼仪。医院是过客之地:是告别的大殿,是送别的纪念碑。

“我跟你说基本没事是因为结果还没全拿到,刚出来的结果正常。”

“那就是说……”

"没事儿，爸爸。"安德烈斯打断父亲的话，他浑身不自在，受不了长时间撒谎。"你出去走走，去喝杯咖啡，和朋友们聊聊天。真的，一切正常。"

"你肯定?"

"我肯定。"

两人一阵默默无语。一阵紧绷绷的停顿令人无法忍受。安德烈斯想挂断电话。他知道父亲无所适从，他还在怀疑。他想象得出来，父亲坐在屋里绿沙发的扶手上，挨着电话，攥着电话机想入非非。安德烈斯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助，一阵头昏脑涨。一阵沉默，俩人好像陷入真空，直到父亲又开了腔：

"你真没骗我吗?"父亲底气十足地说，那是一种沙哑然而咄咄逼人的声音。"安德烈斯，"他继续道，"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肯定不会骗我，是吗?"

安德烈斯感到舌头一阵发麻，感到嗓子里突然塞满了菠萝皮。他强忍着眼中的泪水。他怕自己的语气露馅儿，使劲儿克制着自己。

"爸爸，我从没有骗过你。"他说。

"我想听的就是这句话，谢谢。"

* * *

尊敬的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

但愿您还记得我。找您的邮箱地址真不容易。要知

道我费了多少周折才找到的！不过，那是另一码事儿了。重要的是我正在这里给您写信，您别以为我感觉良好，我从来就不喜欢写信，我写不来，不知道如何下笔、说些什么，一写信我就难受。换句话说，我是形势所迫，别无选择。

医生，我需要立刻和您见面。我已经绝望了。三个星期以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和神秘的现象。每次我给您诊所打电话时，他们要么说您不在，要么就拒绝接电话。我如果约您见面，他们也拒绝，说什么不能为我安排见面，也不对我做任何解释。我肯定您不了解情况，您不知情，但是，这……究竟是谁在对我搞这一套？为什么？

医生，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理由。这是我请求和你见面的唯一渠道。我的状况依旧，健康每况愈下。请您用这条渠道直接回复我。对不起，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需要尽快见您。

先谢谢您的关照，我再重复一遍，我将在这儿等待您的回复。

埃内斯托·杜兰

* * *

血液多嘴多舌，它会泻尽天机。任何一个在化验室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小小玻璃管里的暗红色液体背后，隐藏着扑朔迷离的故事，隐藏着失败的天性和逃避法

律的种种丑态。当初父亲晕倒后，安德烈斯逼着他做全套血样化验。米兰达执意不肯。他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宁说昏厥而不用昏迷的字眼儿，甚至幼稚可笑地强词夺理。

“是一时昏厥。”他重复道，把事情的起因归于天气潮湿，夏天困倦。

依他的理儿，他没注意天气的变化，不是身体的毛病。但是，他像一麻袋白菜似的摔倒在302室的女邻居面前。当时，大家正在闲聊，也记不住在聊什么了，父亲晕倒了，女邻居拼命地大喊大叫。

“我以为他死了呢，脸色惨白惨白的！人一动不动！我觉得他人都凉了，碰都没敢碰他！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大喊大叫！”女邻居说。

几秒钟工夫，米兰达自己又醒了过来，大概他让邻居不要乱喊乱叫，向她保证自己真的没什么事，一切正常。只不过晕了一下，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便以为能蒙混过关了。可是，当天下午，女邻居就给安德烈斯打电话，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

“糟老太太！”他去找父亲上医院检查时，父亲又在嘟嘟囔囔。

护士抽血的当儿，安德烈斯突然发现父亲更弱小了。以前他从未注意到父亲的身材，但是，看到他坐在那儿，伸着胳膊，看着天花板，目光躲避着赫琳卡的目光，他忽然感到父亲的身材不似原来了，他变矮了。哈维尔·米兰

达原是位近一米八〇的高个子。他高大苗条，一副田径运动员的身材。走起路来身轻步健，腰板笔挺。虽然年近古稀两鬓斑白，但依然爽朗健康。满头鬈发使他赢得了同少白头的战斗。他有胶泥色的皮肤，咖啡色的眼睛。他从不抽烟，酒偶尔喝上两盅。每天早晨去卡奥博斯公园散步。他不近油腻，早餐吃水果喝燕麦粥，晚上嚼七颗生鹰嘴豆降胆固醇。“出什么事了？”这时，好像有人在问。他善于合理打发时间，一切按部就班。直到有一天下午，一场无法解释的昏迷打断了他的计划。平衡就那样满不在乎地眨了眨眼，把所有人弄得团团转。就那么短短的一瞬间，突然将父亲变成了一个弱者、一个受伤的人、一个小人儿、小小人儿。“疾病是烦恼之母”，安德烈斯不由想起一句话。那是从一六二一年出版的罗伯特·伯顿《忧郁症剖析》一书上看到的，那是大学第一学期的必修书。但是，他讨厌回忆。约会的铃声响了，约会，约会与其说使他不快，简直是糟糕透顶。他收起治病救人的念头，重新抬头注视着父亲。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讽刺吗？

此前，老人的身体顶多踏过伤风感冒的门槛儿。两年前尿检略有炎症，别无他事，身体棒得令人嫉妒，从来没让人着急上火过。可是，安德烈斯总有一种不祥之感，整个情况使他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虽然他说不清道不明，可他第一次感到厄运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想到自己居然感情用事，被一种预感挟持，变成了毫无道理、不

讲科学行为的人质，顿时怒火中烧。父亲抬起目光看着他，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他忽然感到凄凉，一个六十九岁老人的命运竟然就这样浓缩在四个盛满 ORH 型阳性暗红色液体的玻璃管中！此时此刻，父亲会作何感受？逆来顺受？结论自然而然，可他能听天由命吗？他现在已经身不由己，任由注射器摆布，生活在医院实验室消毒气味的掌控中。他死死望着父亲，他无法不看他，他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个不得不任由他人打针、抽血、搬来搬去的人不是父亲。是一个躯壳，另一个躯壳。一个更老更脆弱的、不安地扭成一团的、一个他父亲的意识拒不接受的躯壳。意识是一个怪词。安德烈斯已经很久没用过这个词了。他感到，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重提“意识”这个字眼。

两个人。从他记事以来，就是两个人。母亲去世那会儿，他十岁。安德烈斯从记事起就是一个孤老头的独生子，孤老头身强力壮，再大的苦能受，再大的亏能吃。母亲是在加拉加斯飞往古马内的一场空难中死去的。飞机在天上没飞几分钟，就栽了下来。那是一场国难。搜救活动艰苦，大多毫无结果。拉瓜依拉医院下属的一家分院安排了一个特别大厅，遇难者的亲属们纷纷前往大厅辨认找到的遗物：一只脚、半个手镯、牙套……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时面色苍白、精神憔悴。他在厨房和其他人嘀咕了一会儿，然后走出来，抱起孩子便离开了。安德

烈斯早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几个姨妈怎么看也没看住他，他溜了出去，悄悄地在电视上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当父亲两眼红肿、强打精神说出经过，告诉他妈妈已经走了，妈妈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去了，妈妈这次旅行再也不回来了的时候，安德烈斯还不太懂事，他满心害怕，迷惑不解。他问父亲妈妈是不是在那架掉到海里的飞机上，父亲犹犹豫豫地看着他，终于承认了。安德烈斯恍恍惚惚记得，父亲抱着他，两人哭成一团。

好几个早晨，安德烈斯都梦到妈妈。每天晚上，无论怎么变化，都在重复着同一个梦——飞机在大海深处。仿佛没有破碎，仿佛一艘沉船：完好无损，安睡在暗淡无光的沙砾上，安睡在花布般翩翩起舞的海藻、鱼儿和阴影之中。机舱的顶棚上，自然形成了一串气泡。一个个脆弱不堪的气泡正在缓缓减少。母亲试图保持着泳姿，头埋在气泡中吸气。她好像是唯一的幸存者，除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鱼儿围着她悠然自得地往来穿梭，没有任何人。很奇怪，梦中的母亲穿着游泳衣，脚上还穿着鞋。游泳衣是两件套的，橘黄色，鞋则是黑色的皮凉鞋。

时间一点点过去，母亲越来越绝望。她不断用手击打着机舱顶棚，远远发出的金属声好像一根挥动得呼呼作响的铁棍，要在大海打出一条通道。母亲从一扇窗户向外张望：什么都没有。到处是昏暗的海水，一片遮挡住目光的昏暗水幕。大海没有记忆，转瞬间便将一切毁于一旦。母亲惊慌失措，喘不过气来，拼命敲打着舱顶，喊

道："安德烈斯！安德烈斯！我还活着，你快来，快来救我出去！"

他醒来时，总是尿湿一大片，浑身哆嗦。站在地上仍感到人在梦中。足足一分钟他才从那架飞机中爬出来，才逃离了海底深处，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呼喊。此时此刻，父亲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十分耐心地帮助他抵御着四面来敌。他久久伫立在那儿，在噩梦边等待着他。

他注视着化验室里的父亲，所有回忆闪电般浮现在脑海中。他也会有同样的预感吗？安德烈斯当然希望他没有。他年近七十了，他想，噩兆就是子弹。这把年纪，已经没有时间了，一切都是现在时了。

护士拔出针头，给了他一个消毒棉球。哈维尔·米兰达把棉球放在胳膊上，望着儿子，好像在求他罢手，求他俩人干脆一走了之。难道小时候对我们连打带骂的就是这些如此可怕的老怪物？六十九岁了还做什么梦？最难以忘怀的是哪些噩梦？父亲梦想：他人在医院深处的化验室里，周围是各种化学药品，针管、输液器、纱布和令人奇怪的同样脏兮兮的白大褂。他缩在一家医院深处，找寻着小小的气泡，为了呼吸！为了呼喊！安德烈斯！安德烈斯！把我从这儿拽出去！救救我！

送父亲回家的途中，他尽力回避病情。这谈何容易！父亲依然骂骂咧咧嘟囔个没完，坚持认为检查根本没必要，不就是胆固醇稍高一点嘛，要做就做胆固醇检查。他坚持着。安德烈斯把他放在了楼门口。当他渐渐离去

时，依然可以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的身影。有一阵儿，他曾想把父亲搬到自己家去住，可后来担心一块儿过说不定会把家变成地狱。玛丽亚娜和父亲关系不错，孩子们特爱和爷爷一块玩儿，不过，只是偶尔的经历，他隔三差五出去看电影、逛公园，去餐馆吃饭或是去体育场看棒球。每天都有事儿，每天都有更要紧的事。然而，此时此刻，当他在倒车镜里看见他渐渐缩小的身影，他又一次想到了搬家的可能。几个孩子早晚会为排斥他而付出代价。老头别无亲人。如果不是正在楼道里和女邻居说话，如果昏迷恰恰发生在他家，就发生在自己家中，还能不出大事儿吗？一瞬间，安德烈斯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可怕的场面：父亲走进厨房去关咖啡壶下的火，在炉火旁一弯腰，突然失去了神志，摔倒了。顺着惯性，他的脑袋在体重的推动下向下栽去，撞在炉灶边上，滑下去又磕在烤炉的把手上，最后倒在石板地上。太阳穴青筋暴露，鼻子破了。右眼塌了，右颧骨和右眼眉毛上血迹斑斑。肋骨没准断了一根，醒来后无法活动，无法通知任何人。水开了，顿时散发出煳咖啡的气味。

那天晚上，安德烈斯本想和玛丽亚娜做爱。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她，但是他需要性生活。那是一种渴望，一种迫不及待想趴在她的身上，进入她的身体，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只顾顺着急切晃动的双臂上下活动的强烈渴望。但是，他不知如何迎合她。他没情绪挑逗她，实话实说他感到羞耻。女人们

无法理解，有些时候，男人感觉性爱就是一种运动，一种随时随地跟谁都可以开展的运动。男人的东西太原始，缺少加工。谈情说爱是女人的事情。

“你不觉得你在自寻烦恼吗?”玛丽亚娜临睡前问道。“你连化验结果都不知道，干吗这个样子?”

安德烈斯想起父亲近来有点健忘。目前，任何细枝末节都可能让他捕获重要信息，获得额外价值。

“你自己不久前不是对我说起过吗?”他说，“那是我们在这儿吃饭的时候。”

“没错。不过，这很正常，不是吗? 如果我自己都丢三落四，你父亲又怎么会不忘事儿呢? 安德烈斯，不要多想了。为什么总往坏处想?”

他不知道，当初也不知道。但是他有一种难以理解、浑身别扭的感觉，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直觉包围着自己，他感觉到那天父亲出事预示着更严重和致命的事情要发生。比如：伯基特淋巴腺瘤、皮肤癌、血细胞瘤……安德烈斯清楚地知道，本能已经无情地译出了这样的字眼。饱受煎熬的父亲使他惶恐不安。父亲蜷缩着身体、喊叫、挣扎、哭泣。疼痛是身体最可怕的语言，语法是大喊大叫，发音是哎哟哎哟。

他撇下玛丽亚娜在床上看书，走到凉台上。相信预感使他感到恐惧。一个免疫学研究生，几乎有二十年专业经验的医生无权有预感。苏珊·松塔曾断言说，存在着两个王国、两种公民：疾病和健康。人类的成员经常会从

一种公民变成另一种公民。安德烈斯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医生就在两个国度中间，就在两个国度的边境上。接受护照，提出问题，进行评估。他们可以怀疑，但是需要证实。这是一种需要证据的职业。有的医生看红斑狼疮、看血肿、查细胞，做各种化验；有的医生看症状，不看表面现象，不看胡思乱想，不看含糊其辞。

突然，电话铃声像一只铁手撕破空气，他马上接起电话。是化验室打来的。他急需的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他一边听着结果，在纸上记着，一边依然感到焦虑。似乎心中有一只穷凶极恶而贪得无厌的野兽依然在那儿虎视眈眈，甚至当他确认所有的化验结果都正常时，心中还是不安。正如父亲所说，只是胆固醇略高一点。其他一切正常，均在规定指数之内。他看了看表，觉得现在给他打电话太晚了。他也无心庆祝，可恶的预感没有沉寂，他不满意，还有血样无法控制的流言蜚语。于是，他拿起电话，再次给医院打了过去。他早就为拍胸片和透视留了号。他不希望有任何未解的疑团。

为什么总往坏处想？

因为坏事常常发生。

* * *

劝说老人再去医院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安德烈斯

几乎在强迫他。一逼他，他便顿时紧张起来，推三阻四。安德烈斯把化验结果带给他，一项项给他看，肯定地告诉他一切正常。然而，父亲的反应和所有人一样：

“一切正常，你还带我去做什么检查？”

没辙儿，安德烈斯只好坐下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血液化验正常，但他想更保险一点，所以想让父亲拍几张片子，做个核磁共振。那是全部检查的一部分，一项常规检查。仅仅是为了一切正常。

“相信我，”他说，“相信我。”

老米兰达深深地喘了口粗气，这才让人带他去医院放射科。

父亲走到楼道，伤心地望着他。他光着身子，背上简单地披了件后系扣的长睡袍，安德烈斯有点着急，走到他身边：

“你怎么穿成这样？”

父亲没有回答，甚至看都没有看他。嘟嘟囔囔，没引起任何人注意。

“现在就差核磁共振和 X 光片了。”安德烈斯咕哝了一句，催着他顺着楼道往前走。

父亲走着，还是没有看他。

“一个人晕倒，”安德烈斯坚持说，“总会有一条理由，一番道理，一个原因。这就是医学。如果血样检查结果说服不了我，我就另找原因。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办，找个究竟。”

“谁去找,谁找得着?”老人向前迈着步,反驳似的嘀咕了一句,一直没有看他。

*　　　*　　　*

尊敬的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

难道您没有收到我的邮件?我上网手有点生,一着急给您发信时又点错键了。几天来我一边等您的信,一边这样想。我时不时就打开邮箱看看有没有您的留言。什么都没有。

我在等您的信,根本没打算给您打电话。最后一次,您的秘书告诉我,是您的指令,是您本人不让接转所有我的电话,说您甚至要求医院的保安,如果我来了不要放我进去。我对她说我不信,我无法相信您会这样做,她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就再没有打过电话。但是,医生,我还是不放心,我不明白出什么事了,这一切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所以我还要写,所以再给您写信至关重要,所以您应回复我也至关重要。

我也想过,您或许不记得我了,是吗?我觉得奇怪,但这也许能够解释您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要么您把我和别人搞混了。这也可能。这些日子里我脑子整天围着您转。我知道您记不住大部分去过您诊所的人。您一天有多少病人?七八个?十几个?没准儿更多。当然,乘以一周五天就是一大帮人。您大概明白那么多人是记不

住的。但是，我肯定谁也忘不了您。对我们来说您是医生。我们的医生。我的医生。对您来说，我们统统是病人，没名没姓，您的患者，希望您接待的人。您注意用词，千真万确：患者。有耐心的人。相反，对我们来说，您有名有姓。您是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仅此而已。

现在，我担心您会误解我刚才说过的话。但愿不会。我跟您讲这一切，是因为这关系到您和我的关系。如不介意，我想回顾一下和您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是在一间候诊室里，在候诊室陈列的一本医学杂志上知道您的。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您谈论医患关系的文章。我大概还记得，您说医患关系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医生和患者间的关系或许是一种治疗方法。您说过，要说的不是病，而是病人。通常，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体的人，病人。所以，医患关系既是一种人的关系也是一种医疗实践。

坦白地告诉您，我感到深受冲击。为了找您看病，为了让您做我的医生，我立刻去搜集您的资料。这些，第一次见面时也对您说起过了，您当时听得很认真。至少我自己那么感觉。我觉得您听得很认真。我们谈到了我在电话公司的工作，谈了我的生活、家庭、父母和兄弟们。我告诉您我离婚了，告诉您离婚前前后后对我和前妻造成了多么大的打击。后来，我们谈到了身体，当时，您也挺专心。我觉得您听得专心致志，兴致勃勃，彬彬有礼。我尽量详细介绍我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当再次向您介绍一下自己。对不起，现在请您耐心听我讲。

上次来医院，是因为我的血压突然下降，体内代谢失调，我几乎每天都要晕倒。症状很明显：出冷汗、面色苍白、体虚、体温下降……每次昏迷之前都感到轻度的恶心。我什么都跟您说了。您逐项记下了。您提了几个问题。然后给我做了检查，量了血压。“血压 80—120，”您说：“很好！”您又补了一句。我和您谈起我读到的文章，我对您说我是因为那篇文章才来看病的。您只是和善地笑了笑。我发誓我的感觉是正确的。我感到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

第二次见面您应该想得起来。我带着您吩咐做的检查来的。一套血液化验结果、一张侧面体位的片子，您像第一次那样和气地接待了我。我们甚至开了点玩笑，说到了我前妻、女人和离过婚的女人，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近了一些。您告诉我您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对您说，万幸，我失败的婚姻没有孩子。总之……不过后来又说到了治病。您对我说检查结果很好，说我正常。不过，我跟您争辩起来，我对您说我不可能正常。我照样恶心。也许，您不喜欢我强词夺理。但是我不得不争辩。昏迷的是我，不是您。这话我当时也对您说了，可您对我保证说我正常。我不会再昏迷了，我根本不可能昏迷。那一次，您请求我相信您，信任您。这一点，我做到了，米兰达医生。现在，我要向您提出同样的请求：相信我，对

我要有信心，要信任……对不起，请回复我！

谨盼速复。顺致

敬意

埃内斯托·杜兰

* * *

当米盖尔风尘仆仆、急急忙忙赶到时，安德烈斯坐在一张稍靠边的桌子旁，已经在喝第二杯威士忌加冰了。

“对不起，来晚了。”他坐下时说。

安德烈斯晃了晃脑袋，没有太明确的表示。似乎他的神情已然说明了一切。他的脸像正午的瓜秧。

“电话里你说严重，”米盖尔朝前一凑，“可这会儿看你的脸色我都害怕，到底出什么事了？”

安德烈斯指了指桌子上的两个信封。

“你看看吧。”他几乎在窃窃私语。

米盖尔拿起信封，抽出片子举着观察起来。他先看了看肺部的片子，接着看了脑片。

“完全正确。结论一目了然。”安德烈斯说，“是不是？”

米盖尔回过身望着他，神情紧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店老板走过来，还不等他招呼，安德烈斯便拦住了他：

“给他来杯伏特加加冰和柠檬，双份。”他话里有话地

交代着,眼睛死死注视着米盖尔。

“今天下午还有个造瘘手术。”米盖尔好像答非所问,语气也含糊其辞。

“你就告诉我你怎么想的? 真的没希望了?”

米盖尔与其说是叹气不如说是深深吁了口气,他又看了一眼片子。他侧着身子,逆着光线观察着。蓝色片子在白磨砂玻璃上的反差,让人可以看见色斑,深深的印记,那些本不该出现的阴影。

“线状细胞癌,对吗?”米盖尔看看片子问道。

“四期,”安德烈斯说。随后慢慢指了指X光片。“脑转移,”他又缀上一句,声音几乎要崩溃。

“谁的片子?”米盖尔看着他,战战兢兢地问。

“我老爸的。”安德烈斯说。

俩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说不出一句话,心心相印的患难之情包围着他们。

“真操蛋……”停顿之后,米盖尔低声骂了一句。

安德烈斯飞快地讲述了事情经过:起初是昏迷,之后是预感,血液化验结果,后来又是预感、胸片、X光片……米盖尔试图缓和缓和话题,尽可能打岔。

“如果不是我父亲,”安德烈斯说,“你我看完片子就会下结论:没救了,可问题比所有肿瘤还肿瘤,是肿瘤他妈,病人可真完蛋了。”安德烈斯说,声音已经断断续续。“用不着任何病理检查了,开刀毫无意义。”

“也可能,不过……”米盖尔想说点什么,可是又无话

可说。他不能骗他。

“为什么接受人活着是偶然的观点这么难?”安德烈斯哽咽着嗓子突然问。

两个人陷入沉默。又一杯威士忌,又一杯伏特加,米盖尔打电话取消了手术。安德烈斯把片子重新放回信封。

“你老爸肯定蒙在鼓里吧。”

“嗯。”

“你他妈可别犯傻跟他说,可别告诉他。”

“我一直在这么做,难道不做吗?我一直这么主张,我一直坚持: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透明。”

又一阵沉默。直到米盖尔表白说自己历来不赞成那种方法。安德烈斯好像没听见他的话,机械而下意识地点点头,其实,脑子早就到了别处。也许他正在回忆,他看见自己给看过病的病人和家属纷纷从眼前走过,他看着他们走向死亡而束手无策。他或许回忆起如何将那种关系透明的理论付诸实践。对有些人,他甚至很严厉,不近人情。有些人则感激他。安德烈斯历来喜欢同当事人、同那些疲倦的身体,那些变成医疗物体,随时准备接受针扎药灌的身体共享临床结果。多少次他只能说:“对不起,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是,您可以去旅游,让人们带你去洛杉矶、去休斯敦。因为您的生命还剩下两个月时间。”

他一直坚持对病人坦言相告,哪怕冒着疾病本身那

样使病人惶恐不安的可怕风险。其实,明明可能是他自己疑神疑鬼,什么病人的直觉啦、病人悄悄听到自己身体的提示啦、疾病的最后声音啦。

“所有人都有权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日期的,所有人有权知道自己何时死去、怎样死去,这就是我一贯的主张。”

“可现在听诊器旁边是你父亲,太荒唐了,你想想。你我清楚这种癌症恶化的速度有多快。”

“他从来不抽烟,妈的!”安德烈斯突然咬牙切齿。“妈的,他一辈子没抽过一根烟!”他咬着嘴唇喊,好像在嚼冰块似的。

“所以我才告诉你,你难道不认为他也会这么说吗?也会这么问吗?他知道真相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不能欺骗他。那不公平。”

“对不起。这话纯粹是扯淡。”

“不是扯淡。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父与子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重要的问题是:你能那样做吗?”米盖尔说着,在椅子上动了动,俯下身,话语里多了点神秘感。“要我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他当个普通病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你难受,但不一样,和面对你爸不一样。看着他,对他说:老爸,您就剩几个星期活头了。我就是这意思,你做得出来吗?”

“做不出来,我没有准备。”

米盖尔点点头，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若有所思。一会儿，他看了看表，回身看着安德烈斯。

“我跟你说件不久前透析室发生的事。”他终于开口说话。

米盖尔是肾病医生，除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外，几年前到一家公立医院工作，负责透析室的工作。

“有一个病人六十八岁，是一个动辄发火的小老头儿，叫埃弗拉因。他主要患有糖尿病，已经到了晚期，两个肾全完蛋了，双目几乎失明，看东西模模糊糊。一上透析机他就浑身难受，动不动乱骂乱叫、又哭又闹，把技术员和护士们搅得鸡飞狗跳。老家伙心灰意冷，实在不想活了。更有甚者，活着对他纯粹是受罪。他每星期必须透析三次，按可怕的规定食谱吃饭，走路异常困难，生命的希望已经愈来愈渺茫。你可想而知，是不是？一天下午，有一个护士约我单独谈话。我有点纳闷，但我们还是去了一间诊室，坐了下来。于是，护士对我说埃弗拉因想死。我很吃惊。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我弄不明白。当然，他可能想死，可她告诉我这件事时的语气似乎另有所指。护士反复说老头想死，没别的就是想死，已经不想继续受煎熬，就是不想活了。原则上说，事情很简单：不再做透析就得了。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说来道去，待在家就完了。他身体扛不住，无论哪边一炸，就死了。简直可以叫做自然死亡。”

安德烈斯默默地听着。抬手又要了一杯威士忌。

"老头儿就是想死，"米盖尔继续说，"结束那场噩梦。不仅仅他，他家里也希望他死。他们精疲力竭，像他一样病入膏肓。他的病传染了家人，也在杀死家人。所有人多少年就这么强忍着，你完全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大男人已经什么都不做了，半瞎、浑身透析机味，需要特效药，带他东遛西逛，控制他的血压，喂他吃饭，给他擦洗身子……我感到他们绝对冷静和客观了，无论怎么说，他死了对全家将是巨大的解脱。不过，另外换句话说：如果你从医院、从公共服务，乃至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老埃弗拉因死也合适。这一点咱俩前面说过。老家伙几乎七十岁了，论年龄、论身体状况，怎么也不可能选择换肾。可是他还在透析机上占着位置，占着一个轮次呢。当时，后补名单上还有个十七岁的姑娘在等机会进透析室治疗。姑娘去那儿代替埃弗拉因难道不合理吗？我知道，换个人听了这个故事，可能会认为这样安排是行凶、是杀人，或者是逼人自杀，我哪里知道。但是不行，我们，至少当时我们认为埃弗拉因的死可能会引起一场官司。一场涉及正在排队透析的姑娘、他家人甚至埃弗拉因本人的官司。如你所言：他知道末日即将来临，他心中有数。那时，他只想行使自己的权利来加速那一时刻，使自己的死不那么漫长、不那么痛苦。有一次，我向一位神父讲述了这一切。当然，他对我一通说教。最后我问他：'色情受虐是犯罪吗？'神父很惊讶，他迟疑了片刻，然后对我说是的，是犯罪，所以说埃弗拉因不想继续犯罪了。在他身上，生

命就是一场色情受虐。他只渴望自己死得安详，渴望他的死彻底结束对自己生命的折磨。”

“你到底想说什么？他们干什么了？”

“你知道后来怎么了吗？透析室大家都担着风险，万一有人听到什么，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通讯工具没准儿会让我们吃果子。但是，我们不怕，大家照样担着风险。我亲自和埃弗拉因谈话，同他妻子和大女儿谈话。有点别扭，你也知道，那种谈话什么具体事儿也不提，就像打哑谜。悄悄儿地、小心翼翼地达成协议：老埃弗拉因自己也同意。埃弗拉因回家去，不再做透析……可是，没成！最后什么也没发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需要签字，需要老头儿的一位家人在一张纸上签字，纸上证明埃弗拉因·萨尔加多自愿放弃前往透析室治疗。这是我们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避免以后家里再来人指责透析室不愿意收治病人。”

“后来呢？”

“谁都不愿意签字！家里人谁也不敢！觉得一签了那张纸就是签了认罪书。就那样三折腾两折腾，所有计划急转直下，最后泡了汤。这事对我来说，是我工作失职、百密一疏，而对那些人则变得非同小可。那个在纸上签字的人将抱着埃弗拉因的尸体对死亡负责；仿佛在纸上把名字一划，立即就成了犯罪行为。他们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需要一切都是事出偶然，好像一切的发生都不是预谋，需要感到老头是自己死掉的，所有人都一无

所知。”

米盖尔要了一盘咖喱虾，安德烈斯不饿，还是一言不发，心不在焉。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决定不回。电话一个劲儿在桌上响着，一阵毫无作用、毫无目标的乱响。安德烈斯没做任何解释，依然一声不吭。米盖尔看看他，突然感到有些惭愧。

“我也不明白怎么想起这件事了，”他说，语气有些后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这些。现在我觉得我们所说的一切，跟你父亲无关。”

“谁知道，”安德烈斯看看他，对他说，“没准儿有关系。”

米盖尔摇摇头，否认了。

“我一时心血来潮，就想跟你说，尽管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心不在焉 。原谅我。”

其实，米盖尔如今本想搜罗点奇闻趣事，拣一些边边角角的故事，不提埃弗拉因·萨尔加多和他家里的故事。他怎么想起那件事了？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把那件事告诉安德烈斯？这种时刻，朋友需要的不是这些，他不会指望他这样。他约他来是为了告诉他，他父亲得了癌症，他父亲快要死了。而他，不跟他将心比心、不安慰他，却搞出一个人想死，他老婆和孩子们也希望他们的父亲或丈夫去死。搞出这样一个死人的故事胡搅蛮缠，你图什么？为什么？

“别担心，没事。”安德烈斯再次摇头否认，尽管他微

笑着，眼睛里却充满了忧郁。

“当然有事。你变成这个德行，我还傻子似的对你说些不着边际的烂事。”

店员拿来了账单，发生了信用卡的经典之争，谁付账的战争打响了。米盖尔执意要为自己付后悔账，非付不可。等店员走远了，安德烈斯看着他：

“我明白你为什么想起这个故事了，我终于明白了。”

米盖尔听着，尽管他依然摇头否认。

“其实，”安德烈斯接着说，“你脑子里大概在想，死亡看上去不那么轻而易举。有时候，知道发生和即将发生什么，对我们于事无补。米盖尔，就这么回事。死亡是不可破解的巫术。但愿我老爸不知道真相。你也不要告诉你老爸真相——这就是你告诉我的话。”

趁米盖尔上卫生间时，安德烈斯想，这也许是疾病最可悲的结局之一：破坏所有其他表象，不准掩饰死亡，毁掉仿佛平安无事地死去、仿佛因正在发生其他状况而死去的机会。

下午六点，安德烈斯才往家里走，夹在了通往城南的高速公路上拥挤不堪的车队中。五条车道堵得水泄不通。这就是很多人朝思暮想的典型城市景象：一堆堆汽车慢慢地喘着气，一辆挨一辆，在一轮无动于衷的烈日下挪动。或许是威士忌的作用，此时此刻，安德烈斯第一次不感到心神烦躁，第一次不感觉急着到家，不感到一天终于结束了。副驾驶座上放着信封，里边有父亲的片子，安

德烈斯瞥了信封一眼,合上了双眼。不过一秒钟时间,他感到自己眼睛生疼,无法眨眼。他知道要出事了,不可避免地要出事了。他手忙脚乱,无所事事地打开收音机,力图让束手无策的事不要发生。他飞快地换着台:无济于事。时隐时现的播音和歌曲无能为力。他感到几颗泪珠在眼眶里滚动——不舒服,刺眼。他哭了,手拍着方向盘想呼喊。他感觉到了黏黏的口水。他无法控制自己,他无法停止哭泣,他无所适从。

*　　*　　*

尊敬的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

我不知道一封回信最多应当等多长时间。我原以为第二封信后,您会在一两天内回复,可您没回。我查询过,他们告诉我邮件也常常丢失。也就是说,您也许给我回信了,但回信丢失了,比如说进了他人的邮箱。我也在想,也许我应当把邮件打印出来,亲自去医院交给您。尽管我要告诉您,这样做之前,我真的希望这种系统好使,希望您至少告诉我是否收到我的来信。您知道,如此足矣。您只要发封邮件说声"有"或"没有"就行,别无他求,仅此而已。这样我至少知道我们在保持联系。

在等待您回信的日子里,我一直试图检讨我们之间的关系,试图回忆是否有什么得罪之处,是否我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您不回信的后果。您收到了我的信,看了我的

信又不想回复我，不想了解我的任何情况，这可能吗？难道您秘书说的话是真的？我思前想后，我向您发誓，我还是觉得不可能。我不信。您不可能如此这般对待一个病人，至少我这么感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如上封信所说，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请您像我对您一样有点信任。您告诉我，我的身体非常健康，不可能昏迷，我相信您。也的确有那么一两天，我感觉好多了。可是，到了第三天，昏迷的感觉又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刚刚下班，走在索拉诺大街上。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天气热极了。我从来没那么平静地走着，突然，走到一个拐弯时，浑身出现同样的症状，我特别紧张。以为自己随时随地就会倒在那儿了。我双手冰凉，满头大汗，吞咽困难。我记得周围的一切开始旋转，我失去了平衡。那是我第一次给您打电话。我没有别的念头。您大概还记得吧。我跟您说是急诊，我告诉您事情发生的经过。您非常吃惊，我估计您肯定想起来了。您让我沉住气，问我出什么事了。我紧张极了。对您说我要晕倒了。后来我不得不喊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钻进车里，请求他立即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我知道，那一回您不太高兴。我记得您给我看了检查结果：所有指标正常，一切正常。我不知对您说什么好，只有在医院我才感到放心，因为我知道您在旁边，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您都会在那儿。

我承认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身体极差，精神

紧张，人完全失控。为了让您安慰我，向我保证我当时真的不可能晕倒，我在城里不分时间地点，总给您打电话的做法是不对的。可是，我向您发誓，我真觉得马上就要出事了，如果不跟您说说，不管我在哪，我都会晕倒在那儿，晕倒在任何地方。那时，我感到我要依靠您，您是我继续站着不立即倒下的保证！

我不会说话，这一点我很失望，请相信我。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您知道我身体症状明显，病情岌岌可危：我差点失去神志，差点晕倒。我体内有障碍。障碍偶尔出现，但的确存在。我面色苍白，您用不着见我就知道我面色苍白。我感到太阳穴血管在跳，指尖冰凉。那不是故弄玄虚。我从来不喜欢麻烦您、打断您、逼迫您，我真后悔我做过的事。但是，我只想把我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感受转告您，所以，我坚持咱们再查查，再给我做一次深入的会诊，我不否认，您当时的表现非常优秀，充满耐心和智慧。您对我一直和蔼可亲，尽管您不改变自己的诊断。您听我说但是却不理睬我，所以我常常感到失望，那天下午，当您说要和我开诚布公地谈谈时，我心想，终于谈了！然而，您让我大吃一惊。您不但不听我说，不解决我的急难问题，反而说不想让我继续浪费时间和金钱了。您记得那一次吗？您应当清楚地记得，您对我说我不需要您了，我需要的不是内科医生，而是心理医生。

那天下午，您向我提出了治疗方法。甚至还向我推荐了您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医生，给了我她诊所的电话号

码。我再次照您的吩咐办了。看看我对您多么信任！是的，医生，我去了您推荐的那家诊所。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所有的问题就从那儿开始了。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之间的一切变了，我再也无法和您交谈了。

我甚至想到，是不是心理医生向您介绍了我们初次见面时所谈的情况。没准儿是的。照我现在想象，我刚刚离开诊所，她就拿起电话拨了您的号码。但是，我也不理解，我病情那么严重能对她说什么？我想不起来那天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我是准时去的。刚进门儿，那个女人就没给我好感，我觉得她不客气，人干巴巴的，有距离。像别人说的那样，她甚至连招呼都不愿打，一句话不说，保持着沉默，我以为该我说话。于是，我对她说了说我发生的事，为什么到了那儿。我和她谈到了您，谈到了我的昏迷。她继续沉默着，时不时在本上记点什么，我感到别扭，也没更多的话可说了。我问她："您还想了解什么？我还有别的事儿要说吗？"她对我说什么时间是我自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一听就更别扭了。真的，我实在不喜欢那种心理治疗。我为什么非得去那儿？为什么非得和那个陌生人讲话？那样做有什么必要？对她，对一个刚刚认识的家伙谈我的生活、我的隐私？就因为我付钱了吗？见面余下的时间，我只是重复介绍了一下昏迷的情况，别的什么也没说。

不过医生，肯定发生什么事了。心理医生、秘书，或者其他什么事……因为自从那次起，我就再也不能和您

交谈了，他们再也不想给我安排见面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甚至想到您被别人劫持了，有人控制着您避免让咱们见面。那就是我的感觉。

昨天晚上信没写完。我累了，时间也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我很少有这种感觉，信明明应该写完了，但却找不到结尾，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今天，我早早起来出去散步，我吃了点水果就坐下给您写邮件，想在上班前写完它。医生，坦白地说，我开始感到万分失望。要是这一次您还不回信呢？如果没有回信，我该怎么办？我依然像过去一样感到恶心，医生。我每况愈下，唾液有种怪怪的感觉，嘴里发苦，感到眼睛和眼皮四周压力增加。医生，这都是新症状。我害怕等我们终于可以交谈、终于可以见面时，将为时过晚了。

埃内斯托·杜兰

*　　*　　*

玛丽亚娜皮肤白皙但不过分，并不像一个地道的白人那么白皙，看她光着身子在水龙头下洗澡时你会这样想。安德烈斯关上门，坐到马桶盖上，她没有看到他。一个人洗澡时，事实总是大相径庭。她独自一人在那儿，任由水珠冲洗着自己，仿佛万物不复存在，仿佛蒸汽不会散去，仿佛世界距洗澡间并非近在咫尺，近得如同手边的浴

巾。岁月年华和拖儿带女没有减少她的风韵。至少对他来说是的。根据温妮弗雷德·卡特勒[1] 一九八六年所做的调查,知识说到底就是性欲。他甚至指出那就是人们所称的爱情,爱情从理论上说也有期限,它持续不过七年。安德烈斯的经验和这些论调截然相反。他注视着玛丽亚娜,感到心中一阵颤抖、一阵躁动。性欲利用身体,但不摧残身体。性欲不会衰老长皱纹,它变化、转移,但是没有年龄。此时此刻,他注视着玛丽亚娜,充满着渴望。这天晚上,他心情压抑、身体疲倦,可十四年朝夕相伴,性欲依然旺盛。他喜欢她,喜欢她纤小瘦弱的肩膀,喜欢她的身材、她的皮肤、她的双脚和她的性爱。他多次来到这个身体上,可是每次看见她赤裸的胴体时,依然激动不已。

"什么时候来的?"她终于发现了他,问道。

安德烈斯没有回答。他把她拽到身旁,轻轻地拽掉玛丽亚娜身上的浴巾,为她擦干身上的水迹。

"你怎么了? 你父亲出什么事了?"

他仿佛心不在焉,浴巾在玛丽亚娜身体上擦来擦去。玛丽亚娜安静良久,终于转过身,面对面注视着他的眼睛。

"出什么事了?"她问。

" 这会儿不想说。"安德烈斯有气无力地低声道,然

---

① 温妮弗雷德·卡特勒,美国当代性学家。

后贴近她的脸孔想吻她。似乎要用双唇杀死想说的话，吞噬话语，堵住话头。

他们在洗澡间做爱，年轻人一般疯狂。她又开双腿跨坐在他身上，背冲着他。安德烈斯啃咬着她的脖颈和肩膀。像猫儿一样做爱。两人达到强烈的高潮之后，才悄悄地喘着气，好像各自的身体在慢慢恢复原状。他们来到房间，伸展着赤裸裸的身体，躺在床上，交谈起来。刚认识她的时候，安德烈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玛丽亚娜彼此彼此。第一眼不是爱情，第二眼也不是爱情，第三眼还不是爱情。双方互有好感，彼此心仪，日渐生情。直到一天晚上，在朋友家的一次聚会上，除了多了一瓶酒之外，还是那种老方式，狂看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后，一起进了另一个房间。他俩在房间里开始聊天，承认互相喜欢，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开始脱衣服、接吻和爱抚起来了。两人紧紧拥抱，滚成一团。两人每次做爱都好像是两个陌生的尚未共筑爱巢的身体在第一次交媾。后来，他们赤裸裸地躺在花岗岩地板上，聊了个通宵。两人的第一次，最难以忘怀的或许是屁股下凉冰冰的花岗岩。

“爸爸得癌症了。”安德烈斯说。

寥寥几个字硬得像块石头，跌落在床上，跌落在两人中间。玛丽亚娜大吃一惊，吭吭哧哧不知作何反应。

“是肺癌。”

“可是……”

“毫无办法了。”安德烈斯强打着精神又说，“每句话

他都琢磨，都难受，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可能。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她动情地说着，将自己裸露的身体贴近安德烈斯。

“可以用些常规疗法。化疗，放疗，不过是四期了，已经扩散了。脑部有转移。”

“天哪！”玛丽亚娜终于忍不住，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

安德烈斯搂着她。他也希望是另一种结果，不是最后关头，不是终点。想想接二连三的不顺，想想深不可测的“转移”二字，他们顿时惊慌失措，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失声痛哭。

哭声缺少文学价值，没有形式。

“你会告诉他吗？”

“我不知道。”

玛丽亚娜提着睡衣，去厨房端来一杯水。安德烈斯还是不饿。他挪了挪光溜溜的身体，脸朝上望着天花板。小时候他一盯天花板就是几个小时，那是一种锻炼。他不禁回想起和爸爸住过的很多套房里各式各样的灯。老人喜欢搬家。时间长了，喜欢成了他搬家唯一的理由。每隔两年，哈维尔·米兰达就感到浑身莫名其妙地焦躁和一股难以控制的搬家欲。他在各类广告中寻找新住处和出租的单元房。老头搬起家来兴致勃勃，安德烈斯每次都以为是出国旅游，是一次神奇的远足。他不度假，光搬家。

安德烈斯至今还记得,出事后,父亲再也没有坐过飞机,从来没有。他也记得他自己早就克服了恐惧感,可他一直借口不去旅游。直到他结婚度蜜月时,本想到委内瑞拉平原玩几天,可玛丽亚娜就是不去。多亏一个叔叔有家旅行社,搞了一个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价。还不等安德烈斯和父亲交底,她就把机票拿到手了。出发前,父亲喝了六杯酒,回来时喝了整整一瓶。一天又一天的,他哆嗦了四天,每次想到又要坐飞机旅行,他就感到强烈地不安。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纯粹是多余,即使不为治病,就算是为他的生命也纯粹多余。他从未出国度过假,从未在外国医疗机构里看过病。他只熟悉那些公共汽车能到的地方。这就是他父亲,这就是现在的哈维尔·米兰达,一个年近古稀、身患癌症的老人。

他光着身子,望着天花板:少年时期,这姿势意味着长大成人了,他已玩惯了手淫。年龄有年龄的好处。手淫是普遍现象,不可替代,它增强自信,有助健康。但是,即使如此,这也不能同一对男女间的性快感相提并论。最佳性高潮永远是和他人共享。直到玛丽亚娜的到来,两个人才开始如鱼得水,共入佳境。安德烈斯尝到了极度的兴奋,一种神魂飘荡的快感,一种难以描述的化学释放。有时,射完精后,感觉如此强烈,你甚至感到热血沸腾。肉体的享受永远不可避免地神奇地同淫秽、同肮脏连在一起。波德莱尔觉得这是爱的一个条件。“的确,我们只能用大小便的器官做爱。”

玛丽亚娜回来了。她带回了一杯水和心事重重的面孔。这么长时间,她一直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她无法从问题中解脱:“你会告诉他吗?”

清晨,同样的问题依然缠绕着安德烈斯。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嗡叫着,落在左脸上,好像在眼皮上跳舞,他怎么设法赶走它也赶不走。他从书架上拿起阿诺尔德·格劳斯[1] 的《生活必读》,他记得上面有墨西哥医生对那些想“告诉他一切会适得其反”的人和那些认为“隐瞒信息是不道德的”的人们相互冲突的分析。他将目光慢慢挪到书上,玛丽亚娜依然赤裸着身体睡在身旁。他知道,他找不到任何灵丹妙药,更找不到金玉良言,甚至找不到一个忠告。死亡历来是一件平常事:平常得如同一次突发心梗。复杂之处在于生命在病中还没有完结,是迷途者走上不归路的经历。真有必要让父亲知道真相吗?知道真相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会有什么举动?让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背叛了他,他很快就要死去于事何补?

安德烈斯能够掂量出来那个消息对他本人的分量。从看到父亲的脑电图到现在,到今天早晨这讨厌的一分钟,他会有何感受?紧张,神经过敏。一切在他身上都是急:急切的痛苦。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仿佛一股水流,

---

① 阿诺尔德·格劳斯,墨西哥医生和作家。写过多部有关病理学的书,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疼痛的艺术》。

不断地沸腾，不停地外流，弄得到处一片狼藉。他的记忆格外清晰。每时每刻，反复不停，人物、事件……短短几天工夫，他回想起近十年的事。往事像是从盒子里跑了出来，受到了惊吓，正在四处逃散。父亲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吗？几乎七十年的往事会不会突然冒出来？那是告别人生最好的办法吗？

安德烈斯又一次回忆起格劳斯书上的一段话："事实上很难断定什么病人有能力而什么病人没有能力听到全部真相，要断定什么人适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失明、什么时候不能走路或什么时候需要探测仪检查你的肌肉运动，实在错综复杂。同时，有些人显然有能力承受坏消息，而有些人则没有条件承受坏消息。"哈维尔·米兰达属于哪种人？父亲的位置在哪里？那些善于掌控"坏消息"的人们中间，可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父亲吗？一个致命的消息？哪怕是最后的消息？米盖尔也许有道理：你不可能猜到一个常人得知自己死到临头时的反应。无论有什么预兆，那个叫哈维尔·米兰达的人，那个五大三粗、坚定不移的男子汉当面看到自己的脑片也会崩溃，也会陷入危机之中。片子中清晰可见的阴影正在将他吞噬。

* * *

米兰达医生：

我必须向您坦白一件事：我在跟踪您。

到现在，到他写这句话为止，卡丽娜一直认为埃内斯托·杜兰不过让人感到好奇。她满面笑容地看了他的所有来信。米兰达医生的秘书负责处理邮箱收到的全部信件。邮箱是专为联系工作设置的，经常收到很多医学实验室和药厂的推销信。邮箱地址还用来接收所有圈内约会、各种晚会、活动、书会、讲座的邀请信。埃内斯托·杜兰设法找到了地址，开始发邮件。第一封信收到后，卡丽娜立即转给了医生。安德烈斯·米兰达看过之后对她说，信不要紧，不用回了。所以第二封信她连转都没有转。对医生也没说什么，但是看过信了。从第一封信开始，卡丽娜和旁边一间诊室的接待小姐阿德拉依达就对这个与众不同的病人产生了好奇，他们从未遇到过埃内斯托·杜兰这样的人。第二封信来了后，她们就这件事聊了好几个小时。卡丽娜介绍了他的身体状况，她见过杜兰两回，记得清清楚楚。他身材苗条健壮，约摸三十五岁，头发和眼睛黑黑的，一种柏油黑色。风度迷人但不过分。还有，至少卡丽娜感觉，他有某种内涵，自然而然地使他的外表多了一丝沉稳。或许，唯一有争议的细节是耳朵的大小——按卡丽娜的标准实在是太小了。

“小耳朵男人总让人有不信任感。”她对阿德拉依达这么评价过。

卡丽娜现在还记得他：印象不好不坏。他第一次来看病时，觉得他对人态度和蔼、彬彬有礼，但是，再没留下

别的印象。他按照医院的要求填完表,然后坐到一边角落等候。卡丽娜奇怪他没有像大多数患者那样拿本杂志看看。有的人就专在候诊室里看书。

第二次见面时,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卡丽娜清清楚楚记得,埃内斯托·杜兰两手撑着膝盖,气喘吁吁,时不时四下张望着,仿佛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仿佛脑袋不得不随着眼珠四处转动。有几次,他站起来,踱起碎步,走出楼道,又走回来,一直微微点头。后来,他一股脑儿打起电话来了,埃内斯托·杜兰开始变得可怕地准时和执着 。每十个电话里有四五个是他的声音。他总是那么诚恳、彬彬有礼,甚至和蔼可亲。直到有一天下午,米兰达医生把她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要求她,他用的是"郑重其事"——卡丽娜,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不要再转接那个病人的任何电话。

"一个都不许转。从此再不许转。是他,我就永远不在。"他说。

事情没那么容易。杜兰是个没完没了、胡搅蛮缠的人。他很快就注意到卡丽娜在敷衍了事,那些电话交谈不过是缓兵之计。一天下午,他突然爆发了,他感觉受到了欺辱,实在忍无可忍,"这纯粹是侮辱,您以为怎么了……"电话还没挂他就大吼大叫。卡丽娜气得浑身发抖。她在大厅候诊的病人面前极力控制着自己,然后立即向楼道的卫生间走去,她一边走,一边设法保持镇静,她感到心里怦怦地跳:杜兰的叫喊声至少是他的回声在

她身体里回荡。她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两眼充满了泪水。她感到又可笑又可气,感到倒霉。她洗了把脸,想在水珠间多少找回点自尊。

然而,第二天她便大吃一惊,收到一盒巧克力并附了一张便条:杜兰请求原谅。半小时之后,他又打电话道歉。卡丽娜尽量保持着距离,语气待搭不理,说话简短谨慎。杜兰还打算多聊聊,解释解释他的情况、他的急迫心情。卡丽娜语气和缓了一些,尽量设身处地主动向他解释,但怎么说都没有用。她只能建议他换个办法:等米兰达医生能接电话了,她亲自给他打电话。两人挂电话时,似乎谁都不大相信对方。一个星期过去了,埃内斯托·杜兰没往诊所打一个电话,招呼都没打一个。卡丽娜以为他终于忍住了。恰恰在这时,第一封信出现了。接着是第二封,之后又是第三封信。她认真看了三封信。虽然她不想接他的信,但多少还是有些心动。她把信给阿德拉依达看了,两人都觉得杜兰绝望了,觉得他信上说的完全是心里话,也觉得他是个敏感的人,遇到问题了。阿德拉依达甚至认为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的态度有点不对。

"你准备给他看邮件吗?"

"没什么用。"

卡丽娜非常了解自己的头儿,安德烈斯·米兰达态度明确:如果是他,我永远不在。

卡丽娜打印出第三封信,把信拿到一家小餐厅,她们俩每周至少在这儿吃一次午饭。一种加了很多洋葱、辣

椒的海鲜饭，杜兰的新邮件使早餐大为增色。两人不禁想，这个被如此巨大、有力和刻薄的恐惧所包围的男人是怎样生活的。两个女人读到了杜兰每次快晕倒时都在折磨着他的可怕感觉。她们还饶有兴致地继续关注着他同米兰达医生推荐的专家见面是如何失败的。但是，她们想知道的太多了。阿德拉依达打听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做什么的。

“像是搞管理的。”

“我倒觉得他没学过什么，顶多在家电话公司工作，随便打个杂什么的。”

卡丽娜也愿意多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比如：他什么时候结婚的？什么时候离婚的？她奇怪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私事。他和老婆到底过得怎么样？他现在有相好的吗？

这一次，卡丽娜可不那么兴致勃勃了。她不相信新的来信会解答她们的任何问题。阿德拉依达不再好奇。她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从她们见面去吃午饭开始，从朋友告诉她来了一个邮件开始，卡丽娜的脸上总有那种可怕的表情。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我害怕，反正害怕。”

“怕什么？信上说什么？”

“我刚看了一句。”

“一句就吓成这个样子？”阿德拉依达满心好奇地问。

但是，不仅仅是害怕，卡丽娜还感到失望。直到现在，杜兰都是不具备任何威胁的小秘密。他甚至让你感到多姿多彩，或稀奇古怪，但是绝不会造成危险。第三封邮件的开头是警告，像一阵警报声突然在心中响起。她怀疑，她觉得也许她想象的一切根本不是那么浪漫。或许，埃内斯托·杜兰不是一个简单人，一个害怕丧失意志、一个同他人打交道感到绝望的人。也许他就是个傻子，一个脑子有严重问题的人。卡丽娜从包里拿出打好的信，展开来。

"看看他怎么开的头。"她说着，把信放在阿德拉依达眼前。

米兰达医生：

我必须向您坦白一件事：我在跟踪您。

*　　　　*　　　　*

安德烈斯大概和父亲在一起，给他看片子，告诉他真相，讲述发生的事情，或许还劝解他，需要重新做检查，从今往后，他和医学的关系将非常密切，密切得对医学深恶痛绝。他应该和父亲在一起，告诉他，本来就是臭事一桩，他得了癌症，没多长时间活头了。到底多长时间？医生的日历常常不准确：少。永远是少。

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晚尽些责任，尤其是这种如此

痛苦的责任，也是求生临时抱佛脚的一种方式。诗人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也是医生，他写道："观察病人的思维，常常必须像病人观察别人那样带着不信任"。安德烈斯不知道父亲知道真相后会作何反应。他不相信，两人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也拿不准自己，拿不准自己告诉父亲真相之后他会如何反应。他曾经决定面对现实，无论闯什么祸，都和老人家说。可是事到临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感到心中惊恐万状，感到恐惧像一条条小虫，爬满自己的意识，驱使他将责任重新置之脑后：他应该和父亲谈谈，但不是现在，永远是以后。

这又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早晨。他就这样六神无主地过了好多天。为减轻自己的责任，他知道时间所剩无几，父亲生病的事儿搅得他心烦意乱，但是又不能直接告诉父亲。现在，他想和梅尔妮商量商量。她是家里的小时工，每周两天去哈维尔·米兰达家。星期四彻底打扫家里的卫生，星期二简单打扫卫生和熨衣服。安德烈斯把爷爷和孙子们放在电影院，趁机回来和她谈。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所有的情况，但是提醒她父亲依然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梅尔妮知道消息后有些惊讶，但又未表示什么。她是个不苟言笑的女人，没有提更多的问题。有时琢磨不透她在想什么，至少对安德烈斯而言很不容易。当安德烈斯建议她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来上班时，梅尔妮没有回答，显得很害怕，迟疑不决地望着他。安德烈斯对她解释说不是请她做父亲的护士，他

自己会雇一个护士。只是想让她帮衬一把，随时在那儿，每天做做饭，需要时去药店或市场买点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梅尔妮？

梅尔妮三十岁，是个美丽的女人，棕色皮肤，宽大的屁股标致的腿。梅尔妮是个合称的名字。母亲叫梅塞德斯，父亲叫尼古拉斯，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成了她的名字，妈妈取“梅”字，父亲取“尼”字，梅尔尼。再换个女孩的字“妮”，中间的字是公务人员在她小时候登记时给她加上的。梅尔妮和一个叫霍夫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安德烈斯见过他两次，但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泥瓦工，其他一无所知。梅尔妮也很少提起他，她和他生活在一起，但他却不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另外一个人，是梅尔妮的第一个男人，他是哥伦比亚人，去了巴兰基利亚就再没有回来过。大儿子叫威尔默，已经十一岁了，细高挑个儿，瘦骨嶙峋，头发长得编成了辫子，他喜欢街舞和篮球。小的叫尤尔韦，才四岁，一个矮胖胖圆乎乎的小家伙儿，每天上午去附近的学校上学，下午由梅尔妮的朋友代为照看。威尔默则相反，他已经到了满街溜达的年纪了。

“大街不好，”梅尔妮说，“大街上乱七八糟。旁边一个小区里，十岁的孩子就喝酒、赌钱，还有枪。大家全都知道，连警察都知道，也没怎么着。最好也别怎么着，”她接着又说，“幸亏威尔默喜欢运动，多亏老天爷，儿子还算没白养。”

梅尔妮、霍夫雷、威尔默、尤尔韦，安德烈斯奇怪，为什么穷人如此喜欢诸如此类的名字。为什么取这么些名字？为什么不叫胡安娜或赫拉尔多？为什么不叫埃莱娜或者路易斯？叫伊内斯或者拉蒙？难道他们觉得重名太多？太普普通通，太平淡无味，太缺乏特别的亮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取名字的时候，就专挑电影明星、棒球运动员和外国要人的名字。当然，全是英文名字。他搞不懂，那些人为什么喜欢把自己的名字组合在一起，用些简直发不出音来的字母整治孩子们。梅尔妮的例子比比皆是。哈桑和米德莱德的儿子叫哈米。可是，点名时，又和梅尔妮的情况一样。当班的怎么念着顺就怎么写：亚米尔，亚米尔·罗德里格斯。医院急诊值夜班的一个护士就叫这么个名字。难道就没人想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利与不利，名字第一。

梅尔妮不信那一套。而且截然相反。她从来不提名字的事，但显然为孩子们的名字感到心满意足。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明智之举，是巧施权利之举，是一场胜利。她给了婴儿以生命，但是她深知孩子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不过是国家统计数字中贫困线上的一个小点。也许，梅尔妮自己不能左右什么，那是事关大众的现实问题。健康、教育、就业……贫困仿佛已经勾画出一条通往全国千家万户的路：要么飞黄腾达，要么镣铐锁身。也许，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唯一能给孩子们的属于自己的、个人的和私有的唯一东西恰恰就是名字：

一个特别的——例如“威尔默”，这样一个联想到未来，联想到北方，联想起其他事的响亮名字。要么，就是“尤尔韦”这样不同的名字，不同得只有她自己才能想得出来的名字。那也许就是她个人的印记，是她唯一可以做主、最有把握给孩子们的东西。一个响亮的幻想，名字就是机遇。

有一次，安德烈斯不得不来到她家附近，那是几年前她开始给老头干活的时候。有人用小区的公用电话给她打电话，当时威尔默才九个月。“你给他吃什么了？”他们说，“他情况不好，你赶紧来。”梅尔妮顿时神经紧张，她惊慌失措地望着安德烈斯，安德烈斯正好来看父亲，从这儿路过，提出送她回家，还答应帮她看病，但是，梅尔妮拒绝了。最后才满心不情愿地同意他开车把她送到自己家附近。他们沿着高速公路走着，她话很少，急得坐立不安。整个脊柱紧张而灵巧地从左屁股挪到右屁股上。时不时，还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安德烈斯想安慰她，一再告诉她如果事情严重，请她千万通知他，她让他把她放在开始上坡的路上，大山周围正在慢吞吞地建设着艰难的王国。她上了一辆吉普，走了几公里，来到一个警察岗亭旁边的山坡，然后下了车，沿着一条水泥台阶路，向自己的小区、向自己家和正在发烧的威尔默走去。

她大约晚了一个多小时，单单是最后一段山路就有四百多级台阶。她妹妹数过一次，她对他说。一步一步，一边上一边数。她是一个人来的，很晚了，是晚上。她心

里害怕，为了分散注意力才数的，整整四百二十二级。

到现在，安德烈斯还清楚地记得那件事。当时，选战正酣，他回到家，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些政治宣传。轮到穷人讲话时，候选人一边高喊口号，一边攻击老政党，承诺给选民一个崭新的天堂。那里，也有一片天空，天空下所有人都叫“威尔默”。

梅尔妮依然住在原来的地方，过着原来的生活，像原来一样担惊受怕。为了来老米兰达的家，她上上下下这些台阶浪费了多少时间？每星期两次，所有星期都来打扫卫生，来结束另一个人制造的不卫生。四百二十二级台阶去，四百二十二级台阶回。吉普、大街、通到地铁口的公共汽车，十二站之后到达另一处地铁口，又是一条大街，另一路公共汽车直通楼门口。为了对付那片已经渗入并非自家厨房地板上的污渍，她每天都要来回走很长的路。每天工作之后，她踏着一级级台阶走回家中，看着广袤的山坡上那一片片低矮的小屋和草棚，看着这些连警察都不敢进入的地区，她想到天堂了吗？她感觉到天堂了吗？当她拾级而上，想到威尔默已经不是一个发烧的孩子，他另有危险，他已经到了能够杀人的年龄，他可能是个坏小子时，她应该怎样防患于未然？怎样才能助他一臂之力？

有一阵儿，安德烈斯怀疑梅尔妮的目光后面究竟藏着什么，那两只常常落落寡欢、难以理解的眼睛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她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她不会满意自己的

生活。无人会满意这四百二十二级台阶。这就是她目光中的隐情？这就是她眼睛里的一切？一种滞留于心中的阴暗无声的愤慨？他突然感到浑身不寒而栗。没准儿梅尔妮根本就不在乎父亲。这么多年，近在咫尺，朝夕相处，但又相距遥远。现在看着她，他感到素不相识，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对父亲有什么感觉，或许她只考虑自己的工作。或许老米兰达的死对她只是纯粹的公事。或许不是。他突然可怕地想到，梅尔妮在悄悄地恨着他们。恨他们？

她终于说话了。有点断断续续、不好意思，但是，没有遮遮掩掩，没有藏着掖着。她不喜欢为一个马上要死去的人工作。没有什么个人原因，就是不想哈维尔·米兰达突然去世时待在他家中。安德烈斯认定是这么回事。她自己没说，没那样说。后来，她讲话暗示多于直言，谈起话来含含糊糊，长吁短叹，欲言又止。直到最后，她只说了句再考虑考虑，仅此而已。再考虑考虑。

“一会儿我告诉您。这会儿我得去打扫卫生间了。”

※ ※ ※

米兰达医生：

我必须向您坦白一件事：我在跟踪您。我向您发誓，我现在可以当面见到您，看看您见面时作何反应，您觉得呢？您烦了？您担心了？也许您害怕了？也许您根本就

不在乎，甚至感到很开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我只想清楚地告诉您，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心血来潮，纯粹是彻底绝望。我想方设法和您联系，但您就是不回我的邮件，您的秘书一直骗我，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您搭理我，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这也许是您理解我为什么感到走投无路，这一切为什么让我焦头烂额的唯一方法了。您想想，我的工作已经开始出问题了，我害怕他们甚至会解雇我。真的，打击越来越多，我一感到要晕倒的时候，血压就下降，我照例马上往厕所跑，用凉水洗脸、深呼吸。有时，我头朝下用手撑着地，就像小时候在学校做操时拿大顶那样。我用两手撑着地，脚靠在厕所的墙壁上。这样，血液又重新流回大脑，避免晕倒了。

不久前，有个检查人员怪笑着对我说，听说我最近以洗手间为家。有一天，就像我跟您说的那样，我正在那儿手撑着地，旁边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进了卫生间。当然，他看见我那个样子大吃一惊。我本想向他解释解释情况，但肯定他什么也不相信我。他没准儿以为我疯了。真的，我上班时感觉愈来愈不好。我知道别人在议论我，在怀疑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一见到我，就你捅捅我我捅捅你，低声议论起来。

前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医生。我趁着他们在办公室消毒的工夫，早早地去找您。我知道您下午三点才开始看病人，可是我觉得您没准儿在院内参加什么别的活动。

以为您可能在查房或在手术室。我四下转了好几圈儿，甚至去了咖啡厅。我还向两位护士打听您。我没有找到您，但是我坦白地讲，哪怕是人在那儿，哪怕是在找您时，我都感觉好多了。

我正打算回家时，突然看见您了。我远远看见您在大厅里。我走了过去，您在尽里面，坐电梯下停车场去了，我加快脚步想追上您，但是没追上。等我追到电梯前，电梯门已经关上了。我像电影里那样，急忙向楼梯跑去。我拼命往下跑，撞上了一个拄拐杖的夫人，可我没理会，接着狂奔。那简直是在和时钟赛跑：您知道，医院有五层地下停车场。我怎么知道您的车究竟停在哪一层里？我怎么知道您从电梯去了哪层停车场？我两个两个台阶地跳着往下跑，每到一层都探出头，飞快地扫一眼，想追上您，想看看究竟有没有您。您穿了一件石榴色上衣，一条蓝裤子。

我没有找到您。一直没看见您，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第五层停车场。电梯门开了，一位夫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走了出来。小姑娘头裹绷带，面色苍白，嘴唇跟涂了绿颜色似的。夫人看见我有些吃惊，像是吓着了，加快脚步向停车场的公共汽车走去。我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喘了口气。后来，我想了想发生的事，其实，我就是能追上您，您会有什么反应？一眼就能认出我来？您会知道我是谁吗？

整整一下午，我心里奇怪地轻松了许多。也许像每

次给您发信时那样感到轻松。

相信我们很快会见面。

埃内斯托·杜兰

※ ※ ※

下午歇了。他叫秘书取消了所有约会,取消了门诊。之后,他来到马里佩雷斯站,上了电动缆车。平常日子,用不着等多久。排队的只有几个从学校跑出来的小家伙儿,他们在逃避所谓中学组织的烦恼。整个旅途中,他们之间不断开着学校的玩笑。安德烈斯沉默不语。说不定哪个星期三,他的哪个儿子也在那帮人里。他们嬉笑喧闹,有人买了包烟,打算到山上,到埃尔阿维拉山顶去抽。他们约摸十三四岁模样。安德烈斯觉得,这时,也许应该对他们讲,告诉他们,他是医生,提醒他们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就是找死,哪怕你才十五岁。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没有意义。他了解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是从那儿过来的。少年时期是所有幸福中最为奇特的幸福。

安德烈斯有些年头没上山了。年轻时有一阵儿,他能来便来。埃尔阿维拉有如一个自然天成的贸易中心,没有刻意雕琢,不见明亮的玻璃展柜,充满神奇:昏暗的过道长满蕨菜,条条小径引人入胜。安德烈斯和他当时最要好的朋友维森特每星期一都上山。很多时候,他们还走着上山。他们随便选择上山的路:胡利娅、克夫拉达

·帕哈里托斯、科蒂萨…… 登奈瓜塔山峰最为冒险。那是海岸山脉的制高点。那儿,他们坐在一块巨石上。云彩不厚时,可以从一边看到整个加拉加斯城,另一边是大海。他们坐在那儿海阔天空地东拉西扯,吸大麻。对维森特说来,那可不是简单的消遣和周末聚会,他小心翼翼地组织每场聚会,简直成了组织溜号的专家。他常能搞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次,他搞到了一根上等的牙买加雪茄。两个人闷头抽着雪茄,躺在山石上望着天空。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嘴唇上荡漾着由衷的微笑。

山顶的光线特别刺眼。烈日像耳光抽在脸上,有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消散在空中,他也仿佛飞驰在云端。风能吹裂他的双唇,手指仿佛刮脸的刀片一般。与其说是登山,不如说是起伏飘荡在山峦之巅。

关于维森特后来的情况,他只知道他住在坦帕附近的佛罗里达,在那儿卖吸尘器。大麻结下的铁哥们儿因大学作息时间不同而分道扬镳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维森特是安德烈斯最好的哥们儿。他开始行医时,维森特刚进工程系。他们不知不觉就不见面了,安德烈斯甚至觉得他们的友谊也是一门中学课程,他和维森特的交情如同数学、令人烦恼的西班牙语、消磨意志的历史课一样,成为过去。几年以后,在电影院排队买票时,他一个哥们儿告诉他,维森特去美国了,同一个妻子及三个孩子一起,过着酒足饭饱的太平日子,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从缆车站附近的温布尔特饭店,你无论怎么转头都

无法同时看见城市和大海。没有巨石，太阳看上去也不那么近。安德烈斯漫步在往事之中。那个年纪，还不到十五岁，他还没有梦想做个医生。究竟怎样决定学医，他还真得好好想想。人们在疾病中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身体之中玄机四伏，一个令人茫然失措，甚至心生厌恶的信号。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认为医学是一个执着、圣洁的使命：有了医生，才有了毫无畏惧地探求他人内心世界的人，才有了具备面对其他血肉之躯能力的人。

但是，安德烈斯觉得他的情况则不然。他认为，就他而言，医学不仅是一种使命，它首先是一种新奇感。他永远不会认同当医生就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传教士，一个循规蹈矩的信教人，一个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的志愿者。医学不是人类的一种品质，不是一种品德。

每当他想打开记忆的大门，总会看到同一个景象：马加里塔岛上埃尔阿瓜海滩的黎明。那时，安德烈斯十岁，母亲刚刚去世。大概因为这个原因，父亲决定两人到岛上去玩一个星期。当然，他们是坐火车渡轮去的。那完全是为拆掉加拉加斯的房子而安排的家庭计划，为了在不给孩子造成更大伤害的情况下，消除母亲对他的影响。哈维尔带儿子去了海边，姐妹们清理了橱柜，分掉了衣服、假珠宝和可怕空难后的其他遗物。等他们回来后，可能面对一个不大熟悉的地方。到处空空荡荡更好，不那么令人伤心。

他们在拉克鲁斯码头上了渡轮，那是一艘老渡船，船体吱吱呀呀。安德烈斯觉得上了一条生了锈的大鲸鱼，简直就是冒险。他在甲板上跑，久久地望着大海，等待着海豚破浪而出。他从没有坐渡轮旅行过，从来没有上过海岛。现在再想一想，对父亲来说，当时的每时每刻有多么可怕——哈维尔，一个孤独老头带着一个十岁的孩子。

“跑呀，快跑。”他总在对他说，“你想玩什么？”

他给他指大海，指翻腾的浪花，专心致志地守在他身旁，等待着鱼儿突然从水中跃起。他在那儿，竭尽所能地想让儿子忘掉和不再怀念母亲，用阳光和咸咸的海水填满母亲的空白。加勒比海的激情必将挑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学说。安德烈斯跑来跑去，父亲百依百顺，一会儿买橘子冰棍，一会儿买鱼肉包子，直到后来，终于隐隐看见了海岸线，看到了蓬塔德别德拉斯码头，两个人这才靠在渡轮栏杆边上，等待渡轮靠岸。哈维尔·米兰达对他讲述等待他们的海滩，告诉他未来两天精彩非凡。这就是他对夫人的悼念：为儿子安排一个节日。

多少年过去了，他一直在那些日子里，在马加里塔岛上的一星期时光里寻找自己可能对医学产生的第一次兴趣。事情是在第三天发生的。父亲总是早早地把他叫起来，好像担心安德烈斯会自己醒来，好像容不得儿子有片刻时间无人呵护，无人陪伴。太阳刚刚露头，父亲便喊他起床，想给他一个惊喜，给他一个冷不防。头一天去钓鱼，一无所获。第二天早上，他便提议跑到海边抓海蜇

去。天那么早,阳光微弱,沙滩冰凉,肯定能找到海浪手指遗弃的海蜇。海蜇白白的,都是夜里被冲到岸上的,可以用水煮。它们无人顾及,横七竖八,肥肥大大而又松软,它们回不去了,和其他海草一样留在了沙滩上,被空气窒息,被烈日晒干,无可奈何地慢慢死去。

冰凉的海水已经漫到脚面,安德烈斯终于醒来了。他几乎走了两里地才找到一个小海蜇。海岸那边,一辆警察巡逻车停在海滩上,周围围了一群官员。他们俩飞快地跑了过去:一个男人的尸体横在沙滩上。衣服有点凌乱,皮肤呈深紫色,嘴唇肿得大大的。右眼窝里冒出一股黄水,好像从人脑中逃出来的活珊瑚。哈维尔·米兰达使劲拉住儿子的胳膊,打算把他拉走。安德烈斯死赖着不走,入神地看着尸体。警察们虚张声势地解释着案情。他不是游客,估计是本地一个钓鱼的人。大家正在等候法医验尸。

“他还活着!”安德烈斯说,带着孩子特有的急切。

父亲在听官员们讲解,他好奇地又往身体跟前凑了凑。他听到了他的呼吸声,看见他张着嘴,感到他肥厚的嘴唇在微微地颤抖,他弯下腰,又听到了他喘气的声音。

“他还活着!”他又喊道。

只有父亲,匆忙站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官员们相互看了看,笑了。其中一个人还笑出了声,安德烈斯清楚地记得。

“他还喘气呢!”他于心不忍地嘟囔道,父亲把他从尸

体旁拉开了。

“不对，”警察说，“听好了，小家伙儿，那是他身体里的水晃动的声音，没别的，你听听。”警察说着蹲在他身旁。所有人一时观望起来，恰好一阵流水声传来。“听见了吗？是水声。这家伙早死了。”

安德烈斯惊呆了。他在想象那个注满海水的躯体，海水在里边奔流，发出声响，它左右翻滚却无法逃出那个身体。他觉得那个身体仿佛一间密室，海水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涌动。那天早上，安德烈斯第一次对身体产生了好奇，第一次发现存在着一个与语言完全不同的，但更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显而易见的道理。他父亲使劲儿拽他，想把他从那儿拉走。男孩想等医生，想看看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父亲显然害怕事件暴露他正要隐瞒的丧妻之痛。一个亡者在呼唤另一个亡者。遗弃在沙滩上的陌生尸体，也是妈妈的尸体，浮现在两人眼前，围着他们打转，缠绕和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安德烈斯不记得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比如说，他不记得那天是不是和父亲说到了死，谈到了空中爆炸的飞机，不记得那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到底是那天早上去海边捉海蜇之前还是之后冒出来的。恰恰在那时，也许是他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第一个目标。十七岁高中毕业，他决定学医。虽然决定的方式有些孩子气，但是那个年龄的人都是如此，是好奇之心使自己冲动，他渴望探索身体里的秘密。

晚上七点钟,他下了山。下山的缆车上早已空无一人。他感觉运气赋予他一份难得的天时。回城的旅途中,到处风景秀丽。灯光明亮的高速公路,华灯初上的城市和小区在夜色中勾勒出另一幅图案,一个不同的城市,一个梦幻般的城市,一幅静止的画面,一个灵光闪现的加拉加斯城,一个他一旦进入其中便注定将消失的加拉加斯城。他高悬在空中,高高吊在远处悬崖般的城市之上,安德烈斯终于下定决心,用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老爸,"他说,"你愿意和我到马加里塔岛去吗?"

* * *

当年红火的时候,酒吧曾是酒店。房梁上吊着山地火腿,每杯酒店里奉送一小盘下酒菜:面包鸡蛋、烤沙丁鱼、橄榄。如今,承袭西班牙传统的只有名字:拉斯西贝莱斯[1]。不过,这里还是本地上班族六点下班后聚集的地方。职员、秘书、主管、低级公务员,你来我往,推杯换盏,借着酒兴交换着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整个酒吧酒气醺天,化学浓缩物甚至能指出一条去卫生间的路。酒吧柜台一角,阿德拉依达和卡丽娜大概在等待下午收台换掉中午的桌布。埃内斯托·杜兰的最后一封信依然是

① 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名。

菜单上最有滋有味的美食。

“我什么也不能对米兰达医生说,他很早就通知我取消所有的会面。他说下午不来了。你知道他爸爸那个了,听说老人家特别不好。”

阿德拉依达将将能听见她的话。卡丽娜神情坚决,讲起话来飞快而有力。整整一下午,她就没想过别的事。

“这就有点过分了,”她局促地拽了拽上衣,又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过这事我也必须告诉医生。”

“卡丽娜,你也别大惊小怪。不是世界末日。”

“如果那家伙真疯了呢?”卡丽娜坚持道,她真的担心。

“不就跟踪他个一天半天的嘛。他现在绝望,想见他的医生。”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阿德拉依达,你别这样!”

“我也说正经的。”她话中有话地望着她,转过身去放低声音又道:“一个人做事经常不可思议。你还记得我求你陪我跟踪切欧吗?咱们一块儿去了莱库纳大街那个鬼地方。”

“你想看看他是不是真在那儿和朋友们玩多米诺!”卡丽娜想起来了。阿德拉依达会心地点点头,张开胳膊,似乎在证实那次荒唐的经历。

“是不是不可思议?”

“那个藏污纳垢的鬼地方,挤满了妓女和酒鬼。”卡丽娜若有所思地说,“你估计他在骗你,给你编故事,你不就

是需要证据吗？”

“要是有人在那个时候、那个钟点、那个地方看见咱俩跟踪我老公，要捉他个正着儿……人家会怎么看咱们？会说什么？”

两个人面面相觑。难道埃内斯托·杜兰也想玩这一手？他需要证据，而且正在没头没脑地设法寻找证据，不顾一切后果。他已经无所顾忌，他已经失控了。所有人，不管是谁，哪那么容易就失控了，你越不想什么什么还越来。就像阿德拉依达，搜集了全部疑点，不就盼着弄个明白吗？同样，都需要了解真相，杜兰也在企图了解真相，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就活不下去了。疾病也是背信弃义，也是无法接受的不忠。

啤酒喝到了第三杯，阿德拉依达突然问：

“如果你回信给他呢？”

“什么？”

“一码事，你给他写信，他就当你是米兰达医生。”

“你脑袋进水了吧，阿德拉依达，你怎么能生出这种念头？”

“为什么不行？”

“废话，就是不行。因为米兰达医生就是米兰达医生，卡丽娜·桑切斯就是卡丽娜·桑切斯，因为那种鸟事不能干，因为……”

“等等，等等，你听我说。”阿德拉依达打断她的话，她挪了挪凳子，紧挨在卡丽娜身旁。“你想一下，如果你什

么都告诉米兰达,如果你给他看那份邮件,你觉得会怎么样?”

卡丽娜迟疑了片刻。她恍惚看到了安德烈斯一本正经地站在她面前,手拿着信,眼盯着内容在念。可是,这个画面立刻又消失了,眼前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我连想都没想过,医生没准儿是什么反应。”

“那就对了。”阿德拉依达又往前凑了凑。“他可能笑一笑,什么都不做……要么叫警察。也可能把这个杜兰的事闹大。”

“可是……”

“我还没说完呢,你等等。我没有让你去犯罪,卡丽娜,你了解医生,你跟他工作多长时间了?”

“七年。”

“比好多夫妻的时间还长。那好,你听着:你熟悉他的风格是吧,差不多吧,他怎样写信,他会怎样给那类病人写信?”

“我不是医生,我没学过医。”

“那倒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给他写信,对他说点什么。”

“这种事你想都甭想。”

“当然能想。我认为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有人对他说点好话,有人搭理他,有人多少给他点重视。”

“我觉得,阿德拉依达,你喝多了。”

“不就是试试嘛，你给他写一次。就算为了让他不再跟踪医生，让他收到信后安静下来。这样你等于帮了两个人。”

卡丽娜稍稍犹疑了一下。抬眼的工夫，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可能性出现了，她的确可以试一下。所有的诱惑刹那间鲜活起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需要。

“那样你能有什么损失？”

其实，她也将一无所获，可是，诱惑依然在那儿，等着她。为什么？难道她喜欢埃内斯托·杜兰？当她第一次看到他走进诊所时，觉得他很和善，也许，但不是，绝对不是化学释放，她没有感到一种突然的、难以表达的吸引力。是杜兰的信渐渐打动了她。其实，她从信上对他的了解远比通过见面或是同他交谈时的了解要多。从他写信和读他的来信，她那份惺惺相惜之感愈发强烈，而现在，那种感觉开始变成了紧张、变成了冒险。字里行间的他比她所见到和电话交谈过的他更使她感兴趣。她甚至觉得那是两个不同的人，而自己不知道两人中哪一个更真实、更实在。难道这就是她动心之处？

“好吧，”卡丽娜说，矜持地一笑，“一次，就一次。”

* * *

尊敬的杜兰先生：

来信多次，迟复为歉。您知道，医生的生活太忙，近

几周来又赶上我特别忙。

我认真看了您告诉我的全部情况，觉得很有意思。眼下，我认为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静下心来，尤其是不要做任何蠢事。我指的是跟踪我，我指的就是这件事。我和您没有任何过节。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您的情况，尽快亲自接待您。

本周我将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但是，回来后我会尽快与您联系。同时，如果对您有帮助或能使您轻松，您尽可继续给我来信。但愿此信能使您再度安静下来，您非常需要安静。

谨此

安德烈斯·米兰达

*　　　*　　　*

当安德烈斯通知她要休几天假，陪父亲到马加里塔岛去时，卡丽娜看到了上帝之手，她感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背后，显然有一只强大的能量之手、无形之手。这个消息是她的缪斯，给了她大胆写信的最后动力。她犹疑再三，想从医生的角度写，试验了不同的语气，写了好几份草稿。有时，米兰达本人也要求她拟一封简短的回信，几乎全是回复药厂销售部门的咨询。信简单明了，寥寥数语，客气地感谢寄来试用药品，没有拖泥带水，没有个人情感，每封信对卡丽娜来说，写来得心应手、毫不费神，没

有那种在白色显示屏前突然发现的莫名焦虑：能够随意选择文字，使她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强烈空虚。她忽而浑身无力，忽而迫不及待地要写信，不停地写，多多地写，无拘无束地写。能够选择，比如，究竟用尊敬的……还是亲爱的……这完全是一种发现。卡丽娜字斟句酌，几乎用了一个小时，她不喜欢言辞犀利的写法，不喜欢油腔滑调，她反复比较每个词会对杜兰造成什么影响。思前想后，打算试试米兰达医生最后给他写信时使用的第一个字。她终于决定用“尊敬的”开头，一方面，她觉得那样写更正规、更严谨，再说了，她喜欢用“尊敬”二字。她绞尽脑汁也找不到别的理由、别的原因用其他词儿。她喜欢用“尊敬”开头，就是喜欢。

至于其他病人，安德烈斯同米盖尔打了招呼，米盖尔答应，只要他们来看急诊，都可以接待。另外，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医院另一位内科医生马丽克鲁斯·费尔南德斯随时待命。家里也没问题——玛丽亚娜认为计划非常周到。孩子们有点反对，但很快就会服从：父亲和爷爷要旅游一星期，他们不可能陪着而不去上课。老米兰达显得有点多疑，但是安德烈斯很快就打消了他的疑虑，告诉他旅行纯粹是应付生意：有一个商业社团快解散了，给他提供了一套房子作为一种补偿。安德烈斯觉得，那说不定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决定去看看，顺便重温父子多年前的旅行，为什么不旧地重游呢？

现在，他站在渡轮甲板上，眺望着码头。同样的身

影，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姿势，多年前的情景，有多少相同又有多少不同啊。一丝微笑浮现在双唇。他为自己的花言巧语，为自己幼稚可笑地生造出一所房子、一个垮掉的商业社团的谎话感到一丝得意，谎话多少让他得意：一种毫无底气的得意，不知道如何和何时信手拈来的谎言，怎会让他信以为真，哪里有房子，为旅行瞎想的理由究竟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安德烈斯两手扶着栏杆，看着拉瓜依拉港渐渐变得渺小，测量船速唯一可信的标尺——地平线，也愈来愈模糊不清，愈来愈广袤无边，然而它却是现在唯一真实的标志。渡轮是个庞然大物，你弄不清它到底是不是在动，更准确地说，渡轮像一条晕船的狗，在海浪之上打转转，只有地平线在变化、在消失。

"想什么呢？"老米兰达从卫生间回来，手扶栏杆站在他旁边。

"没想什么。看看大海呗，来杯啤酒？"

父亲说了声好，两人便向酒吧走去，渡轮空空荡荡，不多的几个德国游客看上去似乎有点迷茫，好像为人所骗，好像委内瑞拉不过是一个地理错误，不过是柏林哪家旅行社宣传册上的一个失误。里间的桌子旁有一对夫妇，安德烈斯上船时就注意到他们了。女的还算顺眼，约摸三十岁，至少看上去三十岁模样，满头披肩发，面色忧郁，穿了一条浅咖啡色短裤，一件无袖白法兰绒上衣，将将兜住她那又小又硬的乳房。男的则是个地道的胖子，典型的四十岁男人，大腹便便，养性胜过修身。这会儿他

正在喝啤酒，手里还拿着手机，正在大声交谈，他走来走去，故意指手画脚，同时，轻蔑地望着老婆，似乎讨厌她，似乎和她在一起是在尽一份令人讨厌的义务。他那夸张的架势，使安德烈斯不禁怀疑，他究竟是不是在跟谁通话。他扯着嗓子发号施令，仿佛在和下属、和员工讲话。他一直不接电话：每次都是他自己挂掉电话，立即又开始拨号，然后重新开始如法炮制：走来走去，两手在空中比比画画，扯着嗓子，故弄玄虚，明摆着想让别人看到他、听到他在讲话。他旁若无人、毫无风度，一直不放低嗓门。安德烈斯看出他纯粹在做戏，一场连老婆都愈来愈难以忍受的闹剧，所以旅途中她面带忧郁，感觉悲哀，她或许在想，这不都明摆着吗，谁都会一眼看穿。她的丈夫，她的未婚夫，她的伴侣，不管是什么吧，实在滑稽可笑，她没准儿就是这么想的。有一会儿，他远远朝她喊了句什么，安德烈斯没听清，可是却看到她连忙站起来向酒吧走去，他这才明白，胖子吩咐她去再要一杯啤酒。他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攥着空啤酒罐。电话还算结实，空罐却捏扁了、捏废了。他随手扔到海里。

“坐渡轮旅行烦吗？”

父亲感到歉疚：为了他，为了他的病，他们才在这儿，才上了一条要航行五个小时的渡轮。如果不是他一直害怕坐飞机，同样的路程本可以坐飞机，在空中飘上个三十来分钟。安德烈斯告诉他没关系，他挺好，不着急，再说，能再坐坐渡轮很开心。哈维尔·米兰达拿不准，他觉得儿

子这么说是在搪塞他。不过倒也没关系，反正他心里感激他。他最害怕的就是坐飞机，他陷入这种恐惧难以自拔。他觉得只要两脚一踏上飞机跑道，浑身立刻开始哆嗦。他控制不住，他面色铁青、双唇肿胀，眼眶针扎似的难受，两只眼睛直往脑子里缩，眼珠仿佛要逃进五脏六腑里。只要一想到天上的飞机，他就感到恶心。他需要岔开思路。

“我们上一次旅行时，你妈妈刚死。”他说。

“是的，你想让我散散心。”安德烈斯回答说，“你想让我远离家门，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老人想，现在他们也许在做着同样的事，只不过反过来了。他一时不知如何表达才好，他一开始就完全明白：两个人正在重蹈覆辙。但是，这一次相反，或许是他，安德烈斯，是他儿子在设法让他散散心，是这样吗？他未敢问出口。

蓬塔德别德拉斯港依稀可见，它像一个模糊的影子紧贴在天空尽头，胖子又向老婆要了一杯啤酒。现在，所有的人都来到了甲板上，不多的游客中大部分聚在船头观赏海岸，观赏着临近的目的地。一个小男孩朝大海呼喊，反复喊着同一句话：海豚！他久久地拉着长声，吱呀乱叫。海豚！接着又吹着口哨呼叫海豚。说不定有人告诉他，海豚就是狗，小家伙信以为真地乱喊乱叫。他冲着父母大喊大叫、强烈抗议，报怨一路上一个海里的动物都没见着、没记住。没见到一条鲸鱼，没见到一条金枪鱼，

没见到一只海豚。

“你们骗我!”小男孩喊道。

父母显得不耐烦了,仿佛看护儿子也是其他旅客的责任,把儿子撇在甲板上,双双向船舱走去。

“罗伯托,我们一会儿就来。”他们说。

“海豚!”

安德烈斯也借机向舱内走去。其实,他感兴趣的是那个打手机的胖子的老婆。他假借找咖啡,也来到渡轮顶部。老爸在那儿看地平线。看那只是一片海雾笼罩、只是背景上一团污渍的地平线,舱内有空调,但不太凉快,制冷不够。几只苍蝇好像晕船,在半空中扑闪着翅膀,慢悠悠地飞来飞去。安德烈斯突然想,小男孩找什么海豚呀,还是抓苍蝇去吧。可是,他一走近柜台,立刻就忘了小男孩,因为那个女人正在那儿等啤酒。他凑过去,冲她微微一笑,想套近乎。突然,他心里生出一丝可笑的感觉。多少年没这么干了?其实,他并不想勾引女人,不过是逢场作戏,练练谈情说爱的肌肉,恢复恢复他久已荒疏的体操。女人也冲他笑了笑。除了微笑没有别的意思,安德烈斯估摸着,随即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安德烈斯假装打了个哈欠,这纯粹是无济于事的雕虫小技,可他没别的招儿,他又笑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等待了片刻,又侧眼打量了女人一下,最后终于壮着胆子搭了腔:

“够长的,是吗?”他说,但是几乎同时又表示了歉意。“够长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的，够长的。”女人停顿了一下，回答说。

安德烈斯回报以一个巨大的、感激的微笑。她的微笑比他的小，不过没关系。侍者端来了啤酒，女人付了钱。安德烈斯问她是不是住在马加里塔，她说不是，她住在马拉凯，陪丈夫到岛上办公事。这一下，安德烈斯终于明白了，那个没完没了地不知用手机和谁聊天的胖子，首先是她丈夫；其次呢，是个有工作的人：一个生意人，一个既做生意又旅游的人。女人没有离去，好像在等着侍者给他拿咖啡来。她飞快地把啤酒拿给丈夫，没有流露出忧郁。安德烈斯暗暗高兴，他觉得啤酒大概已经热了。他们漫不经心地聊了起来，似乎出于本能，似乎两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就是迫切需要打发时间。就这样，他知道了她叫亚迪拉，不久前刚成了胖子的女人，她没有同他结婚，但称呼他老公，他们没有孩子，也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在同居，搞不清亚迪拉是不是他的第二战线，是不是胖子正式家庭之外的分支机构。安德烈斯骗她说自己离婚了，陪父亲到海边来玩几天：“您知道吗，有时候还是散伙儿的好。”他不特别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但是，他觉得这是游戏的一部分，轮到他这样活动活动了。他要了第二杯咖啡。她继续讲述她的生活，越讲越细，越讲越高兴。啤酒罐在柜台上挂满了汗珠。

亚迪拉讲起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告诉他为什么在打手机的胖子突然出现之后放弃了高中学业：胖子脸贴在玻璃钢窗上，从窗外、从甲板上望着他们，手指敲打着那

个走运的玻璃窗，鼻子挤压在窗户上仿佛一张猪脸。亚迪拉显然情绪极坏。她甚至连招呼都没打，拿起啤酒便走开了。

“你去哪儿找咖啡了？加拉加斯？”

“我在和一个女孩聊天。”安德烈斯笑着说，把杯子推过去。老米兰达凝神听他讲，目光顺着甲板扫了一遍，似乎想找到儿子为之迟迟不归的姑娘。

“那位。”安德烈斯没跟他兜圈子，嘴唇朝船舷一侧一努，“那边。”胖子已经不打电话了，很显然，他在折磨亚迪拉。

“挺漂亮。”老头评价说。

安德烈斯点点头。然后，重新转向岛上，现在才是岛，有形、立体，是那种干旱、荒芜土地的黄色和红色。背风的地方阳光刺眼。这时，老头转来转去，想探探他们这次旅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安德烈斯早就知道他会冲什么来，知道父亲千言万语之后惦记的是化验结果，是X光片，是核磁共振……现在一切就在那里，在茫茫大海之中：水面之上也有一间手术室，有蛇一般游泳的探针和导管，四处漂着纱布、纸张、针管和注射器。太阳则是黄色的听诊器。安德烈斯从侧面注视着父亲，他把右手当成眼罩，贴着眉头想遮出一片阴凉。说不定现在是说出真相的最好机会。真的？好机会？最佳时机？会不会太早了，还没到岛上呢？之后会怎么样？从安德烈斯告诉他真相那一刻起，旅行将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父亲说，他竭力收住想问他的话，“我觉得没准儿还有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

永远都是还有什么。有什么活动了，有什么损坏了，有什么没用了。这就是身体的必然历史，这就是毁灭的传记。健康是固定的理想，是最邪恶的空想。米歇尔·富科[①] 说过：如果从死亡出现开始算起，疾病甚至可以被看做是生命的作业。“尸体从发病之日起，它便在不合逻辑地活着。”是的，健康不存在，它是一片天空，不属于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人类只能带病而活。仅仅以父亲为例，病已属晚期。之后是什么？老人继续望着他，好像也在暗暗等待秘密的暴露。为什么现在——此时此刻，不告诉他真相？

亚迪拉的喊声像一块巨石。所有人回过头去看，胖子使劲儿拎着她的手，她人已离开了地面，但却强撑着站着。他刚刚一拳打在她的脸上。亚迪拉捂着脸，晃着头。

“放开我！”她号叫着。

然而，胖子全部的回答是给了她一脚。紧接着，又是一脚，踢在肚子或肚子上面。说不定踢到肋骨或胸上。安德烈斯一下跳起来，想冲过去，可是，父亲死死拦

---

① 米歇尔·富科（1926—1984），法国哲学家，主要作品有《语词与事物》、《守护与惩罚》和《疯狂的故事》等。

住他。

“别胡来。”父亲对他说，“你少搀和。”

老头一时性急，指甲深深地掐入儿子的身体，有些好奇者起哄，德国游客们面面相觑，搞不明白是真打架还是欢迎仪式的精彩节目。船上两个工作人员向两人跑去，打算制止他们，可不等他们赶到，胖子一个大耳光把亚迪拉打得终于倒在地上。胖子被拉住后，他还在使劲挣扎，大喊大叫着辱骂她。又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四个人一起才把他推走了，几秒钟的时间，亚迪拉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坐在甲板上，蜷缩成一团。她低着头、捂着脸，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动物，害怕地哭泣着。安德烈斯又一次想冲过去，可是父亲拦住他，力量大得吓人。

“你不能，”他低声警告，“你越想管，人家越收拾她。”他又说。

安德烈斯有点惊奇地望着他。一位夫人走到亚迪拉跟前，扶她站起来，递给她一块手绢，让她擦干脸上的血迹。去洗手间的路上，亚迪拉和安德烈斯的目光短短地交汇了，她立刻低下了头。

从渡轮的肚子里开出汽车后，他们从夫妻俩面前经过。亚迪拉依然目光低垂，身旁，胖子正在打手机，一个出租司机正把两个人的行李放进汽车后备箱。接着，胖子打开车门，一边讲话一边闪到一旁，让亚迪拉先上车。当她从身边经过时，他粗鲁地胡噜了一下她的头发，她不太信任地闪开了。去酒店的一路上，安德烈斯一直从倒

车镜里看着出租车。有一阵儿，高速公路上，午后的阳光把出租车变成了一张小刀片，一个尾随在后的薄薄的小铁片，他不紧不慢地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同样的速度，锋利的小铁片一直在那儿，一直尾随着他们。安德烈斯看了看身旁的父亲，他困得实在不行，已经睡着了，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沉睡在梦乡之中，显得格外幸福，显得心满意足。

* * *

尊敬的米兰达医生：

您回信了！我实在无法相信！我发誓一看到我的收件箱里有您的名字，我顿时浑身无力。我的双眼饱含热泪，真的。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坐下，又站起来，又坐下……我坐立不安！我想喊，想跳，想跑。我想走出去敲邻居家的门，我想从窗户探出身子大喊：来信了！米兰达医生终于给我来信了！真的，医生，我热泪盈眶。说实话，直到现在我的眼睛还湿着呢。我觉得现在给您回信，实在太莽撞了。我现在只能说谢谢您，医生。谢谢！谢谢！谢谢！

埃内斯托·杜兰

* * *

尊敬的米兰达医生：

刚给您发完邮件，现在又想删掉。我突然感到对您也许太热烈了、太疯狂了。请别害怕，您就当我一时冲动。请您别害怕，您就当……嗯，就当我是胡说八道，高兴过头了、兴奋过度了。希望您理解我。我不想再打扰您。

谨致敬意

埃内斯托·杜兰

* * *

尊敬的米兰达医生：

就一件事。上封信发出之后我才想起来。不过，这种事有去无回，您知道，信一发就没退路了。后来我又想了很多。我呢，是想告诉您，从今往后由您定规矩。我希望让您明白，我时刻准备听从您的安排，从今往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听凭您决断，您是医生嘛。我向您保证我变了，我向您保证我现在好多了。

谨致衷心的谢意。

埃内斯托·杜兰

* * *

岛上的日子并非希望中的那样，至少不像安德烈斯

所希望的那样。首先风景不尽如人意：儿时记忆中的海岛，如今沙滩上、大海里一无所有。现在想来恍若隔世，曾几何时，一觉儿醒来，这片海岸上爬满了死海蜇；而现在，一觉儿醒来，却挤满了德国和加拿大游客，他们个个身材魁梧，胳膊上刺着文身，肤色格外苍白。他们没准儿在汉堡开加油站，趁现在加勒比油价便宜跑到这儿来了。尽管如此，说到底，那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无非是为了逃避日常该办之事的一种托辞。去不去海滩没什么了不起，有无什么计划也没什么了不起，反正最后他没和父亲谈成。眼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观赏着风景，感到束手无策，实在无力向他说出真相。

一天，他们去马卡纳奥，那是岛上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烈日仿佛吊在石头上纹丝不动，阳光洒在大地上。荒凉的土地恍如另一片海洋，和大海彼此对应，相融共生。那是一个身体的两部分，蓝色的生生不息，栗色的死气沉沉。就在那儿，在蓬塔阿雷纳海滩，安德烈斯本可以面对父亲，把可怕的消息一股脑儿告诉他。可是，他一直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总是有点阴差阳错，总是没有彻底壮起胆子。于是他渐渐意识到旅行并非上策，说实话必须换个地方。大海和荒地，蓝色或栗色，在他眼里是同一具尸体。

晚上，安德烈斯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睡不踏实，一着急就做梦。每天醒来后都觉得没休息好：从床上起来，就像刚刚值完一场艰苦的夜班，就像刚经历了一场

激烈的战斗后归来。每天早上，他一睁开眼睛，就感到正在逃跑，就感到躲过了一劫，他不知道逃避什么，不知道怎么逃避。而且，他总记不起来梦见什么了，只感到眼皮跳个不停。

父亲反而睡得很香。安德烈斯本不想住双人间，老头却极力坚持，他觉得那是不必要的开支。

“反正咱们是一家子。”他当着酒店接待处女服务员的面咕哝道。

的确，他们应该是一家，安德烈斯想。要把牙刷放在一起，要共用洗手间的卫生纸；要睡觉前一块儿商量看哪个频道的电视；要在地面下水口找碎头发；要两个人在一起时弄出些动静来，需要有个人问一声“你怎么了”，然后安静地闭上眼睛；为了关上电灯后不害怕，要离得近些。每天晚上，都是老人先睡下。十一点前，他就开始打瞌睡了，转来转去，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好像要记住哪一页，直到最后被夜晚打倒。父亲穿了一件灰蓝色细条格睡衣。他睡觉时嘴朝上，胳膊平伸，嘴巴半张。那姿势让安德烈斯很吃惊，他觉得他高枕无忧，就那样无忧无虑、四平八稳地躺着，就那么自信地认为没有任何事可以打扰他。他睡着，仿佛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他睡着，仿佛一个小男孩，在一次家庭远足中淹没在野草之中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心，确信没有任何东西会威胁他。安德烈斯看着他，有点嫉妒。他则相反，侧身躺在床上，抱着双臂，几乎缩成一团，使劲儿抵着枕头。

父亲也不打呼噜。头天晚上，安德烈斯曾久久地在那儿听他喘气。黑暗中，他感到轻轻的喘息声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他感到空气进进出出老爸身体时发出的响声，他不由得想起一幅巨大的人体组织示意图：一段肺叶上有多重肿瘤结节，好像一块肉上种满了蘑菇。一处虚拟癌症的淋巴管炎在肺上好像一条干鱼，肿瘤溃烂的图片、侵入软组织的图片显示成黄色区域和出血点，肺部淋巴结区即将坏死的图片……安德烈斯坐在床上，心绪难平，重新打开了电视，他看看熟睡的父亲，脸向上仰着，伸展着双臂、半张着嘴休息着，似乎周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走过去，蹲在他的床旁边，近近地听他喘气。他不知道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黑暗中，在电视屏幕的反射下，他面色苍白，头脑空空，无动于衷地守在父亲身旁叹息。

有一次，安德烈斯差点对父亲说出真相。那是一天下午，他们在克鲁斯海滩一直待到傍晚。他们买了一瓶干红，两人坐在海边上，海浪冲击着沙石，他们默默地喝着酒。但是，安德烈斯感到在父亲身旁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他像一个猎人，时时刻刻全神贯注，等待着最佳时机，准备出击，完成此次旅行的秘密使命。父亲则截然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好像更适应了、更安静了，他在充分享受每一刻时光。他们无话不谈，当然最后总要谈到国家，这已习以为常。安德烈斯突然想到，政治形势挽救了多少早已无话可说的婚姻，现在家庭团圆、气氛和睦。政治使他们破镜重圆、化敌为友，使他们重新改变了发泄感

情的方法。不过，政治对父亲而言有如对牛弹琴，两三句话他就烦了。安德烈斯重新给塑料杯里倒满酒。

“你不觉得太美了吗？”他说道，似乎想缓和一下气氛，“我是说咱们俩，在这儿，这样。”

“是的。”老米兰达说，他略微迟疑了一下，重新望着大海满意地说。“你知道我奇怪什么吗？”他又补充道，“大海没味了。大海已经没味儿了。”

安德烈斯望着大海，鼻子深深地吸着气。目光突然远眺着前方晃动的长长的蓝色天幕的尽头。时机已到？他会说什么？难道现在，趁这个场合，不正是试探试探他，建议他聊聊肺部为什么会感染的最佳时机吗？

“什么味儿也没有。”老人在他身旁重复道。

但是，安德烈斯已经不敢看他了，只听到一阵小小的海浪在旁边渐渐消失的声音。两人坐在沙滩上，海水渐渐淹到了肚脐。你在等什么？事情愈来愈清楚，还能瞒多长时间？父亲望着大海，闻着空气。他手端着斟满红酒的酒杯，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身子往里一窝，手上的酒杯一晃，掉到了水里。哈维尔·米兰达不停地咳嗽，安德烈斯想帮助他。酒染红了海水，海水成了红酒。等老人重新站起身来时，突然岔了气似的抽搐起来。这时，安德烈斯发现父亲在往水里吐——是血，他们周围的一片红不是酒，是血把周围的海水渐渐染红，并向远处扩散开去，染红了沙滩。大海突然全成了鲜血，父亲的鲜血。

“现在海水什么味儿？”

安德烈斯给他擦血，扶着他，尽量安慰他。他们先去了附近的救护站，然后又去了一家药店。安德烈斯告诉他，是一种胃病毒，肯定是中午的黄豆炖金枪鱼把胃吃坏了。那天晚上，父亲早早就躺下了，安德烈斯吃了一片药才睡下。第二天，该坐渡轮返回了。他又做梦，又一次不知道梦见了什么，早上醒来时口干舌燥。这天早上，刷完牙后，他打算给父亲写封信，给他写一封长信，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告诉他自己如何难以启齿。可是他马上又感到可笑。他觉得写信是胆怯的表示，只有胆怯才写信。

*　　　　　*　　　　　*

卡丽娜不明白，为什么短短的时间里，她养成了回信的恶习。自从医生去了马加里塔岛之后，埃内斯托·杜兰就不停地写信。每天她一到诊所，第一封信已经在候着她了。每天下班前，卡丽娜自己也给他发封回信，还有一封信她改了又改，拖拖拉拉写了一整天。她买了本字典，尽量不重复使用同样的词语，而且特别注意口气。这才是她感到最费劲儿的地方。因为有时她一不留神就忘了是米兰达医生在写信，即使她知道米兰达医生绝对不会那样写。有的遣词造句只能是她的。每封信都是七拼八凑。

通常，往来信件是严格的医疗隐私。因此，卡丽娜有办法知道埃内斯托·杜兰所谓的“病”，说来说去是一种常

见病，发病初期是迷路炎，至少可能是迷路炎。一天早上，埃内斯托·杜兰起床后，发现自己失去了平衡。为了站稳脚跟，必须一直撑着东西或扶着人。一切突然改变了，变成了拐杖，变成了扶手。他拐弯抹角找了好多专家，接受了轻微中耳炎的治疗。但是，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乱了套。虽然表面上看来耳朵问题解决了，但是症状却没有消失。每天早上，杜兰一醒来就感到虚弱，一站起来立即感到如临深渊，似乎随时都会摔得粉身碎骨。看病的医生们打包票说他已经好了，杜兰自己或他所说的生理感觉上认为根本不可能。他固执己见，只有他才能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谁是疾病的主体？”他问，“医生还是病人？”

埃内斯托·杜兰什么疗法都试，他试过近期流行的亚马孙顺势疗法，他试过所谓的系统疗法，他在马拉凯附近的一条河边上接受过一个讲葡萄牙语的中国人做的无器械手术。他还让塔维斯圣约瑟教堂的一个修女，手按腹部两人一起祈祷。一切都无济于事。用埃内斯托·杜兰信上的话来说，只有时间一直帮助他带病活着，活着，再活着。

天天有信，天天用那种语气对话，渐渐节外生枝。如今，埃内斯托·杜兰成了卡丽娜生活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天下午，她坐在地铁里，发现自己在想他。周末，在家里也想到了他。星期六上午好一阵子，她一直在想象他的样子。他住在哪儿？他住的房子怎么样？早上

整理床铺吗？他冰箱里有什么？它究竟是直来直去的人，还是个神经病？他听什么音乐？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难道没有女朋友才是他一身毛病的真实根源？难道是离婚造成了他所有的痛苦？

卡丽娜甚至生出一段遐想：一天下午，埃内斯托突然回到家中，正赶上老婆和一个邻居在客厅里做爱。他开门时，恰巧看见大厅里，老婆赤裸着身体，跪在地上嘬着C 3邻居的阴茎。那是个可怕的场面，那种情况下谁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作何反应。她往后一闪，邻居往后退了一步。埃内斯托浑身发抖。那阴茎还在大厅之上挺着。这简直野蛮无耻到了顶点，那东西居然毫不畏怯，居然对眼下的处境无动于衷。老婆用手抹了抹嘴唇。埃内斯托瞪着她呆若木鸡，他已被惊得浑身无力。而邻居只是看了看地上的衣服，好像在茫茫大海寻找救生圈和救生衣。等自己回过味来，卡丽娜下意识地甩了甩脑袋，想把星期六上午的这种胡思乱想赶走。这时，她开始感到不安，她为什么会这样胡思乱想？埃内斯托·杜兰的前妻和男邻居在她脑海里干的什么事？这一切又和她有什么鬼关系？

“你是自欺欺人。”阿德拉依达说。她哼小调般地拉着长腔，语气中有点幸灾乐祸。

阿德拉依达负责整理信件。每天下午看一大堆信，信上有提意见的、批评的、建议的，说什么的都有。缠扰着卡丽娜的那么多问题和良心不安她没有。阿德拉依达

已经在她的言谈举止间发现了美国大片式的浪漫种子。如果卡丽娜有同伴儿、有男朋友，或者哪怕一礼拜和哪个男人睡过一回，也肯定不会为那个想入非非的病人、那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弄得像个没头苍蝇似的神魂颠倒、不能自拔，阿德拉依达这样想。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孤独的路没有尽头，有人这样说。

卡丽娜已经慌了神了，米兰达医生归期已近，这使她格外紧张。她觉得戏不可能演太久了。埃内斯托·杜兰早晚还会打电话，还会找来，最后总会碰到安德烈斯·米兰达。怎么办？真到那一天会怎么样？他太古板了：用不了一秒钟，她认为微不足道和别有情趣的事对她将是悲惨和危险的。她感到焦虑不安。她不明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能任人摆布，越过医生回那第一封信。她不应该迈出那可怕的第一步。谎言是可怕的毒品。此时此刻，她不知如何逃离谎言，不知如何抛弃谎言。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放弃。每次写信，卡丽娜的感受都一样。她站在一条无形的分界线上，双脚站在将两个完全不同的天性一劈两半的利刃之上，一边是言语干脆、点到为止、公事公办、不卑不亢、直截了当、准确无误但却索然无味的言辞；另一边，则是激情闪烁、谈锋犀利、添枝加叶、语无伦次、令人肉麻、津津有味但却无遮无拦的话语。她越来越难以保持平衡，她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米兰达医生回诊所的前一天，每天早上例行的邮件

突然变成了急件。

※ ※ ※

亲爱的安德烈斯：

我昨晚呕吐，发高烧。我一直恶心，血压非常高。我甚至连床都起不来了。

我的号码是：5514978。见信请来电。

你的朋友

埃内斯托

※ ※ ※

回家的旅程更加漫长，午后的阳光仿佛要阻挡快速前进的渡轮。游客们兴致迥异。这是一段特别的回程，沙滩在记忆中渐渐消失，一丝淡淡的失落仿佛留驻在甲板上所有人的脸上。安德烈斯感到了失败，他对自己感到心灰意冷。他在电话里骗了玛丽亚娜，他没有勇气告诉她，他未能完成出海的使命。他觉得谎话使他进退两难。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无能。那天早上，在潘帕塔尔，无论父亲怎样一再坚持，他也应该豁出去。他必须想方设法让旅行的目的顺理成章地达到。上岛以后，老米兰达只记得他们是到岛上来看别人抵押的房子的。本来，这是一个胡编乱造的虚构故事，没有什么根据。可是一

到岛上，一到实打实的时候，纸便包不住火了。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去看看房子？”父亲一边吃水果一边问道，他已经感到奇怪。

“行，当然，咱们这就去看。”

往潘帕塔尔去的一条大路旁边，安德烈斯看到了一片工地。那是他发现的唯一一处工地，他慌慌张张停下车，急匆匆地向父亲解释说，就是这片工地。这就是他们要来看的楼盘，可是，他没让老头下车。

“你在这儿等我。”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向工地跑去。

他不紧不慢地和一位工程师及几个工人谈了起来，他们刚刚收拾完一所房子的屋顶。他连比带画地东拉西扯，好让父亲在远处看见他，认为他在谈生意，在询问与住宅建筑有关的施工细节。他终于在处理旅行的正事了，他居然不可思议地在工地待了十五分钟。工程师以为安德烈斯疯了，要么就是个浪费时间的傻瓜。更荒唐至极的是，道别时，安德烈斯还拥抱了人家。弄得工程师不禁想，这家伙不但是个傻瓜，还是个同性恋者。安德烈斯回到车前，胡乱编造了些谎话告诉了父亲。米兰达不喜欢那些房子。

“我觉得那不是好生意。”他说。

安德烈斯还记得当时的场面，他差点笑出声来。然而，他也感到沮丧。同样的感觉缠扰着他。其实，他也许恨自己如此软弱，如此无能地控制不了局面。何况，他曾

经残忍地、毫不心软地控制过多少次局面，控制过多少其他人。他感到自己做得对，他觉得坦率从道德上讲是医学的武器之一，反之，自己就如此陷入一个无穷无尽的怪圈之中。父亲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一杯加了奶，一杯没加。

“都好么？”他问。

拉瓜依拉的阳光越来越近，安德烈斯看了看父亲，知道已经毫无办法了。

“怎么啦？”父亲有点不快，他知道肯定出什么事了，望着儿子紧绷绷的脸。

安德烈斯双手一合，干咳了一声。父亲的话使他感到一阵心酸，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话说出口他就觉得不对味儿，可又避免不了，他已无能为力。有时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你越无心去说、越不打算去说、越是没有更好的机会说，最后，话总会脱口而出。有时是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的。

“爸爸，你得癌症了。”安德烈斯突然低声说道。因为有些事情只能低声说。

下　　部

他宁愿一切朦朦胧胧，宁愿那天下午不那么明明白白，宁愿那天下午渐渐远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但是，事与愿违，那个锋利无比、残忍粗暴的下午就在那里，从那天开始，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总是那个顽固不化、难以忘却的下午。安德烈斯竭力让那个下午消失，但却无济于事。它像一个阴影来去无踪。整整两个星期，安德烈斯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每天下午，在同一个下午中难以自拔，一个又一个下午重复着同一句话：

"爸爸，你得癌症了。"

老米兰达措手不及。安德烈斯无法忍受他的目光，惭愧地转过头去。景色深处，拉瓜依拉港的灯火有些异常。两人沉默了几秒钟，直到老人开腔：

"看着我。"

可是，安德烈斯没有理会。老人坚持道：

“看着我。”

他不需要抬高嗓门。口气是坚决的，越来越充满威严。

“你他妈的看着我！”

安德烈斯终于回过脸来，他看到了一个勃然变色、两眼湿润的老人。他很难断定当时他受到了多大的震撼：惊异？害怕？愤怒？狂躁？他的下巴在颤抖。父亲的脸突然变得格外苍白，仿佛突然戴上了白色面具。安德烈斯几乎可以感受到他紧咬着颤抖的下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手上的咖啡一失手，塑料杯子掉在地板上，咣当一声，咖啡溅到了安德烈斯的胶鞋上。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老米兰达重新操起父亲的口吻。在父亲面前，安德烈斯又感到自己像一个孩子，他再次意识到旅行的主意大错特错，愚蠢之极。他们时而像孩子，时而像朋友，有时又似是而非，不像是休戚与共的人，有一阵子，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只能是父与子的年龄，别无选择。

“难道这重要吗？”

“对我来说重要。”

安德烈斯难受地动了动身体，略显无奈地做了个怪样，什么都没说。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一做检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安德烈斯没出声。他突然觉得理屈词穷。

“我早就告诉你不要骗我，安德烈斯，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我没骗你。”他几乎在嘟囔。

“当然没骗！不就是对我隐瞒了真相吗？”

“你听我解释……”

“这趟旅行全为这个，对不对？”老人的话里多了一丝苦涩的讥讽，一点嘲弄。“为了向我报喜？”

说完，他神情严峻地走开了，朝渡轮顶尖处的栏杆走去。安德烈斯迟疑了片刻。他感到父亲在流泪，说不定多会儿就会放声大哭，走过去之前，他等了几分钟，他估摸着这样最好，父亲需要时间静下心来，需要时间消除恐惧。然后，他慢慢向他走去，不想让他发现自己。老人没有回头，继续背对着他。拉瓜依拉港越来越近了。

“你不敢告诉我。”他嘶哑的声音低语道。

“不敢。”

“我们有成千上万次机会。我们一块儿在海滩，我们睡在一间房里。”

“我说不出口，我每次想说都说不出口。”

“现在说出口了。”父亲打断他的话，显得有些不快。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这样告诉你。对不起。”

老人慢慢活动着身体。待他转过脸来，安德烈斯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湿润的眼睛背后有一丝忧郁、一丝怨恨，一道字典上找不到形容词的目光。

“对不起。”安德烈斯再次低语道，好像余下的旅途里他只会反复说这三个字，好像手边只有这三个字，只剩下这三个字了。

“这一切，”父亲说，他继续保持着距离，“让我想到事情不那么简单。”他面对着他，眉毛一扬：“如果是小事一桩，你不会费那么大劲儿，我们也不会来旅行。”

“病情严重。”安德烈斯低语道，他感到难受。

“你再说一遍。”

是命令。

“你再对我说一遍。你对我说‘病情严重’？你现在就跟我说实话。”

两人静静地待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死盯着对方。盯了多长时间？他记不清了，他想不起来了。他的记忆中只有两个凝固的身影，相互注视着，一句话不说。直到一滴辛酸的热泪滚落下来，有如一把刀，劈开了画面。安德烈斯无法控制自己。无论他怎样强睁着眼睛，都无济于事：那就是他的回答。有如一个被囚在家中的孩子，稀里糊涂地束手就擒。

“原谅我，爸爸。”他吭吭哧哧，好不容易挤出这几个字来。

哈维尔·米兰达惊奇而恼火地看着他。他好像在发抖，他好像在设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发抖。他低下头，转身离开了阴影。

他们一声不吭地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又一声不吭

地开上了去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有两三次机会,安德烈斯打算挑起话题,但没有回应。一路上,父亲望着前方,一言不发。安德烈斯知道,是噩耗击倒了他,他还在承受着那个令他心如刀绞的噩耗。当他们停在楼前时,安德烈斯下了车,帮着他从车后备箱拿出箱子。然后,想拿着箱子陪他走到家门口,可是父亲阻止了他。

"谢谢,我能行。"语气少见地温柔。

他抬腿向大门走去,依然沉默不语。安德烈斯紧张地看着他走开,没忍住:

"你什么都不知道才好吗?"他突然冲他喊道。父亲没有回身看他,但停住了脚步。安德烈斯接着说:"难道什么都不告诉你才好?"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着,似乎在品味嘴里的桃核儿。过了一会儿,又心情沉重地迈开脚步,走进楼里,没有说话,没有回头。

* * *

为什么是我?怎么是我?那天晚上起,哈维尔·米兰达反复念叨同一个问题。好像在念叨一件私事,好像来到自然发泄办公室,正坐在那里和经理谈话。为什么是我?怎么是我?他一边唠叨着,一边不得不接受新试验、新检查。为什么是我?怎么是我?肿瘤医生用难以理解的语言和他交谈时,他还是同样的话。为什么是我?怎

么是我？就连去接受化疗时还重复着同样的话。

“今天感觉怎么样？”护士笑着问。

“宁愿被车撞死。”

自那天晚上起，一切都改变了，首先改变的是他的情绪。他不知如何摆脱与其说是包围，不如说是浸泡着他的压抑之感。他痛恨生活，狂躁不安，心神不定，感到浑身无力；走投无路的念头将他击倒在地。在几乎已近七十岁的年纪，他终于以最可怕的方式，明白了“命运”一词的残酷。这就是命运，没有别的，一支注射器而已。他和儿子的关系也改变了。其实，他和其他人、和所有人的关系都改变了，这当然包括安德烈斯。他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对待他、做什么，对他说什么。说到底，他也感到有些于心不忍，他懊悔发生的事情，他希望为他人省去这道无用的程序、这道费力不讨好的程序。他一见到他们，总是低下自己的头。他知道对他们而言，情况也很为难。如果他故作高兴，如果他加以掩饰，装作若无其事，也许一切都轻而易举。对所有人而言，最理想的是他默默地死去，无人知晓，无人察觉。

但是，变化最大的是他的身体。哈维尔·米兰达觉得身体已经丢失了，实际上已经不是他的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感受到病给他带来的那种折磨。如今，他刻骨铭心地感到了他和自己的身体在悲惨地分离，哈维尔·米兰达独在异处，栖息在一个受伤的躯壳里，蜷缩在一张不再发号施令、不再彼此交谈

的人皮下，这张皮另有人管，不理不睬他，在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死。

有时，晚上睡觉前，他再清楚不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一边刷牙一边打量着自己。那是每天的最后一道程序，他甚至连灯都不开，仅有走廊微弱的灯光将自己的影子映在玻璃上。镜子里是自己的影子，清晰得令人不寒而栗！他感到了完整的自我：头发、明亮的眼睛、有色的皮肤……甚至脑袋的形状。疾病居然具备了似乎不可能的特征：相貌。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他小便完从镜子前走过，一瞥眼看见了脸皮之下的骨头，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了骷髅，似乎洗手间的镜子变成了X光透视镜。

“今天谁来看您？”护士扶着他坐在楼道的椅子上，问道。

“儿媳妇。”哈维尔·米兰达低声说。

“那我就把您搁这儿了。”护士说，“您在这儿等她，坐一会儿，好吗？”

老头点点头，一副凄凉的神情，嘴唇已经消肿，向下巴垂着。医生护士们都了解他，没人和他说话，他们和他的身体说话，和那个必须把他当成一个傻孩子的人说话，同那个将将站稳脚跟、顷刻间便会彻底倒下的伤者说话。

他等人的时候，一位修女从他身旁走过楼道。她陪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日子不多了，也许，他看上去也是如此。老妇人走起路来小心翼翼，害怕地四下张望

着。或许，她只想逃离这种折磨，逃离这可怕的消毒气味。修女走在她的旁边，身上的长裙拖在地上看不见双脚。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在飘动。一个在医院楼道飘动的修女。她脖子上挂了一个木头做的耶稣受难像。耶稣基督认同死亡，老米兰达突然想，但是，耶稣基督不认同疾病。上帝死亡，却不生病，这便是上帝的优势。

* * *

刚开始学医时，安德烈斯·米兰达就发现自己的天分并不专一，他总感到缺点儿什么。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对外科兴致勃勃。他更感兴趣的是临床部门的片子和显微镜，他喜欢大黑板胜过手术刀。同学们都迫不及待、满心焦虑地等待实习阶段到来的时候，安德烈斯却巴不得延迟实习。人在手术室，处理急诊的场面实在提不起他一点兴趣。他也不反感，但是，医学显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一直觉得这是个人倾向问题，他最感兴趣的是调研、是观察、是分析，总之是医学中的实践。多少年之后，当安德烈斯读到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所著的《受伤的身体》那本书时，他终于在那本必不可少的字典中，找到了大学前几年一直苦苦寻找的话：按照战争语言，按照常用来比喻外科的战争语言来说，流血的外科手术就是“暴力行动”，就是强行进入病人体内，迫使“敌人”——疾病——变为创伤，解除他的武装，消灭他。这个结论完美

地勾画出安德烈斯所没有，也从未有过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对从物质上侵略别人的身体，他从无兴趣，即使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一次拯救行动。他的医学才华一直移情别恋，为七情六欲所左右。“外科暴力滋生了外科大夫对病人施以强权的形象，滋生了授降仪式上移交权力的形象。”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在书中还说。但是，对安德烈斯而言，强权是在另一个空间和另一个知识范畴里编造的。这样他便避开了——从表面看——所谓的软弱。他喜欢书本上的知识胜过手上的知识。

他依然记得，如何在医院值班一直是整个专业里最麻烦的课程。搞清人体功能一直是他最大的好奇，但是，在活生生的人体上，真刀真枪地干，夹杂在另一个人的呼吸中，介入他人的鲜血、侵略他人的肉体，绝不是他的才华所在。他从不拒绝实习，但是他或许从未经历过实习。一想到要面对活生生的人体、上下里外摆弄一个活生生的人体，实在让自己心灰意冷。人体吓不倒他，面对他们清楚地感到负有最后的责任才使他不寒而栗。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和尸体在一起时，才感到心安理得。

上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分成了两大派：干尸派和鲜尸派。两派的名字一目了然，用不着任何解释，已使用过的僵尸归第一派，新鲜的归第二派。没人喜欢上干尸课。就像待在人体模型旁，总免不了感到失真。干尸就像一块老化的塑料，日久天长，渐渐残缺不全了。有的干尸右脚会少两个指头。一次，有个坏小子居然在一具小伙子

的僵尸的脸皮下埋了一个烟头。他们常在干尸上搞恶作剧，一上干尸课就嘻嘻哈哈，孩子般地唧唧喳喳，远远地待着。鲜尸课则截然相反，至少首先是安静，少见地心齐。

对安德烈斯来说，尸体是理想的一半。它横在书本通往外科急诊手术室道路的正中间。尸体不是课本简单的图解，它们有大有小，现实存在，是一个个真实的身体，但同时又不完全真实，或者说真实得不全面：它们缺少热度，缺少心跳，缺少需求。恰恰在现实的不现实条件下，安德烈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感到他的命运就是尸体解剖，他几乎命中注定要献身于对无生命身体的探索，献身于对那些没有过去的印记、没有心脉的跳动，一切已成遗迹的身体的探索。有好长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才华已经接近“伤害之举”，而不是“拯救生命”。他属于那一组人，属于对生命已经无能为力，就差签单结账时才赶到的那帮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随着学业的进展，他渐渐意识到他的职业生涯将同研究和教育密不可分。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和病人打交道的前景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其实这意味着风险，一种他也不知道该不该冒的风险：犯错误。在实验室里犯错误同手术室里犯错误完全不一样。那些年，安德烈斯渐渐迷上了安德烈斯·贝萨利约。除了名字和他相同之外，他和著名的佛兰德医生同样热衷于研究，同样痴迷于人体的功能。由于他，他明白了好奇是高风险的运动：投

身医学之谜绝对是死路一条。

安德烈斯·贝萨利约，一五一一年出生于布鲁塞尔。绝对是个天才，被人们称做解剖学先驱。他就学于巴黎，在卢万和博伦亚两地任教授，是卡洛斯五世的宫廷医生。一五四三年，他出版了一部有关人体结构的重要论著《个体的工厂》并公开向加莱诺[1]的理论发难。该书问世时录有三百余张插图，在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地展示了解剖学。很早以前，贝萨利约已在历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他或许还能有更多的建树，但是厄运降临，一五六一年，马德里圣塔因基西雄一家法庭判处他死刑。

贝萨利约的天分从自己的人体解剖工作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此外，他得到了完成这项工作所必需的许可和赐福。不知哪来的传闻，说有那么生死攸关的一天，一具人体背叛了科学：贝萨利约剖开了一个尚未死去的“死尸”，皮肤和胸腔之下，心脉还在跳动，也许在微弱地跳动。说不定，那只是、只是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不过，晚不晚都一样，科学眨眼间变成了罪恶。有些文章说，那是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体。消息表面上看不太可能，但肯定的是菲力佩二世介入了宗教法庭的审判，终于保下了贝萨利约的命。还有一种传说，说医生被套上了长袍和凉鞋，被判终生流

---

① 加莱诺·德·佩加莫(130—200)，希腊名医，其理论对欧洲医学影响长达千余年。

放沙漠以弥补他的过失。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同样具有悲剧色彩:安德烈斯·贝萨利约靠长期朝拜宗教圣地而洗清了自己的罪过,从耶路撒冷回来时,他乘坐的轮船莫名其妙地遇难沉没了,贝萨利约被船带到了海底。他就这样为好奇付出了代价:被荒漠或大海所吞噬,沦为虚无。

“不要得了‘贝萨利约综合征’,”阿曼多·科伊教授不止一次地警告说,“不要被它吓倒。”

一天下午下课后,他和几个同学去大学附近一个地方喝啤酒。那是一个脏兮兮的小餐馆,名叫“中国之星”。大学生们常去那儿,那儿的酒最便宜,大家可以不冒拘留十五天的风险,一醉方休。科伊教授要了威士忌。两个小时过后,酒酣耳热之际便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自己就是“贝萨利约综合征”患者。他这样形容,他觉得故事骇人听闻。他不理解人类怎能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他的旷世奇才。“贝萨利约是又一个达·芬奇。”他肯定地说。安德烈斯·米兰达品味着他的每一句话,心中充满了惊奇和景仰。大家分手时,科伊教授神情忧郁地望着大家。

“这一切说明,”他说,“医学的诞生必然伴随着失误,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永远相连的事实。等着瞧吧。”

* * *

起初,她是一天一天地数:数到了第九天,不能再数了。自从那天早上,埃内斯托·杜兰草草地写了那封吓人

的求救信以后，已经过去九天了，她什么都没做。其实她也做不了什么。她既不能给杜兰打电话，也不能告诉他米兰达医生的事。她焦急地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又是几天过去了，尽管自己没数，反正过了好多天、好多好多天，埃内斯托·杜兰再也没有写信，也没有打过电话。而她每天早上却一如既往，焦急地在邮箱中寻找他的来信。什么都没有。最后关于他的消息就是那封短信，那封有他电话号码的告急信。有时，她眼前突然冒出那封信的影子，于是，她看见埃内斯托·杜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半张着嘴，断断续续地喘着粗气。他有很多天没有刮胡子了。两只眼睛有气无力地向上抬着，似乎没有足够的气力看到房顶。床上一片狼藉，吐得到处都是。哪怕是在幻觉中，到处都是他散发着屎尿恶臭的影子。她还看见他躺在家中的地板上，仿佛在昏迷前爬了几米。他赤裸着身体，两天前就死了。皮肤已经发暗，几乎成了紫色。他张着嘴，一只小飞虫好像一只小秃鹫在静得吓人的尸体上嗡嗡地飞来飞去。

晚上，埃内斯托依然无影无踪。凌晨两点，卡丽娜吓醒了：梦中，埃内斯托·杜兰拿刀把身体劈成两半，鲜血呼地冒了出来，染红了整个梦。

“既然这么担心，你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阿德拉依达一边儿嚼着胡萝卜一边顺着她的心思说。两人重新开始了减肥计划。

“我对他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只要确认他没问题，他还活着就行了，就放心了。要不要我给他打电话？"

卡丽娜摇摇头拒绝了。她在不同的时间已经试过多次了。见到他没写信后，就决定打电话了。她想，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立刻挂掉，没有别的打算。她只需要确定他是否安然无恙。但是，一直没人接电话。电话久久地响着铃声。

她也想过直接去看他。她从杜兰的病历上找到了地址，他住在市中心，在武装力量大街附近的圣拉蒙街角，她可以找一天下午提前点儿下班，到他家附近转转，她没有过多的打算，也不想走得太远。比如说，她可以在他家楼前，在对面马路牙子上，在不太显眼的地方等上一会儿，看看埃内斯托·杜兰有没有进出家门，证实一下他是否还活着。

"你觉得是自己的错？"一天傍晚，当她们照例围坐在酒吧柜台前时，阿德拉依达不假思索地问。"一看你就是这么想的。"

"不，我只是着急，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就这么想的。你不觉得奇怪吗？发完这封邮件就……什么动静也没了？绝对安静，再没有出现过。"

"也许他在惩罚你。"

"惩罚我？怎么说都是在惩罚米兰达医生。"

"没准儿他真烦了，他看出医生绝不会搭理他，一切都是扯淡，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没准儿最后那封信是

试探一下而已，试探完了，那家伙便永远消失了。”

然而，卡丽娜不会轻易善罢甘休，那天下午，她在诊所一直待到下班，打定主意再试一把。绝望已经胜过了恐惧。所以她铤而走险又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埃内斯托：

首先，请原谅我迟至今日才回复你的来信。很抱歉，如前所述，我正在加拉加斯城外处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环境所限，我身不由己，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几天无法查询我的电子邮箱。因此，也仅仅因此，我无法料理你的求助。

我终于可以联络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我给你留的电话打了好多次，但一直没人接，我再次就此向你表示歉意，我能够理解我给你带来的不快。如有急事，你可以去别处找别人寻求帮助。请务必告诉我你一切都好，你可以顺利地渡过难关。

谨盼速复。

安德烈斯

* * *

自从疾病横亘在两人中间，父子关系就变得不那么自然了，变得更加生涩和困难了。两人间一直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如今成了三重奏。父亲、儿子，再加上一个，

另一个，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和他们形影不离的第三种力量。他们曾经共同度过很多时光，但那些时光不同。他们之间的话愈来愈少。两人心知肚明，彼此都有同感。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表达，该做些什么。两人也许都希望退避三舍、逃脱、不见面，但又不敢付诸行动。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诀别，尽管他们毫无选择。说来说去，他们共处险境，走投无路。

安德烈斯一次次陪他化疗，希望每天下午四点梅尔妮离去后和他待在家中。梅尔妮虽然有时好像不那么心甘情愿，但终于同意天天留在父亲家。安德烈斯觉得即使出于自我保护，也不希望老米兰达就这样死去。或许所有人都不免一死，真知道死到临头时，才会产生另外的生活方式。

孩子们也知道出事了，虽然他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但是知道出事儿了。爷爷不光面色苍白，而且头发蓬乱，眼睛里深深地嵌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不管大人们怎么约法三章，有些东西甚至是临床表象也无法掩饰的。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你很少感受得到，但同时又无法掩饰，它是明摆着的。那是一种人为的暴力，一种家庭暴力，一种并不因此而使人屈从和被征服的暴力。它依然是野蛮的暴力。众目睽睽之下，一条生命正在被肆无忌惮地摧残和掠夺。有的是纱布，有的是消毒棉球，有的是达官贵人……但没有任何怜悯。那是一桩证据确凿的罪行，一桩合法的罪行，一桩无人能够阻拦的罪行。

克里斯塔·沃尔夫[1] 的小说《自我试验》中，有一个女人在住院时体验到了那种可怕的感觉："有人在危害我的生命。"是的，是她自己，是她自己的病。安德烈斯大概没看过这些书，但是他在找这些书，越来越起劲儿地去找这些书，或许，他企图从书中找到在医院和家庭影院以至星期天家庭聚餐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几个晚上，他读书一直读到凌晨。诊所关了一个月。

"我在休假。"他说。

然而，这还不够。每次和父亲单独在一起，他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怎样注视他。哈维尔·米兰达似乎有同感，也什么话都不说，眼睛看着地上，要么就嘟囔一句半句，说什么自己累了，要睡觉，接着就假装睡着了。安德烈斯静静地守候在他身旁，他感到残忍、荒谬。如果事情发生，这就是等待着两人的结果：沉默；如果这就是他们的唯一结局：只好沉默；如果这恰恰就是他们如此惧怕如此痛恨的东西：还是沉默。

难道他想到了死？难道老米兰达一直在想着死？在想着准确的病情？在想着结束自我存在的确切时刻？一想到父亲的死，安德烈斯比知道这一切更加害怕。一个求救的图景搅得他坐立不安：他和一群朋友在餐厅里，大家又吃又喝又聊。突然，他猝发心梗。没有任何前兆，胃

---

① 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德国女作家。《自我试验》(1973)描写一个女性服药后变成男性的医学试验。

里未见灼热,左臂未见异常。似乎有一颗子弹,一颗从未离开过身体、一直待在体内的子弹,在半秒钟之内击倒了他。安德烈斯最后看到的场面:几个酒杯、一个烟灰缸、一个只剩下面包渣的面包筐……这是他最后的固定画面,接着便一头向桌面栽去。

但是,老哈维尔·米兰达肯定从未像现在那样梦到过自己的死。病是一场误会,是大自然的一种官僚恐怖,是绝对缺乏功能的表现。全世界都期望着一种更有效的死亡,哪怕是一秒钟,哪怕是出人意料的致命一击。那是一种深深的期待,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几乎是一种乌托邦:立刻死去。

父亲可好,避而不想。只要一感到那些念头逼近自己,企图包围他,他就抵制,就胡思乱想,就去回忆过去。刚开始时,也就是刚刚到达马加里塔岛之后,他就开始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每天早上,他都走到离家三四百米远的报亭,买上一包烟,然后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把烟一支支地掰成两截。十来天里,天天早上如法炮制。

他还开始胡乱买些不必要的东西。一个星期六,他跑到一家中国市场,买了一堆瓶瓶罐罐的调料,买了豆芽和野菜,后来又扔进了垃圾堆。一天下午,他跑到自己工作过三十八年的办公楼,站在大门口呆呆地望着。三十八年间,他天天从那里出入,穿着各式西装:浅灰色西装,某年十二月买的咖啡色西装,衣领宽大的蓝色西装以及各式各样的领带。那是一部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一个画

面、讲述着同一个简单故事的电影。三十八年间，哈维尔·米兰达在石油工业搞管理工作。美国企业还在时，他先在那儿干，后来国有化了，他又在国企干，一直在同一栋楼里。六十五岁时，他们那一代人全都退了休。不知他在楼前待了多长时间。他想进去，想上到第八层，可一会儿又害怕了。也许他谁都不认识了，同样也没人知道他是谁。他步行回到家中，整整走了好几个小时。

他的习惯也改变了。他不再看电视，甚至连棒球比赛都唤不起他的兴趣。可是，他常常可以几个小时默默无声地坐在关掉的电视屏幕前，失神地望着，望着电视昏暗的玻璃屏幕上折射出自己没有生命的影子。即使是在这时，老米兰达也不想思考，只是迷迷糊糊、昏昏欲睡，就那样待在虚无之中。但是，不可能。路早晚是要断的，跑是跑不掉的，逃避注定失败。你怎么会喜欢死？他现在明白，大概所有人都有权回答这个问题。

这天下午，老头儿正在睡觉，电话铃突然响了。安德烈斯拿起电话，谁知打电话的人飞快地挂上了电话。同样的情况和结果又出现后，安德烈斯便断定，这不是偶然打错的。打电话的人不想和他讲话，这让他起了疑心。父亲的电话没有识别功能，所以不知道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谁的电话？有人不想和他讲话，为什么？

一星期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当时，父亲正在卫生间冲澡。他愈来愈虚弱，但是，无论怎么虚弱就是不让安德烈斯帮助。再说，儿子看到自己赤身裸体他也感到

不好意思，“像一只落汤鸡。”他说。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安德烈斯接起电话，对方“喂”了一声立刻挂断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安德烈斯拿着话机没说话。他几乎能感觉得到另一端的喘气声，一种隐藏在呼吸之中的怀疑，也许不过是几秒钟时间，但是他感觉摸得到触得着，直到对方突然说：

“是你吗?”

他惊呆了。女人的声音使他无所适从，不知说什么是好。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只能听到电话另一头嘟嘟的忙音。

“谁的电话?”父亲在卫生间问。

回话前，安德烈斯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故意想试探一下：

“不知道。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挂了。”

“没准儿打错了。”老头停顿了一下，不太肯定地说。

安德烈斯觉得这个细节至关重要，是一个亟待解开的谜。玛丽亚娜甚至取笑他的态度。也许，那个谜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是父亲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可对于安德烈斯来说，一切截然相反，至少表面如此。他忽然感到自己从未关注过父亲的私事，从不熟悉他的女朋友、女伙伴儿，更不了解他是否有逢场作戏的消遣。他也从未对这类事过多地感兴趣或关心过。可是，现在，电话里女人的声音让他好奇：她解开了安德烈斯一连串疑问，她暴露了父亲一部分他完全不知情的生活。哈维尔·米兰达从来

没有再婚，的确，他全部时间都用来教育儿子，安德烈斯结婚后，他继续上班，给人的印象是既没有爱情更没有性生活。

“你爸爸也有权过自己的私生活。”玛丽亚娜说，“也许他有女朋友，但是一直不想让你知道。你也没必要什么都知道。”

然而，安德烈斯的确什么都想知道。他把父亲和梅尔妮留在医院做新的化疗，自己立刻赶回家中。他想像一个私家侦探一样去窥测、搜索并寻找蛛丝马迹。哈维尔·米兰达的房间朴素无华，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一张盖着蓝色床单的双人床，两个枕头，一张木头小桌，桌面只有一盏台灯、一本书和电视遥控器。书是安德烈斯几周前送他的。是一个记者写的加拉加斯印象集，文字风趣，略带风俗派思乡之情。是他和玛丽亚娜推荐的唯一一本书。

几挂灰色的窗帘陪伴着窗户，衣柜很宽大，有两扇宽宽的门。安德烈斯轻手轻脚地打开衣柜，似乎不想发出声响。隔板架上摆放着一些东西：有三个镜框，一个是妈妈的照片，一个是安德烈斯和老人的照片，两人一块儿蹲在海滩上，第三个是安德烈斯、玛丽亚娜和孙子们的照片。衣服挂得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安德烈斯拉开抽屉，迅速地扫了一眼。就在这时，他感觉可耻，他有些后悔。他在那儿有点好笑，鬼鬼祟祟，东摸摸西看看，翻一翻父亲的内衣，动一动外套……你到底在找什么？你到底想

找到什么？你难道可能找到一种已经成为过去的生活，一个对两人说来或许早已遗失了的生活？

他在床头柜里找到了几封信，他又一次感到耻辱和心虚，但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回头已经无济于事。几封信都很短，没有落款，但却是女人的笔迹，安德烈斯想。无论如何，是女人的字体。另外，内容也暴露了是女人，看上去像是简短的爱情宣言，属于顺手扔在信箱里或者在最后时刻塞在门缝底下的。没有时间，没有署名，没有具体细节。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是一种秘密关系，应当隐藏的秘密关系。有一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写在一张洗衣店发票背面的正中间。寥寥两行字：“下午我从这里路过，本想给你个惊喜。我需要一个吻，我需要你。”

抽屉里还有一本书——汉斯·金① 和沃尔特·詹斯合著的《庄严地死去》，安德烈斯不禁感到一丝震撼。父亲从哪儿弄来的这本书？第三十五页的右上角折了个记号。老头大概看到那儿了。也许昨天晚上，他就看到这儿。安德烈斯扫了一眼小标题：“论安乐死：神秘的死亡”。他合上书，关上抽屉。他把书放在那里，显然不希望有人看到。这个人就是安德烈斯。

---

① 汉斯·金（1928— ），瑞士天主教神学家。

*　　　　*　　　　*

老头和梅尔妮达成一项约定。换句话说，他强加给她一条约定，那是一天下午，两人单独在家里发生了一场冲突之后的事儿了。老头实在受不了化疗，化疗所产生的反应简直忍无可忍，他感到焦头烂额，血压下降，头晕恶心，他服用大量苯妥因以避免可能出现的痉挛：那天早上，他还有早早的会诊，吃饭的时候，梅尔妮已经按营养师的要求摆好饭了。老头老大不情愿地吃着，边嚼边抱怨：

"饭都一个味儿。"他说。

梅尔妮没有答话。这一天她也不好过。昨天晚上，威尔默没在家过夜。她没睡着。好一阵子前，她就发觉他有点怪怪的，她知道可能出什么事了。大街上有人告诉她儿子和坏人鬼混，有人看见他和外区的孩子们在一起。

"没什么好事。"梅尔妮说。

没什么好事的意思是：棍棒、武器、警察、监狱和墓地。早上六点威尔默露面了，梅尔妮想揍他，但是没敢。霍夫雷也不敢：他不是他父亲。小家伙径直走到里边房间，好像喝醉酒了，什么话也没说。梅尔妮要去上班了，因为她必须上班，因为她不能旷工，因为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钱把威尔默拽出此地，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把他打发得远远的，到乡下和姥姥姥爷在一起，她这样想。只有这样他才能平安无事。

老头从床上跳下来，喊叫着向卫生间跑去。他双腿几乎跪到马桶旁了，可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把生命吐在了路上。卫生间过道和地面顿时一塌糊涂。洗手池里中午的残羹剩饭，搀和着饮料、口水、唾沫以及哈维尔·米兰达体内的残留物到处都是。老头一直将头埋在马桶里，试图忍住胃痉挛，低声吼叫着，浑身上下发出阵阵恶臭，让人恶心，让人难堪。这是谁都不想见到的龌龊事。必须立刻清理，必须马上遮盖，必须尽快地收拾干净。梅尔妮就是为此而来的。

然而，梅尔妮也在危机之中。她呕吐了她的另一种生活情景，她暴跳如雷、乱喊乱叫。她什么都不想做了，扯下围裙，往空中一扔，她难以自制。卫生全部打扫完了，她正准备离开。远处，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家中，有她自己的肮脏。她什么也不想再干了。一时间，场面令人不可思议。老头抱着马桶，一边咳嗽一边吼叫，而梅尔妮站在近旁，用拳头敲打着墙壁，一边喊一边哭。局面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仿佛两个剧烈摇晃和不满的身体，后来渐渐沉静下来了，你不看我我不看你，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各在一边，渐渐平息了自己的呼吸。

两人一块儿搞完了全部卫生。他们不得不用消毒液喷湿了地面和瓷砖。一股恶臭充斥着整个家。每件东西

都像文了身似的披上了第二张皮，整个家就像一个肚子发炎的动物。这时，老头请她出去，一同到外面喝点什么。梅尔妮不情愿地拒绝了，她推说她必须马上回家。老人坚持让她去。两人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坐了下来。她什么也不想点，他要了两杯咖啡，一人一杯。等到两人终于开口说话时，梅尔妮首先向他表示歉意。老人一个劲儿劝她说没必要。更难得的是她情绪终于好转，把家里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了老头。那天下午，两人达成了一个约定：老头米兰达提供全部所需费用，把威尔默送到梅尔妮姐姐居住的安第斯山区。作为交换，两人背着安德烈斯建立攻守同盟。

“比方说，别按规定食谱吃饭，那种没盐又不煎的破鸡肉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多点油水，我想吃黄油、吃甜食。”

“可是安德烈斯医生说……”

“甭管我儿子说什么。我说，梅尔妮，你看着我，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快死了？”

“咱们大家谁都会死，哈维尔先生。”她放低声音，眼睛望向别处。

“没错，都会死。可我先死，我已经在死去。”

* * *

洗衣店名叫德卢克斯。安德烈斯在父亲房间找到的

发票上唯一看清的就是这个名字。剩下的就是给信息中心打电话,搞到店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要地址。眼下,安德烈斯已经来到了这条大街,站在洗衣店对面。几天来,他一直在琢磨那个女人的声音,少说有两次,他曾想和老米兰达挑起爱情和找老伴儿过日子的话题。有一次,他甚至大胆地扯到了个人隐私。

“你没结婚也挺好,可是,你从来就没有潇洒潇洒?”

“我从来就不是潇洒的人。”老米兰达含糊其辞地回答。

“你晚上从来没去找过妓女? 爸爸,这么多年了,你性生活怎么过?”

没有回答。哈维尔·米兰达只是莞尔一笑,淡淡的一个表情,未加修饰的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几天过去了,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不断地折磨着安德烈斯。他开始不断地听到她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撞上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是唯一的线索。

一家洗衣店。

他原想玩玩孩子们的侦探游戏,没有太当回事儿。可是现在,当他站在洗衣店门前,他无法回避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已经胸有成竹,但又不知如何实施。发票的左上角有一个红色的数字,大概是控制操作过程的数字,有了这个数字,他足以找到他要找的女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设个圈套, 立刻下套,获得自己苦苦寻觅的东西。下一步怎么办,像下面这样:安德烈斯四下张望着走进洗

衣店，一副战战兢兢、懵懵懂懂的样子。

“早上好。”他可能会这样招呼说，一边怯生生地笑着走近柜台旁的姑娘。

“早上好。”

“你看，小姐……请教个问题。”安德烈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打算糊弄小姐。他和她海阔天空、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搞得小姐一头雾水，“我这儿有点事，”最后他一边展示着发票背面，一边说，“您能帮帮我吗？”

另一种可能性：安德烈斯进了洗衣店，向姑娘走过去，给了姑娘一笔钱。他也许没有过分兜圈子，既不扭扭捏捏也不装腔作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父亲的隐私和那个神秘女人的声音，而把他带到这个弥漫着洗衣房臭气和水蒸气之地的正是那个声音。说来说去，反正安德烈斯带着地址和电话走出了洗衣店。她名叫伊内斯，伊内斯·帕切科。

小的时候，他跟踪过父亲一次。那时他才十五岁，任何人也躲不开的年龄。记忆只给了他一种感觉，一种类似怨恨、类似刺痛和伤心的感觉。一天傍晚，安德烈斯开始潜伏侦察。他躲在一辆小卡车后面，车上装了几箱蔬菜，有胡萝卜、芹菜、西葫芦，还有两个箱子里装满了紫皮洋葱；最里边的箱子里将将露出几根葱叶。他的目光穿过掩饰物，透过汽车玻璃，一直看到马路另一边，父亲一直走到那儿，和几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安德烈斯有点垂头丧气，他本想发现父亲和另一个女人躲在一起，到头来

却变成了对母亲的回忆。

他耐心地在父亲上班的石油大楼附近等候着他，跟上他，就像电影里那样，保持着几米的距离，变换着位置，避免被发现。父亲和一帮老朋友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朝这条街走来。父亲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交给了两个男人。他们互相看了看，仿佛不高兴，两人中的一个、那个高点儿的，摇摇头拒绝了。三个人简短地议论了一会儿。安德烈斯愈来愈紧张，他害怕出什么事。突然一个人什么也不说照父亲胸口上就是一拳，脆脆的一击。哈维尔·米兰达泄了气似的倒下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家伙像商量好了似的，飞速地抬起膝盖朝哈维尔·米兰达脸上又是一下。安德烈斯吓呆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一时间，他有好多的事情想做，他想跑过去揍那两个家伙，他想远远逃离开那里，他想喊叫、想呼救，他再也不想跟踪父亲了。两个家伙捡起父亲的钱包和手表，匆匆忙忙离开了。安德烈斯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小卡车后面，父亲则费劲地站了起来，骂骂咧咧地擦干净嘴上的血迹。安德烈斯根本不敢走过去帮助他，他害怕暴露自己，暴露自己在跟踪他，暴露为什么要跟踪他。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在安德烈斯的记忆中，他两眼通红。他的记忆散发着紫皮洋葱味。

那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家。安德烈斯假装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胡乱编造说他绊了一下，撞到了办公室的大门上，眉毛和嘴都撞伤了。后来，他再没提及此事。

但是，恰恰是现在，当安德烈斯站在恰考老区一幢小楼的四层楼时，他重新想起了过去。他站在 403 单元门前，按下了电铃。一会儿，他听见，或是感觉听到了脚步声。他几乎可以肯定，那是塑料拖鞋渐渐走近的声音。门慢慢打开了，她就在那儿，安德烈斯想。她可能就是伊内斯，一位约摸七十岁的女人。她长得非常漂亮，依然保留着往昔美丽动人的女人风韵。她头发黢黑，又黑又亮。她望着他没有说话，没有任何惊奇的表情，她在等待。

“下午好，您是伊内斯·帕切科？”

“是的。”女人说。

一阵沉默。安德烈斯不知道究竟如何继续下去。他突然乱了方寸，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僵在那儿，真怕前功尽弃。老女人继续看着他，越来越惊异，在期待着。

“您不认识我？”安德烈斯停顿了一会儿，迟疑地问道，“您不知道我是谁吗？”

女人凝神地注视着他，仿佛要在心里找寻安德烈斯的面孔。

“不知道。”她终于斩钉截铁地说。

“我是安德烈斯，哈维尔·米兰达的儿子。”

妇人终于有了反应，她好像微微颤抖了一下，心里似乎在激烈斗争，但是，她什么话也没说，没有请他进门，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他。安德烈斯也只是望着她，期待着。

“我想这是个误会，”她终于说。语调是热情的，但是每个字说得铿锵有力、准确无误，“我不知道您在跟我说

谁呢。"

她没让安德烈斯再说下去，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轻轻关上门。安德烈斯沉默了几秒钟，不知所措。一会儿，听见塑料拖鞋的声音走近了，又走开了。

* * *

形势每况愈下。卡丽娜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赶到诊所，清洁工们刚刚开始干活，垃圾和阴影还同早晨融为一体。晚上八点，正常下班两个小时以后，她才离开诊所。虽然米兰达医生曾逼着她休假，卡丽娜还是拒绝了。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屏幕前，等待着意外的发生，等待着新邮件的出现。

"你疯啦。"阿德拉依达认定。

"瘾病比斑症伤寒更易传染。"约瑟夫·罗特[①] 写道。阿德拉依达不知道这句话，她从未读过，也永远不会读约瑟夫·罗特的书，但是她考虑的是同样的东西。

"你看看你的样子！"她喊道，"看这小子把你弄成什么样子啦！那个王八蛋的病传染你了吧？"

"都是你的错。"卡丽娜企图为自己解脱，有点不太冷静。"都是你让我给他写信的！"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别把屎盆子扣到我身上！

---

① 约瑟夫·罗特(1894—1939)，奥地利新闻记者和地区性小说家。

你自己被那个疯子鬼迷心窍了!”

这话不对吗? 她的确中毒不浅! 卡丽娜每天一遍一遍地扪心自问。这不单同埃内斯托·杜兰失踪后她态度的变化有关系,更有甚者,她居然敢把一切告诉阿德拉依达,敢把那或许连提都不敢提的事情告诉她。

第一次出事是上上个星期三。回家的路上,卡丽娜在一家出租音像制品的商店门口停住了。她想,说不定看场电影能帮她解脱最近一直没完没了的失眠。她是晚上七点进店的,店里挤满了人,卡丽娜估摸也找不到什么好看的片子。随便翻了翻就朝标着喜剧片的架子走去,说不定她就缺点儿喜剧消遣,有了这个就可以睡个好觉儿。可是,当她顺着窄窄的过道向架子慢慢走过时,眼睛突然扫到了片名,她顿时开始感到紧张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突然,整个店铺显得格外狭窄,她渐渐感到周围人头攒动,她根本无法随意动弹,憋得喘不过气来。心中一阵微微的战栗使她感到震撼。简直就像触电,微弱地在末梢神经上一扎。卡丽娜开始听到其他顾客在说话,声音有远有近、有大有小,她甚至觉得他们在围着她转,吊在店铺弯弯的屋顶上跳舞。她感到坐立不安,左眼皮直跳,似乎孤身一人,似乎无依无靠。她两边的太阳穴发凉,唾沫像沙子似的难以吞咽。她不禁又想起埃内斯托·杜兰,这使她表情陡变,随手操起一盘带子,拿在手里,急匆匆地向收款台前排队的人们走去。

前面有三个人。卡丽娜无法相信自己会出这种事儿。她竭力静下心来，深深地呼吸着，攥着拳头，把指甲扎进自己的手掌心，好像要扎破自己的手，好像疼痛是使自己不致失控的办法。同样的恐惧，在信中早已司空见惯的恐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她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吗？她能在此时此刻晕倒吗？为掩饰自己，她弯下腰装作检查鞋子，这样她膝盖着地，稳住神，使劲儿控制住自己，使劲儿保持着平衡。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她身上。她在一封患者来信上看到过。有一次，埃内斯托·杜兰对她讲起过他在银行排队时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此时音像店的其他顾客并不知道，他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他们不常看到一个女人一边排队付钱，一边时不时蹲下去检查自己的鞋。卡丽娜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无法避免。她每次抬起身子，都做出适当的微笑，做出某种表情和一种无用的解释。很快，她又感到虚得不行，汗越流越多，她感到极度头晕，脸色蜡黄，缺氧缺得无法忍受，她前面只剩一个人了。她透过玻璃大门向外望了望，这才感到稍稍安静了一些。即使如此，也没有用。接着就是一种火辣辣的痛感，嗓子里一阵强烈的刺激。卡丽娜开始搔脖子。她担心是过敏，尽管她无法回避这一切同缺氧有关，是缺氧使她一刻不得安宁。她站在原地活动了一下，伸了伸胳膊，扩了扩胸，用鼻子和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靠在柜台旁的甜品架上，重新弯下腰检查了一下鞋，然后站起来，用手擦了擦脸颊上的汗水，悄悄观察着

身后排队等候的其他人……不能再装了。她跌跌撞撞、神色慌张地把带子往几排巧克力上一放，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那里。她气喘吁吁地迈了几步，一直走到小贸易中心的台阶上。她不顾一切地坐在那儿，根本不理会那些从她大腿旁穿行而去的匆匆过客。

她不知在那儿坐了多久。只记得自己在千钧一发之际、在最后一秒钟得以平安无事的感觉。难道埃内斯托·杜兰得的就是这种病？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吗？难道他会传染？她现在也得了他的病？

* * *

安德烈斯在看最后一张X光片。他把结果带回家了，坐在床上，手举着片子，借着窗户的光亮观察父亲的脑部。蓝色片子上阴影清晰可见，精确得使他简直无法忍受。神秘感常常让死亡更容易忍受一些。如此精确的科学成果居然无法忍受，它在为谁服务？在帮助谁？

他突然感到手上分外沉重，凭空举着片子都费劲儿。这种片子他看了多少？太多了，他多少次面对那些行将就木的面孔？他早就数不清了。日复一日，他只计算过救活的人，例外生还的人。死去的人另当别论，单独计算。现在他也许会想起路易斯·费迪南德·塞利纳[1] 的

---

① 路易斯·费迪南德·塞利纳(1894—1961)，法国小说家。

小说，小说里有一位医生，“他像描写一张老熟人的脸似的描写疾病。”这就是现在安德烈斯感到沉重的东西，那种与疾病源远流长的关系。或许，他看到太多的人死去了。

一次，他梦见所有他的死人聚集在一起，联合成立了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叫“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损失的病人”。他不喜欢“损失”这个词，他觉得不公平。也许因为他心里明白，医生或早或晚总是损失，他们永远得不到一个理想的平均数。毁灭就是他们的命运。梦中，他的病人还是病人，仿佛被时间冻结在生命的某个时段。虽然他们个个浑身瘫软、面色灰暗，几乎和他们临终时的样子毫无二致。堂·阿古斯丁·梅希西，步履艰难地抱着一个挂满血袋的架子；阿雷亚萨夫人坐在轮椅上；托马斯·埃尔南德斯头上依然裹着纱布；西尔维娜·罗西尼用花手绢捂着秃顶，拼命地咳嗽；老皮门特尔光着身子，躺在一张小床上，目光迷离，嘴唇干裂。所有人都像最后见到时的样子，他的梦幻没有走得更远，他们和他当初遇到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梦里，没有任何病人看他一眼，只是在那儿踱来踱去，时不时互相简单地打打招呼，从不回头看他，仿佛他不在现场。安德烈斯想，下次再做梦，父亲也许就在梦中了，也许同样没完没了地散步，不搭理他，不看他一眼。

玛丽亚娜看见他时，他躺在床上，片子放在一旁。这天是星期六，刚刚下午五点。

“你好吗?”

安德烈斯没有回答,他双眼紧闭,但明摆着没睡着。玛丽亚娜走过来,坐在他旁边,手伸进他的头发,轻轻地搔着他的脑袋。

“咱们带孩子看电影去吧。”她说。

安德烈斯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慢慢地摇摇头,拒绝了。

“你快有三个星期没理他们了,他们知道你在照顾爷爷,可是,他们无论如何需要你,他们想你。”她语气稍稍加重了一点儿。

安德烈斯睁开了眼睛。

老米兰达和玛丽亚娜是在赤身裸体时认识的。安德烈斯和玛丽亚娜一块儿出去了一个月。一个周末,安德烈斯趁父亲和朋友们去巴基西梅托的机会,请玛丽亚娜到家里过夜。他们一块儿做海鲜饭——章鱼又硬又粘锅,味精过多——一块儿喝白葡萄酒,做爱一直做到清晨。星期天上午,他们一块儿洗澡。他们正在喷头下拥抱接吻时,突然,听见叫门的声音。

“安德烈斯,”父亲喊,“你在家吗?”

那是上午十一点钟。水冲在浴室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像成千上万根小针撞击地面,响遍了全家。玛丽亚娜本能地紧紧抱住安德烈斯,想找点儿遮拦。安德烈斯一边拉上浴室的塑料帘子,一边飞快地盘算着如何应对。来不及了,父亲已经到了浴室。

“你没听见我喊你？”

“噢，噢，当然……不过我没想到。”安德烈斯故作镇定，使劲儿把玛丽亚娜挡在身后。“你不是晚上才到吗？”

“真倒霉。昨天，我们的汽车刚刚快到奇瓦考那儿时，轴头裂了，耽搁了一个下午，我们就睡在乌拉奇切了。所以今天上午早早就回来了。”

接着，玛丽亚娜和安德烈斯便听到老头往马桶撒尿那经典的哗哗声。父亲居然在他们身边撒尿。安德烈斯想象得出来，他会面朝马桶，裤子耷拉到脚踝上。玛丽亚娜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一种讨厌的吱呀声，一种中途被扼杀的呼喊声。安德烈斯使劲儿想拦住她，可是已经为时过晚。老米兰达莫名其妙，起了疑心，伸手一把拉开了帘子。而他还是那么站着，裤子在脚面上堆成一团，从腰往下赤条条，他吃惊地望着同样光着身子、死死搂着安德烈斯身体的玛丽亚娜。

“爸爸好！”他强作笑颜地对父亲说。

父亲上了大街，足足两个小时没回家。后来，他带着一份比萨回来了。言谈举止绝对自然，好像浴室的一幕根本没有发生过。就连安德烈斯打算谈起这事儿时，他都迅速改变话题。两个星期后，当安德烈斯正式向他介绍玛丽亚娜时，父亲伸出手，带着狡黠的表情同她打了个招呼，再没有说什么。

“你在想什么？”玛丽亚娜问。

安德烈斯没有马上回答。好长时间以来，他也感到

自己满脑子尽是奇思异想，思绪漫无边际，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却改变了方式，回忆起一些细枝末节来，带上了另一种感情色彩，感到过去变成了一个格外鲜活的身体。

“你在想什么？”玛丽亚娜追问道。

“想伊内斯·帕切科。”安德烈斯说。

他也的确忘不掉她。没准儿她正是他所不熟悉的那个过去，那段曾经迷失的、如今却以坚决有力和无法摆脱的方式出现的过去。帕切科太太占据了他的脑海。如今，她就住在那儿。几天过去了，父亲依然没有反应。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估摸她应该告诉他了，大概立刻就会给他打电话了。她也许会告诉他，你儿子刚刚来看过我了。既然如此，父亲为什么还保持沉默？为什么从未对他提起过这个女人？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瞒着他？还要对他隐藏这段生活？安德烈斯不由感到一阵痛心。恰恰在此时此刻、在此情此景下，他开始感到父亲也成了陌生人。

“说不定他们没见面。”玛丽亚娜说，“没准儿他们根本就不是朋友。”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说不定还有仇呢。”

“你觉得她打电话了，其实你自己也不清楚。你玩了一把侦探，可你也可能搞错，凭什么那个给你父亲打电话的女人一定是伊内斯·帕切科呢？”

“好吧，”安德烈斯让步了，“你有理，不过伊内斯·帕切科确有其人。我父亲和她有过事。”

“你烦他们有事吗?”

“不是,当然不是。”

“几天前我就对你说过了。凡是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也包括你父亲。”

安德烈斯表情激烈,突然抄起父亲的X光片和脑片给老婆看。

“玛丽亚娜,这他妈是什么?难道这就不是私生活?”

她紧张地望着他,带着一丝责备。安德烈斯安静下来,低下了头。她走了,说是自己和孩子们看电影去。安德烈斯重新跌倒在床上,他第一次意识到病将会剥夺他想不到的东西:对话,对话的可能性。病也正在破坏他的话语权。

* * *

老米兰达和梅尔妮之间的约定也包括一块儿去互助会。梅尔妮把它当做另一项义务,好像又多了一笔钱帮儿子买公共汽车月票。他们天天早上背着安德烈斯出去。老米兰达通过一个护士知道了互助会,她对他谈起了这件事。

“那个互助会帮助了很多人。”护士对他说。

起先,哈维尔·米兰达并没产生兴趣,可是第三次化疗时他又向护士打听了更多的情况。这会儿,他们第一次来到了这里。梅尔妮显得拘谨,担心地观察着周围。

而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好像走错了地方。他们正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在一座楼的底层，二十几把塑料椅子围成了一个圆圈。一张小桌子上堆满了纸张和一把咖啡壶。一位殷勤有加的夫人向他们表示欢迎并收了他们的登记费。听说不许带陪同后，老米兰达又替梅尔妮付了费。其他参加者并没显得兴高采烈。一丝淡淡的惆怅似乎在所有人中间游动。一位夫人在用学步车走路，一个年轻人身材细瘦、面色苍白，一个男人少了一条腿，一个女人不停地搓着手，一直没有抬起低垂的目光……他们会怎么看我？哈维尔·米兰达想。他们见到我后会有什么评价？梅尔妮脑子里也在盘算着自己的问题。难道有人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是用人和陪同？会不会有人觉得她是老米兰达的老伴儿？会不会有人觉得两人之间毫无关系，她之所以在场因为她也是病人，因为她也需要开始和死亡谈判？

“早安。我叫罗赫尔·皮孔·埃雷迪亚，借此机会，谨向大家表示热烈地欢迎，欢迎大家光临今天开张的这个新互助会。”

这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高个子男人，一副举重若轻的神态，行动十分敏捷。他天性宽厚、笑容灿烂，轻而易举地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他一边讲话，一边在与会者之间走来走去，看着他们，变换着各种表情，仿佛是老相识了。

“首先，”他说，“我希望大家丢掉忍气吞声的面孔，我

们不是被逼而来，这里不是伤心者俱乐部，不是绝望者俱乐部，绝对不是！一切正相反！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互助会叫做‘学习死亡’，但这里不是殡仪馆，不是的，先生、夫人。这里我们的主张恰恰相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和评价我们曾经和现在是如何辉煌的生命。你们正是为此而来。因为你们依然希望享受生活，你们依然希望快乐地生活。来来来，大家起立，是的，大家都起立。好的，现在大家拉住手。没错，就这样。准备好了吗？OK!”

这时，梅尔妮觉得自己最好站在外面，在大街上等。眼下，她一手只拉着老米兰达，另一只手拉着那个身材细瘦、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年轻人的手在出汗，老头的手冰凉。她突然想到小伙子没准儿染上什么可怕的传染病了，本能地松开了手。年轻人看着她，梅尔妮觉得不对劲儿，又重新拉住他的手。

“大家感觉怎么样？”那个男子踱着慢步，在大家身旁走来走去。他走到梅尔妮面前：“紧张吗？”

“有点儿。”她充满歉意地低声道。

“别担心，没事儿。”

说完他继续往前走。梅尔妮此时感到右手被轻轻地攥了一下。她知道那是下意识的动作，可是米兰达的手又传给她另一个信号，一下简短的紧握。她看着他，老米兰达狡黠地笑了笑，似乎特别开心，居然孩子似的玩起了小花招。

“请大家闭上眼睛。深呼吸。就这样，一、二，一、二，

再来一遍。轻点儿,很好。现在我希望大家到记忆中去旅行、去回忆,重返你们经历过的最神奇的地方和时光。重温爱的时光,欢乐的时光,胜利的时光。重享和你所爱的人、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继续深呼吸,一、二,一、二。现在,大家和我一起喊:活着。”

一群人统一行动谈何容易。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满不在乎,似乎将信将疑。与其说是在听从互助会主持的指令,不如说是在应付。

“来,不对,不是这样。这样谁会相信你们在讲实话。来吧,使劲儿:活着!”他走来走去,动动你,动动他,拍拍大家的后背,鼓动着。“大家一起来! 活着!”他走到米兰达身旁,伸出胳膊,“来,师傅! 使劲儿。活着!”

他终于组织起一个起劲儿的或半起劲儿的拉拉队,梅尔妮想起自己住处的传教士。他们一样大喊大叫,他们振臂高呼口号,唱歌。每个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点不错。但是女人不能穿长裤,这点不好。梅尔妮觉得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小伙子手上的汗越出越多。

“现在大家跟我学:我活着。我生活幸福。当我一想到我的生活,想到我自己,我的脑海中只有一句话:谢谢。是的,谢谢。因为我的生活是一个奇迹。因为我的生活是一份厚礼,谢谢。谢谢生活。”

所有人异口同声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接着是几秒钟的沉默。大家都在等着黑皮肤的男人说点什么,继续干点儿什么。谁也不敢睁开眼睛。老米兰达开始意识到互

助会是一场骗局，只是那些战斗中的伤员、那些无法重返战场的伤员的小小竞技场。在那儿通过一个慷慨激昂的传教士为他们献上一场场演说，说明他们也有幸福的失败。

“可以睁开眼了。”那人终于说。

他满面笑容地迎接大家。一个劲儿询问众人的感受如何。他想方设法让大家看到现在好多了，这种运动给了他们特殊的光彩，他们已经不像起初那样萎靡不振。然后，他让每个人高声报出自己的名字，只报名字。梅尔妮害怕了，她一辈子没干过这样的事。从来用不着这么多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轮到她时，她觉得名字卡在嗓子眼儿里，想说又说不出来，要逃跑了，要消失在自己的身体里了。过了一会儿又发现一切轻而易举，她高声道：梅尔妮。说完便感到一阵轻松和自豪。她发现说出自己名字时没什么大不了的，挺好，和大家的名字彼此没什么两样，于是梅尔妮感到自豪，出奇地平静，感到像通过了一门考试那样心满意足。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也许那些理由使你们感到羞愧和些许难过，不是吗？你们感到弱不禁风、脆弱不堪。不对，不对，不对，你们本来不是这样。请注意：这里有男人、有女人、有年长者、有年轻人，有白皮肤、有咖啡加奶色皮肤、有褐色皮肤，谁和谁都不尽相同。肯定到今天之前你们互不相识。但是，我肯定现在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觉。大家

注意，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很多人不敢进入互助会。的确，你们也听说了，一提名字就把他们吓住了。他们和你们一样，他们想你们所想，但是他们已经自我麻痹，他们已经关上了生命的大门，束手就擒。但是，你们没有，你们不畏艰险，你们尝试了，你们就在这里，参加了互助会称为'学习死亡'的第一次会议，是的，所以要为此而鼓掌。我要为你们鼓掌。坦白地说，我为在这里见到大家而激动，我感到钦佩，我祝福你们，真的，真的。"

他们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老米兰达不愿意坐地铁，他喜欢在地面转悠，浏览市容。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天空湛蓝湛蓝的，阳光有如高处一块白色的巨石。他们找到了座位，挨在一起坐下来。梅尔妮什么话也没说，直到老头问她：

"你觉得怎么样？"

"怪怪的。"

"怪怪的是好还是坏？"

"不知道，我就觉得怪怪的。"

他看着她，笑了。于是，她也笑了。

* * *

邮件已经不必再看，一切可想而知。她的眼睛多少次扫过那些足以背下来的邮件。她不需要看，用不着看。有时，坐趟车、出趟门，埃内斯托·杜兰的话便从电脑屏幕

上跃然而出，在信纸上晃来晃去，开始在她的心中喘息，她甚至发现心里在默叨着信上的话。就那么三言两语。她不止一次地、神奇地记起了他的原话："在我的身体内有一处悬崖。"卡丽娜毫不费力就能在杜兰六月十二日下午六点二十四分发的第三封信第三段的前几行找到这句话。

有一次，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新闻，说是一个人正在组织一个特殊社团：全国病人联合会。他们要成立一种特殊的工会，市民可以通过工会对付医生、对付医疗。卡丽娜立即想到，埃内斯托·杜兰肯定在那儿，他肯定是这个未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希望尽量掌握他的第一手消息。当天晚上，她看到电视上在采访几个运动发起人。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女士，她讲述说，有一次一个奇怪的小动物在她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她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咬的，但是她怀疑是一种小虫子，那一种她完全不熟悉的小虫子，既不是蚊子，也不是马蝇，更不是小咬，是别的东西，她说。整个胳膊开始肿起来，紫黑紫黑的，她没法子，只能去医院看急诊。医院的一位值班医生——据女士讲——接待了她，打算用手术刀切开她胳膊上的肿块。他什么也没问，什么话也没说，没做任何解释。卡丽娜判断女士说的是实话，因为直到现在，她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怒气冲天，咬牙切齿，几乎气得哭出声来。医生的手术刀在她的皮下折腾够了，最后居然只说了一句什么也没找到，就撇下她观察了两个小时。后来才给了她

一点消炎药，还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消炎药不是治蚊虫叮咬的，而是因为他动了一次幸运的手术。“不要担心蚊虫叮咬，”女士说医生这样对她说，“时间一长就消了。”她付了一大笔钱回家了，脑子里不断闪动着一个念头：全国病人联合会。

后来，又有几个人谈了谈。一个小伙子的妹妹在城西一所医院因缺氧而死。一个缺条腿的男人控告一位麻醉师失职。一位护士说她懂医，她保证在当护士之前，就生过病……埃内斯托·杜兰一直没有出现。卡丽娜甚至试着和那个组织联系，她终于和其中一个人通了电话，但是一无所获。没人认识杜兰，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你不正常。你那么胡思乱想不正常。”

阿德拉依达认为卡丽娜被人耍了，有人——谁知道是不是埃内斯托·杜兰本人——玩的巫术把她给逼疯了。她坚持认为卡丽娜应当坚守阵地，同三教九流、同精神论者、同圣洁、同远见……同不属于她已知世界的任何势力去抗争，她需要更多的精神食粮而不是知识。卡丽娜大概向她讲述了发生的事儿，没有过分纠缠细节。虽然她在音像店里的经历后来没有再出现过，但是，类似的情况后来又有过两次。最严重的那一次，是刚刚两天前在地铁，那次犯病犯的时间实在偶然，当时，她正挤在人群中站着。不到两秒钟，她就感到大事不好。人喘不过气来，心咚咚跳得像石头砸，皮肤上潮乎乎的，舌头红肿，感觉嘴里生了一只大癞蛤蟆、一个皱皱巴巴的怪物蹭着她的

下颚，和她争夺空气，使她喘不过气来。刚到下一站她便跳下车，发誓再也不上地铁车厢。

阿德拉依达坚持认为，不是身体因素，是生理因素。没有注射器能治眼疾，没有消炎药可以对付污言秽语。面对语言秽语，科学无能为力，战争要靠其他能源、靠其他武器。卡丽娜喜欢把什么都想成稍纵即逝的东西，是暂时使人焦虑不安的事物，是临时性的，不定哪个早晨一觉醒来，一切已然成为过去，未来将是一个没有恐惧、没有窒息、没有昏迷的可爱和平静的星期四，一个根本想不起埃内斯托·杜兰的星期四。

※ ※ ※

上午，安德烈斯一直待在手术室。虽然他是因为没感觉，因为的确不喜欢手术室的活儿才干了内科，但是，他时不时也上手术台。一般是应朋友之约，米盖尔就常常拉他上手术台，找他咨询。今天是马丽克鲁斯·费尔南德斯请他，他们给一个病人切除了两个肝肿瘤，她想请他看看，在术中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尤其是第二个肿瘤，性质难以确定。是混合型，一部分软，一部分硬，只有一侧呈脑海状。这一次，安德烈斯感觉头晕目眩，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一看到女人的身体，他顿时感到心中空空荡荡，仿佛要坠入五脏六腑，永远坠入那个凄惨、昏暗的肝脏之中。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他来到一家咖啡店喝了一杯橙汁。后来又坐在化疗室大门口对面，坐在那儿，他目光茫然地思考着。近一个星期以来，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有些病来势凶猛，令人束手无策，安德烈斯愈来愈无法忍受，愈来愈备受煎熬。甚至连那些医学术语都让他忍无可忍：

新组织切除脓胸葡萄球菌

脓胸胸膜吻合术、结肠吻合术

活组织检查止血修复术、剖腹术

局部缺血结石症

这是医院楼道里永远风行的医学术语，你一闭上眼睛，就听见这些术语。随便谁在交谈中，不管说什么话，那些只服务于生、不抵抗死的术语都格外响亮，格外引人注意。现在，安德烈斯终于相信了，这些术语就是华而不实的字典。这天早上，他去找父亲时，看到他光着身子坐在床上，虽然眼睛睁着，但看上去还没有睡醒。安德烈斯犹豫了一会儿，他觉得老爸是不好意思。亲情突然变得残忍了。他终于走过去，坐在他身旁。老人没有动。安德烈斯仔细地看着他，他是那么脆弱。两条细细的腿软弱无力。收兵回营的阴茎，像根小手指头睡错了地方，仿佛从来没有真刀真枪战斗过。骨架更加清晰可见，从头到脚一目了然。脸上挂着深深的失落。

“你好吗?”安德烈斯伸出胳膊扶着他的肩膀，尽力

装出一种难以理解的乐观。

“不好。”老人依然没有看他。“安德烈斯,我累了。我不想治了,不想再治了。”

“你今天早上好多了,的确好多了。”安德烈斯强撑着说,尽管话难以启齿,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他必须说点什么。

“今天昨天一个样,和以前一样,和以前的以前一样。”

“来吧,我帮你穿上衣服。”

“我真的不想去。”

“你必须去。”安德烈斯蹲在他对面,两双眼睛深情地相互注视着。

“疼,”老米兰达停顿了一下说,几乎是在低声自语,好像是一声叹息,“浑身疼,儿子。太他妈的疼了。”

现在坐在楼道里,已经听不到医学术语,已经没有新组织局部失血脓胸胸膜。太他妈的疼了。没有别的。

“生理疼痛,”胡利奥·拉蒙·里贝罗在日记中写道:“是我们情感和欲望之间伟大的调节器。生理疼痛的出现立即抵消了除疼痛消失之外的全部渴望。我们因平淡无味、毫无公正,因普通和荒谬而拒不接受的生活却立即获得了无法估量的价值:我们全面接受了那种生活,包括生活的种种弊端,结果生活却在无形中以最卑劣的手段给了我们痛苦。”

安德烈斯决定当天余下的时间留下来陪他,请他去

自己最中意的一家餐厅吃饭。餐厅开在一个僻静去处，厨艺出名，他保证说那儿能做一手地道的私家菜。可是，老人没什么情绪。安德烈斯坚持要去，最后父亲好像豁出去了，接受了。他们没有享用成美餐。老头一个劲儿恶心，反胃让他什么都吃不下去。他们默默地回到了家。父亲脱光衣服就上了床，安德烈斯重新坐在他身旁。他能干什么？父亲又希望他做些什么？难道还能做点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老米兰达躺在床上，嘴巴朝上，失神的目光望着天花板，安德烈斯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

“有一天我给你找药时……我看到了这个。”他说着，把书指给他看。

父亲似乎对话题没有特别的兴趣，安德烈斯把书放在他眼前。

“医院一位护士向我推荐的。”他最后低声说。

“《庄严地死去》，”安德烈斯念着书名，看着他，“不是太乐观吧。”他评价说。

“生命并不乐观。”

安德烈斯叹了一口气，靠近他，亲热地用手捋了捋他的头发。

“老爸，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吗？”

“我唯一的胡思乱想就是死，我已经在死了。”

安德烈斯不知说什么好。书掉在了床上，他继续抚摩着父亲的头，两人就这样待了一会儿。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对我说起过?"安德烈斯决定冒一次险。

"说什么?"

"伊内斯·帕切科。"

这一下,父亲欠起身,转过头望着他,与其说是惊奇,不如说是失望,也许是恼羞成怒。别看他身体虚弱,态度中却透着坚决,甚至是严肃。

"我认识她了,去看过她。"安德烈斯说。

这时,老头慢慢消了气。情绪好像突然从一个隐密的小洞一泻而空,他哼了一声,倒在床上。接着闭上眼睛,好像什么话都不想再听了。

"她没跟你说过?什么都没对你说过?"

老米兰达依然老样子,待搭不理。

"她知道你在这儿,知道你病了吗?"虽然父亲一声不吭,但他还是继续问道。

几分钟默默过去了,安德烈斯也慢慢倒在床上,躺在父亲身旁。他也放开目光,两眼注视着天花板。两人或许都希望一切尽快结束,一切画上句号。死亡不喜欢疼痛。疾病是苦涩的买路钱,是反复无常的商业税,它足以将死亡变成所有人最后追求的目标。

"好臭。"老头突然说,眼睛依然闭着。

他是对的,但是安德烈斯没有迎合他,沉默着。每种病都会在人体内部造成特殊的反应。

"我恐怕早就开始腐烂了吧?"

安德烈斯没有看他——他不敢。

“爸爸，你太灰心丧气了，真的。”他喃喃道，嗓子里好像打了个结。

“你没发现吗？什么怪味，氨水那种怪味。洗澡时都能闻到。”

安德烈斯轻轻伸出手拉住父亲的手。合上眼皮，似乎想关闭内心深处的记忆，似乎希望自己的回忆之手永远抓不住这番情景……

“我绝望了。”他突然坦白地说，“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不知该干什么。”

静默是一把刀，深深插入下午的肌肤。两个人谁都不敢睁开眼睛。

* * *

“一个人，如果哪天早上有人通知他，说他只有三四个星期的活头了，这个人该怎么办？”

就这样，开始了互助会的第二次聚会。两个新人入会：一个身材粗壮、呼吸困难的女人，一个三十来岁、面目可亲、举手投足局促不安的年轻小伙子。罗赫尔，还是那个褐色皮肤、满面春风的人，重新熟练地指挥起到会的人们。

“来，请大家想想自己。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正经历着

同样的情况。我保证这不是第一次。我在很多互助会服务过，这种经历不止一次了。但是，如果是第一次，也没有关系。大家做一下脑部练习。你们去想象：现在你们每个人面前都站着一位杰出的医生，一位非常重要的专家，他来到你面前对你们说：老爷，夫人，先生，小姐……我遗憾地通知您，您的生命将只有最后一个月。你们将怎么办？”

梅尔妮担心哈维尔·米兰达，担心他的年龄、他的痛苦和他现在浑身虚弱无力。好一阵子以来，常常见不到他的人影。最后的日子里他会干什么？他是在合理利用时光，还是在浪费时光？谁会知道他在干什么，谁想得出来？

“请注意这并不简单，”罗赫尔又开始在与会者中间走来走去。“再说，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总是深思熟虑、审时度势或者斟酌再三的。面对一条消息也许可以，您甚至可以用一个星期来消化消息，确信消息，接受消息。人和其他动物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唯一一种知道自己将会死亡的动物。一条狗不知道死，一只猫想不到死，也想象不出来死。相反，人可以想象得到。一边想着死，一边活着。经受着煎熬，经受着那种智慧的煎熬。更有甚者，有的人活了一辈子都在设法逃避已知的一死，都在竭力不想一死。有的人只有忘掉死亡才能活下去……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在做这种练习。来吧，你们还有四个星期的生命。四个星期里，你们想干什么？”

得知自己患病后，哈维尔·米兰达一直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他想到了儿子，想到了玛丽亚娜和孙子们，他甚至想到了长期梦寐以求去亚马孙远足，还想到了伊内斯·帕切科。但是他和伊内斯已经好久不联系了。另外，在死前确定一系列目标的想法开始和清醒的感觉混杂在一起，他清楚地感到，他的死讯正在持续不断地扩大，渐渐变得家喻户晓，这就是疾病后果之一：个人的末日成了集体的典礼。但结果适得其反：老米兰达不能不开始考虑回避，他想躲藏，想离群索居，想销声匿迹。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检查、治疗和药量层层加码，高兴和欢乐越来越少。不是自暴自弃，事到如今，一切都是彻底失败，没人能够起死回生。

"旅游？差不多。是个好主意。"罗赫尔挨个问每一个人，寻找和讨论着答案。"您喜欢去哪儿？"

"去纽约。"一位老太太嗫嚅道。

"去纽约，很好。"他又往前迈了两步，来到瘦小伙子面前，"你呢？鲁道夫，你打算做什么？"

"如果说我只有四个星期的生命了，我就尽可能救自己，多活些日子。"

"比如说……"

"去看看那些用手治病的医生，试试自然疗法，和玛丽亚·利昂萨打打交道，吃点草药，病急乱投医呗。"

"很好。非常感谢，鲁道夫。"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往前走，眼睛一直观察着大家，"还有谁想参加？"他在一位

六十岁上下、眼睛上缠着纱布的老人面前停了下来："咳，堂埃斯特万，您老怎么说？做点什么？"

"我要找个妞儿。"老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一些与会者也乐了，另一些人保持着沉默，交换着目光，那目光预示着胡言乱语的开始。

"我从没和女孩儿在一起过。我说的是真话。"

"好啦，好啦，堂埃斯特万。我们相信您的话，非常好。"他突然在梅尔妮面前停住了，两手撑着膝盖，冲她一躬腰。语调格外热烈："现在我们听听梅尔妮怎么说，你想做什么？"

梅尔妮感到自己真笨，大家都在看她，她害怕。她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正要做什么坏事。她张皇失措，觉得该说的话不对，是傻话，不着边际。

"好吧，梅尔妮，你只有四周的生命了，这段时间你将做什么？"

"送我儿子去梅里达。"她急忙说，紧张得不敢抬起低垂的目光。

* * *

"米兰达医生！"

卡丽娜第一个听到了喊声，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身旁的米兰达医生不像在装聋作哑，可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若有所思地闷着头，继续往前走。就连卡丽娜自己

都怀疑了:她真的听见了?还是幻觉?她突然觉得不可能,声音怎能想象呢?

"米兰达医生!"

她第二次听到了喊声,感到浑身一阵毛骨悚然。声音来自身后,来自身后左边,左上方。后面、上方、左边,卡丽娜感觉叫喊声在脑海里撞来撞去。她原本陪米兰达医生去送一些样品,这会儿,两人正顺着楼道静静地往回走、回诊所去,突然出现的喊叫声对卡丽娜来说有如一道闪电,可米兰达医生似乎一无所知。

"我觉得有人在叫您。"卡丽娜用手拍了拍米兰达医生的胳膊,终于说。

于是,两人转过身去。他们一如往常地慢慢回过身,虽然卡丽娜有点儿反常,她转得手忙脚乱,格外紧张。她没有猜错:埃内斯托·杜兰正向他们走来。他依然是老样子,格外正常,可卡丽娜则感到一丝失望。他居然不显消瘦,毫无病态,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因健康危机而来、因突发可怕的症状而来。当然也不是精神矍铄,而是笑容可掬、神态平和地走过来,平和得有点忸怩。

"可以和您谈一分钟吗?"他望着米兰达医生的眼睛问,声音中听不出任何特别的热情。

"问题是……"

"对不起,就一分钟。"

卡丽娜格外紧张。她甚至不敢凝神注视他们任何人。她低下头,眼睛从自己脚上挪到米兰达医生脚上,他

穿了一双漂亮的咖啡色皮鞋，她的目光又转到了埃内斯托·杜兰脚上，一双老掉牙的低档鞋，也是皮的，黑颜色的，没有鞋带，鞋尖又窄又长。

直到她感到医生的手在她的肩膀上拍了拍，她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思想开小差了。她仰起脸，感到了杜兰注视着她的目光，立即感到心中一阵热潮。她希望自己不要脸红，希望自己没有任何表示。她试图尽可能表现得若无其事。

“你先走，把这些结果送给萨纳内斯医生好吗?”

她回答说好，当然是好，事情明摆着，她应承着，拿起报告单，又说了一声好。直到报告单掉在地上了，三个人弯腰捡起幸运的检验结果时，她还又说了一声好。她感到这会儿离鞋更近了。这种念头让她感到荒谬，感到厌恶，感到愤怒。几乎如同自己置身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之中一样。她走开时，感到心跳加速，推着她走得飞快。穿过楼道拐弯后，她停住脚步，喘了一口气，想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她从墙角探出头，观察着远处的两个男人。埃内斯托·杜兰穿了一条蓝裤子、一件棉布衬衫，正在说什么，偶尔比画着两手。他到底在说什么？卡丽娜估摸一切全完了。一想到事情最终将真相大白，自己将暴露无遗，便吓得早已顾不上确认埃内斯托·杜兰还活着、一切正常。现在要出什么事了？

在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中，医生对病人解释说：“在我是医生你是病人的事实中没有道德和逻辑，只有纯

粹和简单的巧合。”也许，卡丽娜一边看着两个男人，一边悄悄想着这句话。她甚至会认为，她就是使两个男人——一个医生一个病人——联系在一起的偶然因素。此时此刻，她难道不应该走过去，向两个人彻底做个解释？难道不应该去告诉他们，是她，只有她，只有这唯一的纽带才能使两人彼此见面、彼此交流？然而，卡丽娜全身瘫软、呆若木鸡，甚至无法大口呼吸。她依然张皇失措地看着杜兰和米兰达，当然只是短短一瞬间。

怎么了？刚刚剩下两个人时，埃内斯托·杜兰便做了一个简短的手势，像是在空中拧了一圈无形的螺母。同时，脸上露出一副怪样。

“非常感谢。”他说。

说完，他望着安德烈斯，毕恭毕敬地点点头。安德烈斯困惑地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

“久违了，是吗？”杜兰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

米兰达望着他，越来越茫然。他的态度让杜兰为之一惊，那就是他给人的印象。看上去，医生的言谈举止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也许，他想象中的会面是另一种形式。

“您说。”

埃内斯托·杜兰更坚决地点了点头，既然无法拐弯抹角，那就只好单刀直入了，他干咳一声。最后直盯盯地看着他的眼睛：

“医生，我的病，”他语气沉重地说，“在要我的命。”

安德烈斯感到心里有些丧气。他突然不理解自己站

在一个不认识的家伙面前干什么。大概搞错了。今天上午，在堂堂医院的楼道里，居然出了一场可怕的误会，出了一件荒唐事。安德烈斯向身后望了望，又四下望了望，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那种被张冠李戴的表情。

“说真的……”

说真的？是说真的。病正在要他的命。安德烈斯首先的冲动是想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比如：“说病要命，是吗？咱们大家彼此彼此。”安德烈斯完全可以这样告诉他，然后转身扬长而去。也可以多少为他鼓鼓掌、鼓鼓劲儿：“别那么大惊小怪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活着就是为生病，为生病活着。”陪他在楼道走两步，然后急忙向诊所溜去。还有一种可能，可以跟他谈谈父亲，把最后的检查结果给他看看。把他跟自己的父亲都很难说出口的话告诉这个陌生人。告诉他他已焦头烂额，不知道如何忍受这个时刻。他甚至无法想象，实在无法想象哈维尔·米兰达将不再是哈维尔·米兰达，他将不复存在。病在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对不起。”他最后说，他一边说一边试图缓和一下口气。“我觉得这是个误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杜兰听完他的话，晃了晃脑袋，仿佛两个耳朵进了水似的。

“你认不出我来了？”他突然问道，说着死死地盯着他，称呼也换成了“你”。

“不认识，实在认不出来，请原谅。不过，我觉得我根本没见过你。”

“我是埃内斯托·杜兰。”

安德烈斯用舌头润了润嘴唇，像是凝神静思了几秒钟。埃内斯托两只眼睛还在冥思苦想，悄悄寻觅。

“对不起。”安德烈斯停顿了一下，又说。

他做了一个告辞的手势，一个中止谈话的简单表情。

“你等等。”埃内斯托拦住他，手使劲抓住他的胳膊。

“那些信？”

“信？”他问道，愈来愈感到莫名其妙。

“邮件，电子邮件，我们互相写了几个月的邮件。”

“请原谅我，现在我可以肯定：你搞错了。”

“可是……”

“我不写电子邮件，一辈子没写过一封。你真的搞错了。你看看指示牌，有位看胃肠病的医生，和我同姓，也许你搞混了。”

不等埃内斯托再说什么、做什么，安德烈斯走开了。不紧不慢，没有回头，甚至没有道别。把会面变成了偶遇，一次简单的误会，变成了医院楼道里几句诚挚的道歉。

*　　　*　　　*

当玛丽亚娜看见地上三个血点时，她明白时辰到了。

几天前，他们就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事儿。不是事儿，而是事件，一件大家早已料到的、正在等待的事件。她万万没想到这个星期三就来到了，才下午四点，爷爷刚回他们家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安德烈斯出门了。老头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情绪一直低落，与人难以相处。玛丽亚娜能够理解他，但是却无法忍受他。她也希望一切早点结束。

三滴血在地上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玛丽亚娜发现了，接着再找，想找到一条长长的血迹，一条小径。

“哈维尔！”她喊道。

她顺着走廊向孩子们的房间走去，他们正在电视上砍杀银河系的小魔鬼。

“孩子们！爷爷和你们在一起吗？”

她继续找，脑袋越来越贴近地面。她绊倒了一张小桌子，一件东西掉到了地上。

“哈维尔！孩子们！”

她走到房间，脸色铁青，电视音量大得吓人。只有孩子们自己在。玛丽亚娜不声不响地迅速转过身，匆匆走到厕所门口，敲了两下。

“爷爷！”她故作镇静地叫道。

无人回答。她喘了一口气，犹豫着；她往地上看了一眼：又是一团血。她已顾不上敲门了，手攥把手一把拧开了门。门没推开，撞到了哈维尔·米兰达昏迷的身体。玛丽亚娜推呀、哭呀，感到绝望。一个孩子从走廊跑过来和

她讲话。

“别过来！不要过来！”

孩子一时吓傻了。玛丽亚娜企图把手伸进门缝，拽一拽老米兰达的身体。

“快给你爸爸打电话！”玛丽亚娜喊，“快叫你爸爸！快去！”

安德烈斯关掉了手机，依然犹豫不决，他重新来到了伊内斯·帕切科家门前。万般无奈之中，他的直觉感到这才是他能为父亲所做的事，这个女人是父亲的另爱，尽管他不认识她，但她是父亲残存的另一份爱情经历。为什么现在，恰恰是现在，她不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陪伴他？为什么两人都对他隐瞒？安德烈斯预感也许这样做可以安抚老爸：带伊内斯·帕切科去见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一种预感。他按下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黑暗中的他重新听到一阵脚步声，接着，门打开了。是她，又一次是她，然而，她现在见到他，立刻紧张起来，显得局促不安，突然带着一丝无力的忧郁望着他：

“您怎么又来了？”她问。

“请您原谅我。”安德烈斯说，他神情紧张，行动笨拙。“我能进去吗？”

“不能。”她飞快地向屋里瞥了一眼，身体靠在门框上。

"有要紧事。"

安德烈斯望着她,几乎在祈求。女人愈发紧张,可是什么话也没说。

"他非常不好,"安德烈斯终于实话实说了,"我父亲快死了。"

女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低下了头,当她重新抬起头来时,两只眼睛闪现出炯炯的目光。

"您知道了?"

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带着深深的失望。安德烈斯不知该怎样抑制自己的急切,简直想当场劫持她,她正想说点什么,屋里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伊内斯。"

一会儿,一个两鬓斑白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略显憔悴,但是表情和蔼可亲、憨厚朴实。

"谁呀?"男人站到她身旁,问道。

"一个年轻人,找……"伊内斯打住了,有些犹豫,"找一个人。"说完,她看着安德烈斯,表情中又多了一份暗示,指着那个男人介绍说:"这是我丈夫。"

先生站在她身旁,略带新奇地看着安德烈斯,礼貌地笑了笑。

"你找谁?"

"谁也不找,"安德烈斯有点吞吞吐吐,"他们给我的地址错了。对不起。谢谢,非常感谢。"他说。

"没关系。"

门几乎悄然无声地关上了。里面传出两口子的低语声。男人在问什么,女人在答什么。之后,一切归于沉静。

当安德烈斯重新打开电话时,只听到一阵呼啸声。救护车的报警声成为下午豁开的一道伤口。

* * *

尊敬的埃内斯托:

现在,我该如何向您解释我必须向您解释的一切呢?从何处说起呢?最好还是从我的名字讲起吧。我叫卡丽娜·桑切斯,是安德烈斯·米兰达医生的秘书。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我们在诊所见过面,也通过电话。咱们的接触一直属于诊所的事情,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没有别的。但是,我们彼此更熟悉,我们的交往更密切,尽管您可能不相信。请允许我解释:米兰达医生为我安排的工作中,有一项工作是负责电子邮件,负责接收所有发到andresmiranda@cantv.net信箱的文件。那是用来接收社会邀请、工厂促销和引导某些您这样的病人的专用信箱,恕我直言。但是,当我上午决定给您写信时,我就这样决定了:我要告诉您全部真相。无论如何,我要告诉您全部真相。

您发到这个地址的第一封信我看了,通知了医生。他的指示是不回复您。第二封信,我就什么也没对他说。

我估计他给我的指令继续有效，只要是您，不管发多少邮件都无关紧要。那天，看到您在跟踪医生，我吓坏了。我觉得事情变得严重了、危险了。于是，我就——也怪一个朋友怂恿我——决定自己给您回信。

现在，您或许既惊奇又愤怒，您可能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起初，我觉得这是一场好玩而善意的游戏，但是，我渐渐意识到我错了。也许您不相信我，但是我发誓，是您、您本人和您所写的信，是您对事情的直言不讳，渐渐让我知道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无法原谅，因为现在，我终于感到我不是犯错而是在犯罪。我冒充医生，我欺骗了他，更可恶的是我欺骗了您，我未经许可地使用和亵渎了您的隐私权。

如果从现在开始，您恨我、瞧不起我，我都会理解。我向您保证，尽管我很痛苦，但是我明白您是有道理的，我会尽量接受。我不奢求原谅。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您。杜兰先生，您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充分理解您的感受，我知道您所说的那种感受和症状。您和您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感染了我。所以，当您不再写信时，我开始感到焦虑不安，感觉愈来愈糟糕。我对您讲这些不是为了奉承您，也不是为了洗刷自己的错误。仅仅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盼一切好！见谅。仅此。

卡丽娜·桑切斯

*　　　　*　　　　*

他住在508号病房。急诊医生救治了他，为他清理了血迹，但是决定不再强化治疗了。没有更多的办法可用。他身体虚弱，疼痛加剧。他们给他输了一支血清，并使用监视器以控制血压和脉搏，还给他注射了吗啡。

外面，玛丽亚娜和孩子们在楼道里等着。安德烈斯刚进病房，他走到病床前，看着他。爸爸愈来愈成了一副骨头架子，皮肤仿佛慢慢在分离，只是贴在骨架上，头骨的线条仿佛愈来愈暴露。安德烈斯弯下腰，吻了一下他的前额。老人睁开眼睛，到处看了看，露出凄楚而会心的微笑；用不着更多的表现，两人早已心照不宣。

“真不好意思，倒在你家了，”老人喃喃道，“真对不住孩子们。”

“你别担心。事情要发生在你家里，你可就一个人了。”

老米兰达想了一下，终于开口了，但是很吃力。干什么都愈来愈吃力，越来越费劲儿。

“你不该放梅尔妮去梅里达那么多天。”

“那是我和她说好的事。”老人几乎在咕哝。

安德烈斯点点头。父亲重新闭上了眼睛，艰难地呼吸着。安德烈斯也忙碌了起来：检查检查导管里的液体，核对一下桌上留给他的病历。其实，那些数据和资料已

经没有太大的用处了。每个病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疾病所讲述的故事自有它的顺序和节奏。它们从不重复，尽管所有的病都是同样的结局。

安德烈斯回到父亲身旁。他摸了摸他的脉搏，另一只手摸了摸他的前额，体温愈来愈低，脉象愈来愈弱。此时此刻，安德烈斯真想再一次躺在他的身旁，搂着他放声大哭。老人企图说点什么，可又说不出来，张开嘴干咳着，企图发出声来，结果只能是无声，他的舌头干干的，说话让他难受，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别使劲儿。"安德烈斯说，"什么都别说了。"

他感到几滴热泪在眼眶中打转，热辣辣的。他不知如何是好，摸摸老人的前额，两人突然对视着。安德烈斯看见父亲也在默默流泪，他又一次亲吻了他，紧紧攥住他的手。

"一切都变了。"他有气无力地说，"从我告诉你你病了、从我们知道你病了，一切都改变了。"

老米兰达否认地摇了摇头，似乎要阻止他。安德烈斯只是点点头，做了个不听话的表情。

"我们两人都变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控制事态。我们斗气，我们折腾……我们应该多聊聊，我也不知道，应该好好共渡难关。"

父亲看着他，亲切地笑了。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想摸摸他的脸，可是他的手软弱无力，立时垂下了。安德烈斯擦干父亲脸颊上的泪水。

“这种破事没经历过。”父亲咕哝着，他想开玩笑，似乎想减轻此时的沉重感，“谁告诉过咱们事情会成这个样子!”

三层楼上的诊所里，卡丽娜刚刚通知完亲朋好友，是玛丽亚娜要求她这样做的。打电话给最亲近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手忙脚乱、神经紧张地把事情办了，她也搞不清楚究竟怎样说明情况。她能说什么？最后的时刻到了？一切即将结束，大家快过来？她正要再拨一个电话时，突然发现电脑屏幕上有一个小小的记号：信箱显示刚收到了一封新邮件。她迅速挂上电话，坐在电脑前。当她终于看清发信人时，顿时大惊失色，发信人：埃内斯托·杜兰。

尊敬的米兰达医生：

给您回信前，我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决定向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您的任何消息了。最后一次给您写信时，我正处在危难之中，我向您求助，未果，您从没给我打过电话。在我紧急关头，您没有出现。

实在不易。我费尽周折才脱离了险境。算我走运，我的身体慢慢缓过来了，时间一长终于稳定下来了。当然，凡事都有后果，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丢了工作。我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我无法否认，起初，我特别生您的气。我打定主意不再给您写信，我说到做到。我再也没

给您发过邮件,也不打算再去医院找您。我打算忘掉您。

“终于给你回信了?”阿德拉依达倚着门框,看着她。“我熟悉你的脸色,卡丽娜。是他的信,对吗?”

卡丽娜点点头,对打断她有点不快。

“怎么啦?”

“不是给我的,是给米兰达医生的。”

“我才不信呢!”阿德拉依达喊道,同时转过身从卡丽娜的肩膀上探出脑袋。

但是,我做不到,医生。每天,醒来还是老样子,有一种两手空空、缺点儿什么的感觉。躺下也是一样,心神不定。不是往常的症状,是另一种感觉,一种特别深重的烦恼。直到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才恍然大悟。我应该给您写信,医生。虽然我很失望,虽然您无论如何也不看我的信,但我还是应该给您写信。

如蒙回复,很好。您不回也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写信是唯一让我感觉最好的事,是我唯一真正需要的东西。从前,我曾认为一个人是在为他人写,写信为了让别人看。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肯定了。

“他疯了?”阿德拉依达嘴里嘟囔着。“来看医生的事只字未提?你给他写信的事,也什么都没提?”

“没错。”卡丽娜说。

“没错?”阿德拉依达迷惑不解地看着她,“你没注意到,这就是他的病、唯一的病。”

卡丽娜点点头,嘴唇上闪烁着少见的微笑。她立即轻轻敲击着键盘,开始写回信。

五层楼道,508 室对面,玛丽亚娜和孩子们静静地等候着。病房里,安德烈斯已经不知道在父亲身边躺了多久,他的姿势很不舒服,但是离父亲很近。一切都转瞬即逝,病房里,唯一不坚定的是他们。听到父亲咳嗽,他欠起身,两人的目光又相遇了。

“你想干什么?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老米兰达寻思了一会儿。

“跟我说话,”他艰难地请求着,仿佛把话从嘴唇里生拉硬拽出来似的。“现在跟我说说咱们。”

安静是一根大棒,安德烈斯感觉自己的舌头是一块石头。然而,他猛然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所有,两个人唯一共同拥有的东西:临终话语。那句虚弱而艰难的话语,是身体的终点,是依然拥有生命的唯一乐章,是声音。

什么样的话语?临终话语会说些什么?

父亲做了一个小小的怪样,重新伸出手,仿佛希望拉住他,让儿子离自己再近些。安德烈斯弯下腰,几乎是趴在他身上。

“我想这样走,”父亲喃喃道,“听着你说话离去。”

他重新闭上眼睛。如今,睁眼闭眼居然都成了一种

痛苦。消磨时间也是痛苦。

安德烈斯感到嘴里塞满了树皮，心中也充满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无所顾忌、无拘无束地哭了。父亲的手在他的双手上愈来愈轻 。我们为什么如此难以接受生命就是一次偶然的观念呢？

老米兰达重新睁开双眼，想笑，之后，带着一腔脆弱的温情，看着他。

“跟我说话，”他重复道，“别让我在寂静中死去。”他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病魔
作者＝［委内瑞拉］阿尔贝托·巴雷拉·蒂斯卡著　　王军宁译
页数＝１６０
ＳＳ号＝１１９８３４９６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９４４０４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年０１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